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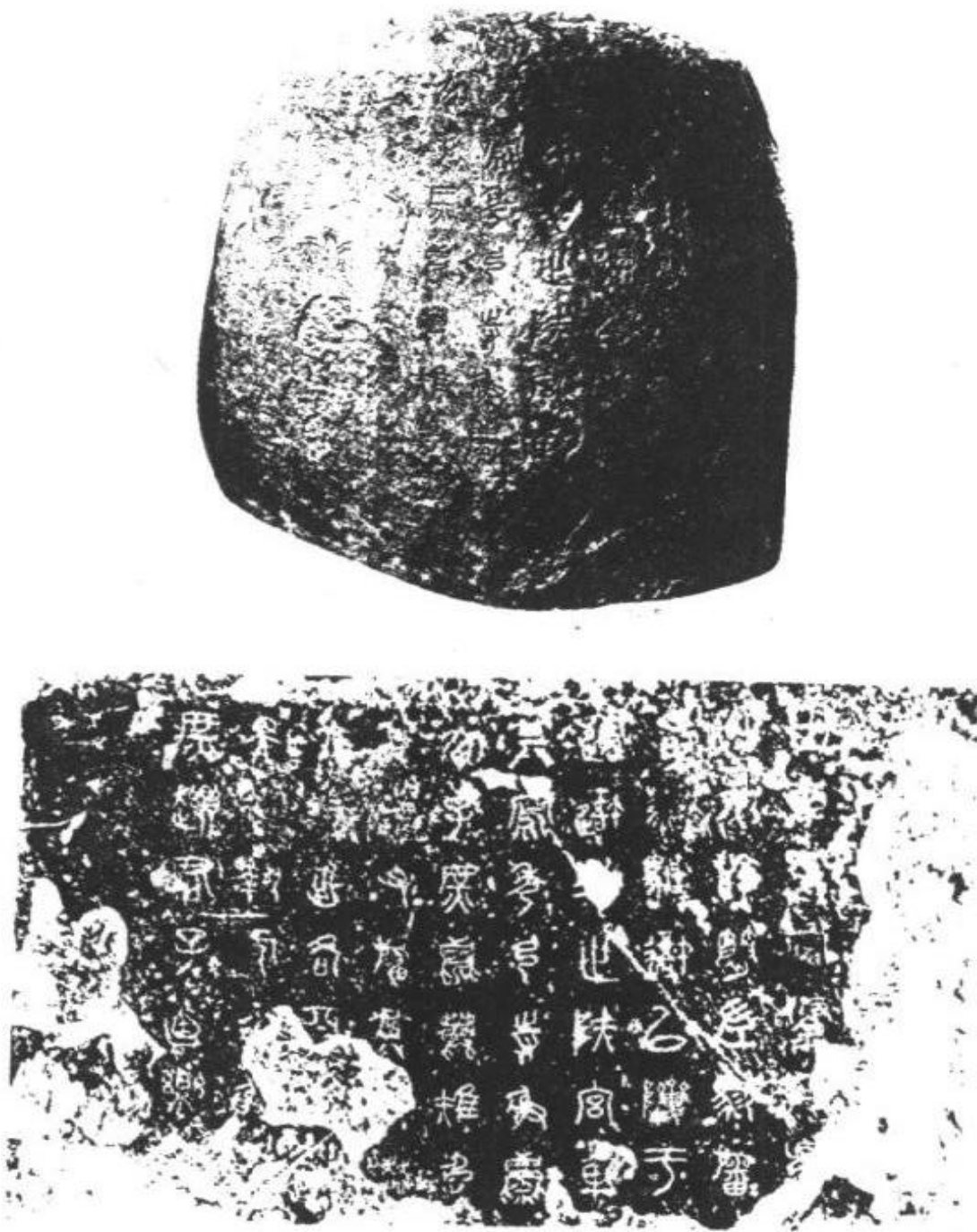
(7) 秦石鼓(图二九)。古代的雍五畤,其大致范围可以估计是在今陕西凤翔南和凤翔原下的宝鸡县,但该地虽有多次发掘(主要在今凤翔县城的南面),这类遗址尚未确认。但值得注意的是,石鼓是唐代初年在天兴县(今凤翔县)南二十多里(另一说是陈仓)发现,正在这一带。铭文提到沔水,也是描写这一带^①。它所歌咏的田猎,性质应与野蚕壶(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铭的描写相似,也是为了祭祀活动(古代祭牲往往出于亲射)^②,估计应与雍五畤有关。

(8) 秦《诅楚文》石刻(图三〇)。包括《巫咸文》、《厥湫文》和《亚驼文》三种,原来是“箸(书)者(诸)石章”,但现在只有宋刻本传世。《巫咸文》是向“大神巫咸”祝告,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出土于凤翔开元寺(在旧城北街);《厥湫文》是向“大神(或大沈)厥湫”祝告,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出土于朝那湫渊(在今宁夏固原西南);《亚驼文》是向“大神亚驼”祝告,宋代曾藏洛阳刘忱家,出土于要册湫(今甘肃正宁东)。这些祝诅之辞和上面的石鼓和秦刻石一样,都不是一般的文字材料,而是古代祠祭遗址所出。例如这里的《巫咸文》就是发现于秦人祠畤集中的雍地,《厥湫文》的出土地也正好是秦湫渊祠所在,《亚驼文》则可能与秦代的洛渊祠有关^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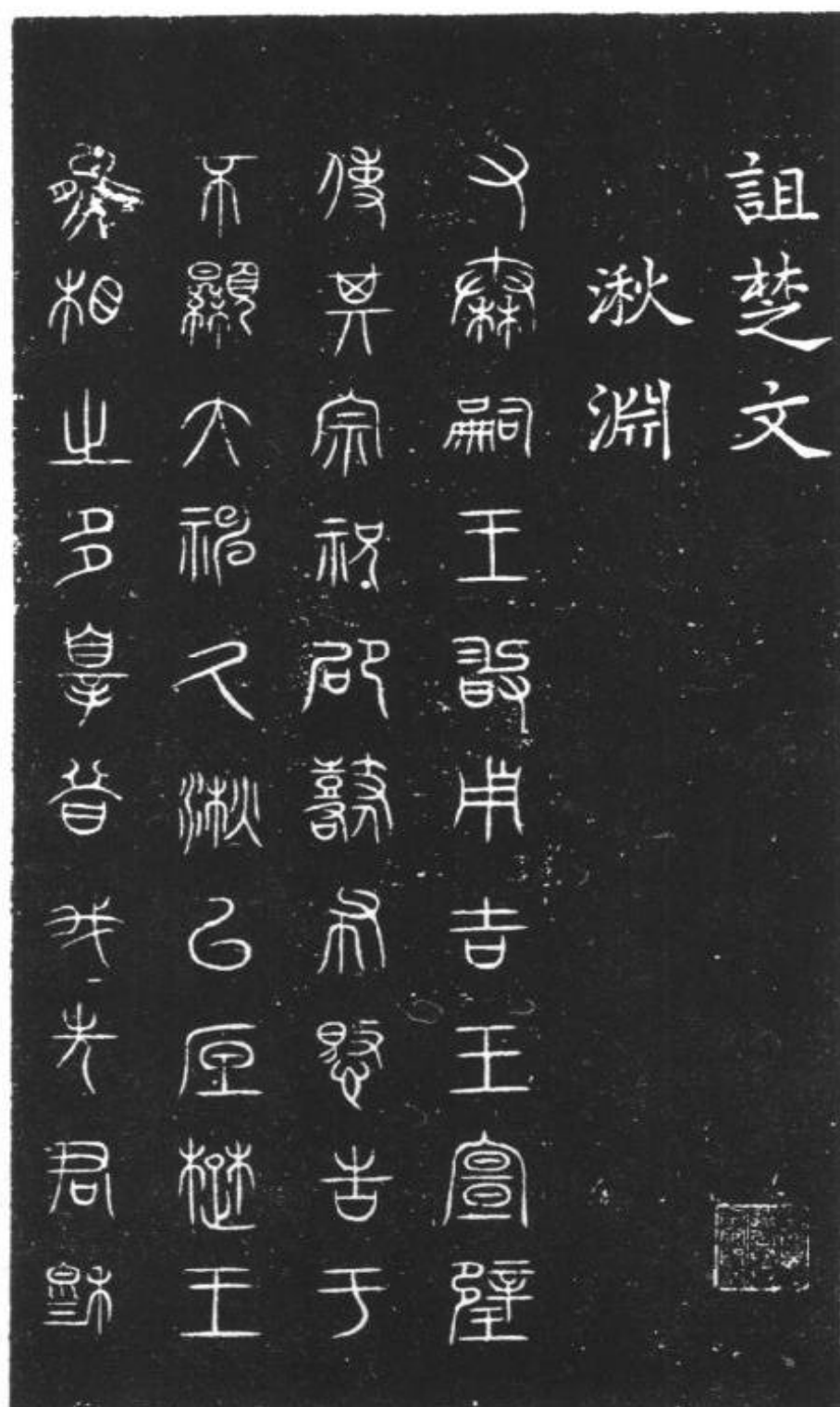
① 参看 Gilbert L. Mattos, *The Stone Drums of Ch'in*,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IX, Steyler Verlag - Wort und Werk, Nettetal 1988, Chapter 3.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馨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上册7-10页和下册图版二。

③ 郭沫若《诅楚文考释》,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275-342页;陈昭容《从秦系文字演变的观点论〈诅楚文〉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1993年4月),545-576转602页。



图二九 秦石鼓



图三〇 詛楚文

(9) 出土竹简中的神鬼之名。《封禅书》和《郊祀志》所述祠祭对象，旧多不明所指，现在因各种占卜类竹简和日书类竹简陆续发表，已有不少找到答案。如望山和包山等地出土的楚占卜简有“太”（即太一）、“司命”、“司祸”（即“司中”）、“五佐”、“云君”、“后土”、“社”、“地主”、“五山”、“坐山”、“大水”、“二天子”等神名^①，九店楚简《日书》有“武夷君”（是司兵死者的神怪）^②，睡虎地《日书》有“雨师”、“杜主”和“巫咸”^③，这些名称就有不少可与二篇印证。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东汉巫祝简也有类似的神鬼之名^④。我们相信，今后还会有不少新的名称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的理解。

六、结语：秦皇汉武对中国宗教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的宗教改革中，秦皇汉武的贡献很值得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虽有不少个人因素在内，好像相当狂热、迷信、任意胡来，轰轰烈烈而终归于失败，但却对了解中国宗教日趋“政治化”的倾向是一个合适的观察点，上可以推求其酝酿过程，下

① 《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5年，506-512页。又 Donald Harper 的待刊之作：“A Warring States prayer for men who die by weapons.”

③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④ 饶宗颐《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建初四年“序宁病简”与“包山简”》，中国海南省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连劭名《东汉建初四年巫祷券书与古代的册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6期，28-33页。

可以寻绎其后续发展（以释、道填补其“宗教空白”）。其作用正像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壹法律度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奠后世之基，不可磨灭的。虽然秦皇汉武之后，海外寻仙没有了，大规模的巡狩封禅和郊祀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缩小为点状的郊祀和偶尔进行的封禅，好像微缩景观（miniature art）一样，但这种“大人国”到“小人国”的转变，前后还是分不开。

秦皇汉武的整齐宗教，其特点是衔接古今，协同上下，调和东西，折衷南北。如他们对各地原有的宗教（如西方的雍四時和东方的八神）和民间的宗教（如各地的巫祠）都是采取兼收并蓄，分级设等，由太祝设祠官领之；郊祀与封禅也是东西并行，甚至对北方匈奴地区和南方两粤地区的宗教也加以利用。他们强调的是政治上的一元化和宗教上的多元化，这种格局的奠定对后世影响很大。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人老是喜欢把各种东西全都塞进“儒家”的概念里，甚至把中国人以政治控制宗教也完全归功于儒家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并不正确。它不但没有考虑秦汉之际的制度创设其实多是出自秦皇汉武这类政治家的蛮干胡来（他们都很迷信），而且就连对儒家的印象很多也是相当晚起和笼统。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印象来讲中国宗教，那么正像美国笑话中说的，这样的 Confucianism（儒家）真是 Confusionism（一团混乱）。

1996年12月31日写于北京菊门里，

1997年2月6日改定于美国西雅图。

【补记一】据裘锡圭《诅楚文“亚驼”考》（《文物》1998年4期，15-18页）考证，诅楚文《亚驼文》中的“亚驼”应读“溱沔”，但并非晋之溱沔，而是今甘肃东端泾川至正宁一带的某条河流，汉平帝时的呼池苑及《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要册湫均与此有关。疑裘文所说“溱沔”即《水经注·渭水》（卷十九）所说的“泥水”和“马岭水”。又关于“碣石宫”遗址，《考古》1997年10期15-60页发表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写作的三篇简报：《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石碑地遗址的勘探与试掘》、《辽宁绥中县石碑地秦汉宫城遗址1993-1995年发掘简报》、《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瓦子地遗址一号窑址》，81-86页发表了华玉冰写作的《试论秦始皇东巡的“碣石”与“碣石宫”》，可参看。

【补记二】关于径路神祠，请参看高去寻《径路神祠》，收入《包尊鹏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71年，99-102页；Kao Chü-hsün, “Ching Lu Shen Shrines of Han sword worship in Hsiung Nu religio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V, nr.3, 1960, pp. 221-232.

秦汉祠畲通考^①

中国早期的祭祀遗址，史籍缺略，难以详考，唯《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专记其事，可作考古线索。秦之故祠以雍为多，达100余所，西（今甘肃天水）亦数十祠，合嶠以东名山五、大川二、八神祠，华以西名山七、大川四，及他杂祠，估计其数，当在二百左右^②。西汉所兴，孝武为盛，数倍于前，成帝时达683所（光雍祠即有303所），哀帝时达七百余所，平帝即位，王莽颇改旧礼，制度为之一变。故王莽以下，当另为考证（参看《续汉书·祭祀志》和《水经注》）。今检二书所载，校以《汉书·地理志》，以时为经，以地为纬（所标地名为《汉书》旧名，先标明旧地治所，后括注今地方位），作为参考（祠名标·号者不见《地理志》，不标者见于《地理志》）。凡得秦汉故祠227所（其不

① 参看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附表六：《〈汉书·地理志〉所见祠庙分布表》。此表所列西汉祠庙共103所。

②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下册705-715页对秦汉祠庙有所讨论，考秦七庙在渭南，当计入秦祠总数内，又据《水经注·渭水》、《晋书·束皙传》、《华阳国志》补凤女、曲木、蜀主恽、白起、土羊神、王翦六祠。

详者 473 所，其中 280 所当在雍地，雍以外约有 193 所），述之于下：

（一）京兆尹。

（1）秦孝公立：

·虎候山祠。在蓝田（今陕西蓝田西）。

（2）秦代立：

·昭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的丰、镐（今陕西长安西北）。

·天子辟池。同上。

·太华山祠。在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案：太华山也叫华山，华山为汉代的西岳〕。

·周天子祠（2 所）。在湖（今河南灵宝西北）。

·天神祠。在下邽（今陕西渭南北）。

·周右将军杜主祠（祠杜伯之鬼，4 所）。在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北）〔案：《封禅书》作“于杜、亳有三社（杜）主之祠”。《郊祀志》两次提到杜主祠，“三”皆作“五”，《地理志》作“杜陵：故杜伯国，宣帝更名。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疑“杜、亳”是“杜、菅”之误，合杜四菅一为五〕。

·寿星祠（祠南极老人星）。同上。

（3）汉高祖立：

·蚩尤祠（祠蚩尤）。在长安。

·梁巫祠（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等）。同上。

·晋巫祠（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先炊等）。同上。

·秦巫祠（祠社（杜）主、巫保、族累等）。同上。

·荆巫祠（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等）。同上。

·九天巫祠（祠九天）。同上。

·灵星祠（也叫赤星祠）。在长安城东十里〔案：此为武帝太祝所领六祠之一，地点是据《封禅书》正义引《庙记》，《孝武本纪》索隐谓赤星即灵星〕。

(4) 汉文帝立：

·长门五帝坛（祠五帝）。在霸陵（今陕西西安东北）长门正北。

(5) 汉武帝立：

·神君祠（祠长陵女子以乳死者）。在长安上林苑躡氏观。

·亳忌太一祠（祠太一、五帝）。在长安东南郊〔案：此亦武帝太祝所领六祠之一，“亳”亦作“薄”〕。

·三一祠（祠天一、地一、太一）。在亳忌太一坛上〔案：此亦武帝太祝所领六祠之一〕。

·黄帝祠（祠黄帝）。在亳忌太一坛旁。

·冥羊祠。同上〔案：此亦武帝太祝所领六祠之一〕。

·马行祠。同上〔案：此亦武帝太祝所领六祠之一〕。

·太一祠（祠太一）。同上。

·泽山君祠。同上〔案：《封禅书》作“泽山君”，《郊祀志》作“泰山山君”，“泰”是“泽”之误〕。

·地长祠。同上。

·武夷君祠。同上。

·阴阳使者祠。同上。

·寿宫神君祠（祠太一、大禁、司命等）。在长安寿宫中。

(6) 汉宣帝立：

·白虎祠。在长安(?)。

·隋侯祠。在长安未央宫中。

- 剑宝祠。同上。
- 玉宝璧祠。同上。
- 周康宝鼎祠。同上。
- 岁星祠。在长安城旁。
- 辰星祠。同上。
- 太白祠。同上。
- 荧惑祠。同上。
- 南斗祠。同上。

(二) 左冯翊。

(1) 秦献公立：

- 畦畴（祠白帝）。在栌阳（今陕西临潼东北）。

(2) 秦代立：

河水祠。在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案：汉宣帝河水祠因之〕。

(3) 汉高祖立：

- 河巫祠（祠河）。在临晋。

(4) 汉武帝立：

·甘泉宫台室（祠三一等天神）。在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宫中。

·甘泉太一祠（也叫太畴，祠太一、五帝、群神从者及北斗等）。在云阳甘泉宫南〔案：《地理志》“太一”之“太”皆作“泰”，甘泉太一祠合下汾阴后土祠亦为武帝太祝所领六祠之一〕。

越巫觔（辜）鄴（禳）祠（从越人勇之言所立，3所，祠天神上帝百鬼）。同上。

·通天台。同上〔案：《封禅书》两见，一作“通天茎台”，一作“通天台”，《郊祀志》无“茎”字，索隐谓“茎”字衍〕。

(5) 汉宣帝立：

径路神祠（祭休屠王）。在云阳〔案：匈奴语称刀剑为“径路”〕。

(6) 年代不详：

天齐公祠。在谷口（今陕西礼县东北）。

五床山祠。同上。

仙人祠。同上。

五帝祠。同上。

休屠祠。在云阳。

金人祠。同上〔案：金人即休屠祭天金人〕。

(三) 右扶风。

(1) 西周晚期立：

·武時。在吴阳（今陕西宝鸡市西北）。

好時。在好時（今陕西乾县东）。

(2) 秦文公立：

·陈宝祠（祠陈宝）。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北阪城。

鄜時（祠白帝）。在陈仓一带〔案：此为秦“雍四時”之一〕。

(3) 秦宣公立：

密時（祠青帝）。在雍（今陕西凤翔西南）地附近的渭水南岸〔案：此亦秦“雍四時”之一〕。

(4) 秦灵公立：

上時（祠黄帝）。在吴阳〔案：此亦秦“雍四時”之一〕。

下時（祠炎帝）。同上〔案：此亦秦“雍四時”之一〕。

(5) 秦代立：

汧水祠。在郁夷（今陕西宝鸡县西的千渭之会）。

·岐山祠。在美阳（今陕西岐山东北）。

·日祠。在雍〔案：秦在雍所立“百有余庙”，可考者只有以下 21 所〕。

·月祠。同上。

·参祠。同上。

·辰祠。同上。

·南北斗祠。同上。

·荧惑祠。同上。

·太白祠。同上。

·岁星祠。同上。

·填星祠。同上。

·辰星祠。同上。

·二十八宿祠。同上。

·风伯祠。同上。

·雨师祠。同上。

·四海祠。同上。

·九臣祠。同上。

·十四臣祠。同上。

·诸布祠。同上。

·诸严祠。同上。

·诸遂祠。同上〔案：《封禅书》作“速”，《郊祀志》作“逐”，并为“遂”之误〕。

·杜主祠。在雍地的菅庙。

·鸿冢祠。在雍〔案：黄帝臣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曰鸿冢〕。

·吴山祠。在泃（今陕西陇县西南）〔案：吴山，《封禅书》

作“吴岳”，《郊祀志》作“吴山”]。

垂山祠。在武功（今陕西眉县东）〔案：垂山古名敦物，即今太白山，《封禅书》、《郊祀志》“垂”误“岳”〕。

- 霸水祠。在咸阳附近。
- 产水祠。同上。
- 长水祠。同上。
- 泮水祠。同上。
- 滂水祠。同上。
- 泾水祠。同上。
- 渭水祠。同上。
- 泃渊祠。疑在泃水上游。

(6) 汉高祖立：

北畤（祠黑帝）。在雍〔案：汉代的“雍五畤”是以秦“雍四畤”合此为五〕。

·南山巫祠（祠南山秦中〈即秦二世之鬼〉）。在陈仓南十里的仓山中（参看《史记·秦本纪》“伐南山大梓”句正义引《括地志》）。

(7) 汉文帝立：

·渭阳五帝庙。在渭城（今陕西咸阳）灃、渭之会的渭水北岸（今陕西长安东北）。

(8) 汉宣帝立：

- 芳谷祠。在鄠（今陕西户县北）附近。
- 五床山祠。同上。
- 日月祠。同上。
- 五帝祠。同上。
- 仙人祠。同上。

·玉女祠。同上。

(9) 年代不详：

太昊、黄帝以下祠。在雍〔案：《地理志》：“雍：秦惠公都之，有五峙，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这 303 所祠应包括上面提到的秦祠 21 所，但“三百三所”，《郊祀志》作“本雍旧祠二百三所”〕。

黄帝子祠。在隃麋（今陕西千阳东）。

上公祠。同上。

明星祠。同上〔案：明星即太白〕。

黄帝孙祠。同上。

舜妻育豕祠。同上。

黄帝子祠。在虢（今陕西宝鸡县）。

周文武祠。同上。

斜水祠。同上。

褒水祠。同上。

(四) 河东郡。

(1) 秦代立：

首山（即薄山，也叫雷首山）祠。在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南）。

(2) 汉高祖立：

·后土庙。在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

(3) 汉武帝立：

·后土祠。在汾阴睢丘〔案：汾阴后土祠合上甘泉太一祠亦为武帝太祝所领六祠之一〕。

(4) 年代不详：

天子庙。在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

尧山祠。在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南）。

（五）河南郡。

汉武帝立：

延寿城仙人祠。在缙氏（今河南偃师东南）。

（六）东郡。

（1）秦代立：

济庙。在临邑（今山东东阿）。

（2）汉宣帝立：

蚩尤祠。在寿良（今山东东平西南）西北泲水（济水）上。

（七）颍川郡。

（1）秦代立：

·太室山祠。在嵩高（今河南登封）〔案：太室山为汉代的中岳〕。

（2）汉宣帝立：

太室山庙。在嵩高〔案：今仍有太室阙在，见吕品《中岳汉三阙》，文物出版社1990年〕。

少室山庙。同上〔案：今仍有少室阙在，见吕品《中岳汉三阙》〕。

·夏后启母石祠。在汉中岳（今河南登封），〔案：今仍有启母阙和启母石在，见吕品《中岳汉三阙》〕。

（八）南阳郡。

秦代立：

·淮庙。在平氏（今河南桐柏西北平氏）〔案：据《封禅书》索隐引《风俗通》。汉宣帝淮水祠因之〕。

（九）庐江郡。

汉代立：

天柱山祠（天柱山即灊山）。在灊（今安徽霍山东北）〔案：天柱山为汉代的南岳〕。

（十）济阴郡。

年代不详：

尧冢灵台。在成阳（今山东菏泽东北）。

（十一）沛郡。

汉高祖立：

·粉榆社。在丰（今江苏丰县）。

（十二）常山郡。

汉代立：

恒山祠。在上曲阳（今河北曲阳西）西北〔案：恒山为汉代的北岳，武帝以来作“常山”〕。

（十三）涿郡。

秦代立：

·鸣泽祠。在容城（今河北容城北）〔案：地点是据《封禅书》索隐和正义〕。

（十四）济南郡。

（1）秦代立：

·天主祠。在临淄（今山东益都临淄东南）南郊天齐渊〔案：天主为秦“八神”之一〕。

（十五）泰山郡。

（1）秦以前立：

泰山庙。在博（今山东泰安东南旧县）〔案：泰山为汉代的东岳〕。

·云云山祠。同上。

·社首山祠。同上。

亭亭山祠。在钜平（今山东泰安南）。

·石闾山祠。同上。

·地主祠。在梁父（今山东新泰西）〔案：地主为秦“八神”之一〕。

(2) 汉武帝立：

明堂（祠太一、五帝、后土、高祖）。在奉高（今山东泰安东）西南四里汶水上。

·高里山祠。在博（今山东泰安东南旧县）。

·肃然山祠。在嬴（今山东莱芜西北）。

(3) 年代不详：

蒙山祠。在蒙阴（今山东蒙阴西南）。

(十六) 齐郡。

汉宣帝立：

逢山祠（祠石社石鼓）。在临朐（今山东临朐）〔案：《地理志》作“逢山祠”，《郊祀志》作“蓬山祠”〕。

(十七) 东莱郡。

(1) 秦代立：

·阴主祠。在曲城（今山东莱州东北）三山（即参山，今山东莱州北）〔案：阴主为秦“八神”之一〕。

·阳主祠。在睡（今山东烟台）之罘山（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上）〔案：阳主为秦“八神”之一〕。

·月主祠。在黄县（今山东龙口东）莱山（今山东龙口东南）〔案：月主为秦“八神”之一〕。

·日主祠。在不夜（今山东莱城北）成山（即盛山，今山东莱城东北）〔案：日主为秦“八神”之一〕。

(2) 汉武帝立(?)：

万里沙祠。在曲城（今山东莱州东北）三山。

(3) 汉宣帝立：

之罘山祠。在睡（今山东烟台）之罘山。

·参山八神祠。在曲城三山。

成山日祠。在不夜成山。

·莱山月祠。在黄县莱山。

莱山松林莱君祠。同上。

(4) 年代不详：

海水祠。在临朐（今山东莱州西北）。

百支莱王祠。在掖县（今山东龙口西南）。

(十八) 琅琊郡。

(1) 秦代立：

·四时主祠。在琅琊（今山东胶南西南）〔案：四时主为秦“八神”之一〕。

(2) 汉武帝立：

太一祠。在不其（今山东崂山西北）。

仙人祠。同上〔案：连上共9所〕。

明堂。同上。

(3) 宣帝立：

四时祠。在琅琊。

(4) 年代不详：

·凡山祠。在朱虚（今山东临朐东南）。

三山祠。同上。

五帝祠。同上。

莱山莱王祠。在长广（今山东莱阳东）。

环山祠。在昌（今山东诸城北）。

(十九) 临淮郡。

江海会祠。在海陵（今江苏泰州市）。

(二〇) 会稽郡。

(1) 楚春申君立：

历山祠。在无锡（今江苏无锡）。

(2) 秦代立：

·会稽山祠（山上有禹冢、禹井）。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二一) 汉中郡。

秦代立：

·沔水祠。在南郑（今陕西汉中东）。

(二二) 蜀郡。

秦代立：

·涪山祠。在湔氐道（今四川松潘北）。

·江水祠。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市）。

(二三) 越巂郡。

汉宣帝立：

金马、碧鸡祠。在青蛉（今云南大姚）禺同山（今云南姚安）。

(二四) 益州郡。

年代不详：

黑水祠。在滇池（今云南晋宁县东北晋城镇）。

(二五) 武都郡。

秦文公立：

·怒特祠。在故道（今宝鸡市西南大散关东南）〔案：见《史记·秦本纪》正文及集解、正义〕。

(二六) 陇西郡。

秦襄公立：

·西時。在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案：《封禅书》、《郊祀志》皆云：“西亦有数十祠。”〕。

·人先祠。同上〔案：《封禅书》集解引《汉注》、索隐引《汉旧仪》说陇西西县有“人先祠”，或即西“数十祠”之一〕。

（二七）金城郡。

年代不详：

西王母石室。在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西北塞外。

仙海。同上。

盐池。同上。

弱水祠。在临羌西须抵池。

昆仑山祠。同上。

（二八）安定郡。

秦代立：

端旬祠（15所，胡巫祝）。在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

湫渊祠。同上。

（二九）上郡。

（1）汉宣帝立：

五龙山仙人祠。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案：《郊祀志》作“五龙山祠”〕。

黄帝祠。同上。

·天神祠。同上。

原水祠。同上〔案：《地理志》作“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郊祀志》作“黄帝、天神、原水之属”〕。

（2）年代不详：

黄帝冢。在阳周（今陕西子长西北）桥山（今陕西黄陵北）。

(三〇) 西河郡。

汉宣帝立：

天封苑火井祠。在鸿门（今陕西榆林东北）〔案：疑由天然气喷发而附会〕。

(三一) 辽西郡。

(1) 秦代立：

·碣石祠。在橐（今河北昌黎南）碣石山（今河北昌黎西北仙台山）。

(2) 年代不详：

高庙。在且虑（今辽宁朝阳市西）。

(三二) 胶东国。

汉宣帝立：

天室山祠。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案：《地理志》作“天室山”，《郊祀志》作“太室山”〕。

三户山祠。在下密（今山东昌邑东）〔案：《地理志》作“三石山”，《郊祀志》作“三户山”〕。

(三三) 东平国。

秦代立：

·兵主祠。在东平陆（今山东汶上西北）监乡〔案：兵主即蚩尤，为秦“八神”之一〕。

(三四) 鲁国。

秦代立：

·驹峰山祠。在驹（今山东邹县东南）。

(三五) 广陵国。

汉宣帝立：

江水祠。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西南）。

(三六) 长沙国。

秦代立：

·湘山祠。在益阳（今湖南益阳东）北（今湖南岳阳西南）。

(三七) 地点不详。

·洛渊祠。疑在洛水上游。

·蒲山祠。不详。

·岳嵎山祠。不详。

(2) 汉武帝立：

·明年祠（“明年”也叫“延年”）。在执期（今山东半岛一带）。

1996年12月31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1997年6月2日改定于美国西雅图。

【补记一】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51-81页：《秦汉时期宗教文化景观》对秦汉祠庙的地理分布有专门讨论。其附录一《西汉郡国祖宗庙的分布》共列西汉祖宗庙167所，其中太上皇庙8所，高庙53所，孝文帝庙57所，孝武庙49所；附录二《西汉成帝初年祠庙的分布》共收汉代祠庙152所，可参看〔案：拙考所列西汉祖宗庙只有且虑之高庙，未收其他，如加上周文所考的其他166所，则不详者为307所（其中雍地占280所，雍以外占27所）〕。

【补记二】1975-1982年，修筑青藏铁路的工人在青海省天峻县二郎洞附近发现汉代遗址，遗址出有“长乐未央”、“常乐万亿”瓦当，学者推测即上临羌西王母石室。参看曹清景《天峻县

王母洞前发现古建筑遗址》、卢耀光《天峻西王母石室和西王母宫古遗址调查考略》，收入阿旺尖措等编《昆仑神话与西王圣母》，黄山书社，1998年，174-197页。

【补记三】齐临淄故城一带多出“天齐”半瓦，应即天主祠所在天齐渊的遗物，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6期，289-297页；赵超《释“天齐”》，《考古》1983年1期，66-67页。

【补记四】齐地的八主祠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仿三才，曰天主、地主、兵主三祠，在泰山和泰山南北一带，偏西；一部分是配日月、阴阳、四时，在胶东半岛的南北两岸，偏东（日主、阳主祠在东，月主、阴主祠在西，四时主祠在南）。它们，除日主、阳主祠有早期遗址，出土瓦当、玉器等物，月主、阴主和四时主祠也有早期遗址和瓦当等物发现（而且它们多有以所当八神为名的晚期祠庙，或附始皇庙，或兼海神庙）。

星官索隱



“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

“太一”崇拜在古代的神祇崇拜和宗教仪式中地位很突出^①。它与古代的天文学及占星、式法、选择等数术，还有古代哲学中的本体概念——“道”、“太极”密切相关，对古代科技史和哲学史的研究也至关重要。但是由于这一概念有太多的交叉与变形，加上年深日久，载籍缺略，它的含义和细节至今仍多不明。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指出的是，现在由于新的考古发现，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若干突破。

一、传世文献中的“太一”崇拜^②

古人明确提到“太一”，最早似乎是见于战国晚期的文献，如《庄子·天下》、《荀子·礼论》、《吕氏春秋·大乐》、《鹖冠子》

^① “太一”亦作“大一”、“泰一”、“泰壹”。案“大”、“太”、“泰”同源，下不再重复注明。

^② 参看钱宝琮《太一考》和凌纯声《秦汉时代之畴》。

的《泰鸿》和《泰录》等篇^①。但这些记载多是只言片语，难窥全貌，眉目比较清楚还是汉代文献，如《淮南子》的《天文》、《精神》、《本经》、《主术》、《论言》、《要略》等篇^②，《史记》的《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天官书》和《封禅书》^③，《汉书》的《礼乐志》、《郊祀志》、《天文志》和《艺文志》^④，以及汉代的各种纬书^⑤。

汉代的史料容易使人造成错觉，以为祭祀“太一”只是从汉武帝以来才有。因为《封禅书》从“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讲到武帝以前，没有一个字说及“太一”，只是到武帝时才有人把它郑重其事地提出来，摆在众神之上，仪式十分隆重，祭祀也十分频繁^⑥。

据《封禅书》和《郊祀志》，武帝祠祭“太一”，先后立过两

① 见《诸子集成》第三册：《庄子集解》，221页，第二册：《荀子集解》，236页，第六册：《吕氏春秋》，47页；《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鶡冠子》，28、29、31、32页。

② 见《诸子集成》第七册：《淮南子》，39、42、111、119、120、127、235、369页。

③ 见《史记》，456、458、459、467、469-473、475-477、480、481、485、1169、1178、1289、1386、1388、1393-1396、1398、1399、1401、1403、1438页。

④ 见《汉书》，185、263、1045、1060、1173、1218-1220、1227、1230-1233、1235、1237、1243、1244、1248、1257-1259、1264、1265、1268、1274、1547、1585、1753、1759、1763、1764、1767、1768、1772、1779、2940页。

⑤ 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纬书集成》（东京：株式会社明德出版社，1978年）索引中的有关条目。

⑥ 参看《封禅书》，《史记》，1355-1404页；《郊祀志》，《汉书》，1189-1272页。

座太一坛：

(1) 亳忌太一坛。即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亳人（亳在今山东曹县）谬忌奏立的太一坛，位置在汉长安城（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的东南郊。坛作“八觚”（八边形），每边各有一条可供登降的阶道，叫“鬼道”，两两相对，如米字而虚其中，代表四方八位，半径为 30 步（约 41 米左右）。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建议把“太一”当作最高的天神，而把“五帝”当作“太一”的佐神来配享，武帝准之，是为汉祭“太一”之始。后来他还采纳其他人的建议，在此坛祭祀“三一”（由“天一”、“地一”和“太一”组成的“三位一体”神）、“冥羊”、“马行”等神^①。

(2) 甘泉太一坛。也叫“甘泉太畤”或“甘泉太畤坛”（《郊祀志》“太”作“泰”），即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祠官（掌管祭祀的官员）宽舒等人在汉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的南面修立的太一坛。其形式是模仿前者，可作了解前者形制的参考。坛分三层，最高一层列具“太一”之象，叫“紫坛”；中层是以青、赤、白、黑四帝居东、南、西、北，而将黄帝置于西南，叫“五帝坛”；下层作“四方地”，配有“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则为“群神之坛”^②。《郊祀志》说此坛亦“八觚”，当指坛的主体即上中两层是作八边形；它的最下一层为“四方地”，则是方形。前者趋近于圆形，应是象征“天圆”；后者则是象征“地方”。其“紫坛”是象征宇宙的天顶部分，即“紫微垣”或

^① 《封禅书》，《史记》，1386 页；《郊祀志》，《汉书》，1218 页。

^② 《封禅书》，《史记》，1394 页；《郊祀志》，《汉书》，1230、1256 页。

“紫微宫”。“五帝坛”把黄帝置于西南。黄帝于五行方位属土，本来应在中央，但现在既然中央已被“太一”占据，所以只好屈居西南，这和《礼记·月令》把土行配于季夏（位当西南）是一个道理。“群神之坛”所祭的“群神从者”或即亳忌太一坛兼祭的“三一”、“冥羊”、“马行”之属，而北斗属土行，配地也是合理的（详第四节）。根据史书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测其大概的形制（图三一）。

武帝所立的两个太一坛，前一个太一坛后来怎样，史无明文，但后一个太一坛一出现就取代前者而成为当时的祭天中心。甘泉宫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所立^①，地点在今淳化县北的古甘泉山上。甘泉山是传说“黄帝以来圜丘祭天处”，也是匈奴祭天处^②，这大概就是武帝选择该地为祭天之所的原因。武帝在元狩四年和五年（公元前119、118年）初立甘泉宫时，就已经在宫中“为台室”祠祭“太一”，但当时还没有正式立时^③。正式立时是在元鼎五年，即武帝建汾阴后土祠（在今山西万荣县）的次年^④。甘泉太时和汾阴后土祠是武帝时新立的祭祀中心，它们一个祭天，一个祭地，正好是一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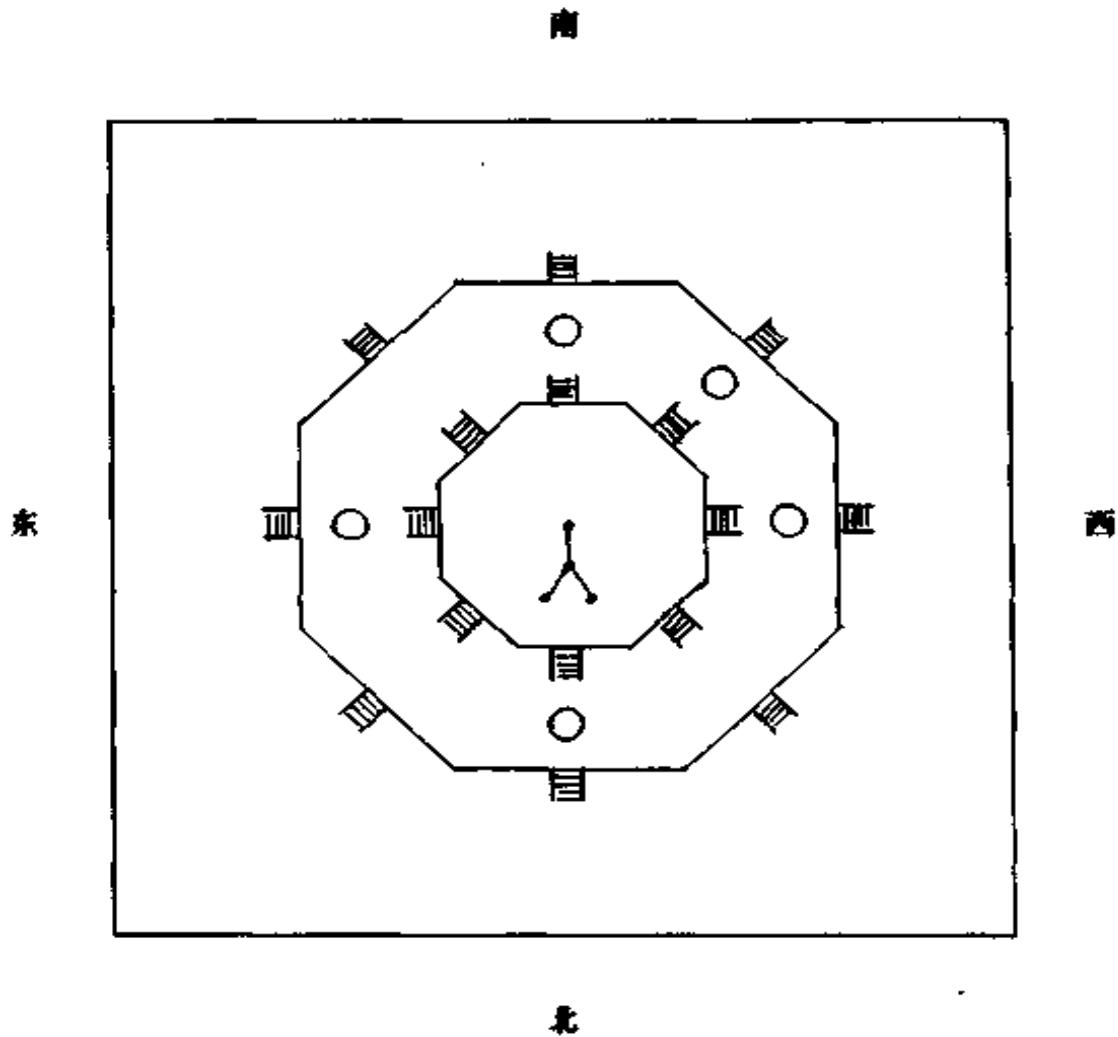
在汉代的祭祀制度中，封禅和郊祀都包含祭天，但“太一”之祭主要还是属于郊祀制度。司马迁说“今天子（汉武帝）初即

① 《封禅书》，《史记》，1387-1388页；《郊祀志》，《汉书》，1219-1220页。

②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卷二《汉宫·甘泉宫》（46-50页）、卷三《甘泉宫》（67-82页）。

③ 《封禅书》，《史记》，1394-1395页；《郊祀志》，《汉书》，1219-1220页。

④ 《封禅书》，《史记》，1389页；《郊祀志》，《汉书》，1221-1222页。



图三一 甘泉宫太一坛复原图

上层小八边形为“紫坛”，其上的 Y 字形物为“太一”之象；中层大八边形为“五帝坛”，其上的五个圆圈，从东至北依次为青、赤、黄、白、黑“五帝”之位；下层正方形为“四方地”；上中两层下的“米”字形阶道为“鬼道”。

位，尤敬鬼神之祀”^①，武帝兴立祠祀远倍于前^②。秦祠最有名是雍四畤（祭白、青、黄、赤四帝）和陈宝祠（祭秦文公在陈仓发现的陨星），所谓“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③。汉初，除于雍四畤旁增加北畤（祭黑帝）和吸收六国杂祠，郊祀制度多袭秦而不改，所以祭祀对象主要是五帝，祭祀之所主要是雍五畤^④。而“今天子（汉武帝）所兴祠”，最出名的则是甘泉太畤和汾阴后土祠^⑤。武帝立了甘泉太畤和汾阴后土祠，加上原来的雍五畤，汉代的郊祀制度才粲然大备。

读《封禅书》和《郊祀志》，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郊祀，其所谓“郊”大体相当于当时的京畿三辅，这虽不比巡狩封禅跑得那么远，但比起古书所说的郊祀范围却大得多。如武帝祭“太一”要北上今淳化，登甘泉山（属左冯翊）；祭“后土”要东渡黄河，到今山西万荣（属河东郡，邻左冯翊）；祭“五帝”要西去今凤翔一带（属右扶风）。若以长安为圆心，活动半径差不多有200公里，摊子铺得很大。他这个人有点像周代的穆天子，秦代的秦始皇，特别喜欢东征西讨，也特别喜欢周游天下。他在世时，求仙访药，不辞其远；封禅郊祀，不厌其烦。这既有政治考虑，也有个人偏好。然而他的这种热情却很难被他的后继者所仿效。

由于汉武帝的郊祀制度与古制不合，并且远道跋涉，多所不

① 《封禅书》，《史记》，1384页；《郊祀志》，《汉书》，1215页。

② 《封禅书》，《史记》，1384-1404页；《郊祀志》，《汉书》，1215-1248页。

③ 《封禅书》，《史记》，1376页。

④ 《封禅书》，《史记》，1378-1384页；《郊祀志》，《汉书》，1210-1215页。

⑤ 《封禅书》，《史记》，1403页。

便，所以经过汉昭帝、宣帝和元帝，到成帝、哀帝和平帝时，遂有复古派出来加以反对。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汉成帝初即位，采纳儒者匡衡等人的建议，罢甘泉太畤、汾阴后土祠及雍五畤、陈宝祠等众祠，改于长安南北郊祭天地和五帝（类似亳忌太一坛），理由是：（1）天子居长安，离这些祠畤太远，跋山涉水，既险又累，且劳民伤财；（2）古代郊祀都是随王所居，行于近郊，而且祭天之所在正阳之位（南），祭地之所在大阴之位（北），今太畤在长安北，后土祠在长安东，也违反阴阳方位；（3）雍四畤和陈宝祠乃诸侯（秦）妄造，高祖所立北畤也是天下未定时仓卒建立^①。这几乎是把武帝的制度全都推翻了。但这以后，情况一直反反覆覆。汉成帝对这两套郊祀制度一直拿不定主意。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因皇后无子，曾恢复武帝旧祠^②，可是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他前往这些地点祭祀，屡逢凶咎，又恢复长安南北郊之祭^③。成帝以后的哀帝也是如此。他初即位，还是实行长安南北郊之祭，但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因为皇后久病不愈，他又恢复了甘泉太畤和汾阴后土祠之祭^④。直到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采纳王莽等人的建议，才最终废除甘泉太畤和汾阴后土祠之祭，确立长安南北郊之祭。从此，置太畤于长安南郊以应天，后土祠于北郊以应地，五帝畤于长安四郊各如其位，称“太一”为“皇天上帝”，“后土”为“皇地后祇”^⑤。这一制度为后世郊祀所祖，例如明清两代的天坛

① 《郊祀志》，《汉书》，1253-1258页。

② 《郊祀志》，《汉书》，1258-1259页。

③ 《郊祀志》，《汉书》，1262-1263页。

④ 《郊祀志》，《汉书》，1264页。

⑤ 《郊祀志》，《汉书》，1264-12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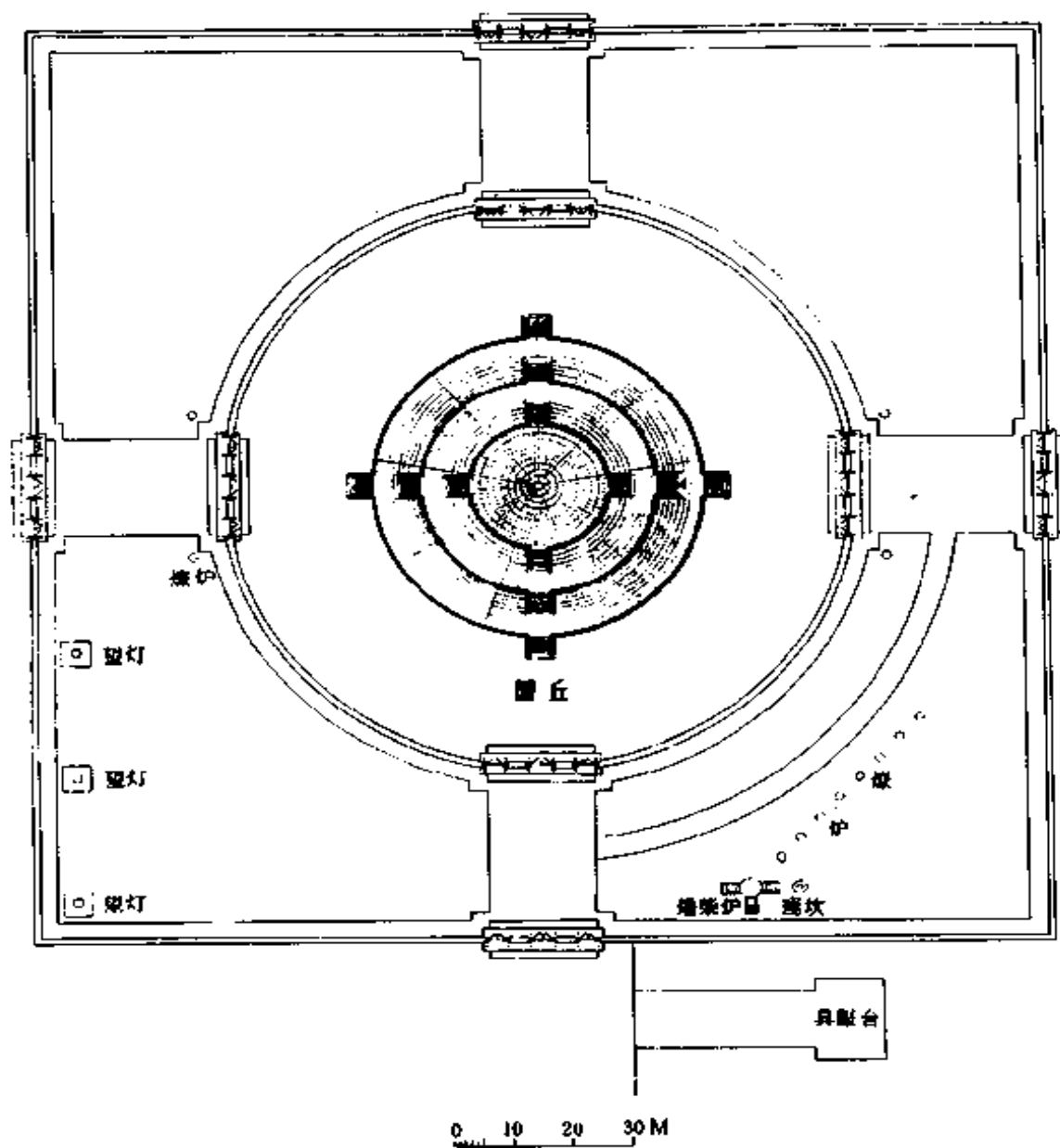
和地坛就是在北京的南北郊，其天坛的圜丘也与汉太一坛相似（图三二）。

在汉代史料中，围绕两种太一坛的争论，似乎是“新制”与“古制”之争。亳忌太一坛和匡衡、王莽建议的长安南北郊之祭都是依托“古制”，而甘泉太一坛则是武帝以来的新制。但是前者的“古”是“复古”，它和真正的“古”到底有多大相似性？后者的“新”是“复古”之后的“推陈出新”，它是不是一种完全的“新”？这些问题在没有发现真正的“古”之前，恐怕是没有办法说清的。

二、钱宝琮的《太一考》^①

在前人研究“太一”的文章中，钱宝琮的《太一考》是最具综合性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史专家，当然是研究此一问题的最好人选。但他的这篇文章不仅是讨论作为星象的“太一”，还讨论到作为哲学本体概念和宗教崇拜对象的“太一”。特别是据作者本人讲，此文是应顾颉刚先生的邀请而作，并利用了顾先生搜集的有关材料〔案：后来顾颉刚、杨向奎发表《三皇考》（见《古史辨》第七册（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0-282页）涉及同一问题，论述更详（主要是搜罗文献更多）〕。它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以顾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思潮的影响。顾先生为了证明汉代人特别喜欢作伪，总是喜欢强调汉代人太迷信，太爱造神。作者对“太一”崇拜的研究显然带有这种痕迹。

^① 参看《太一考》。



图三二 天坛圆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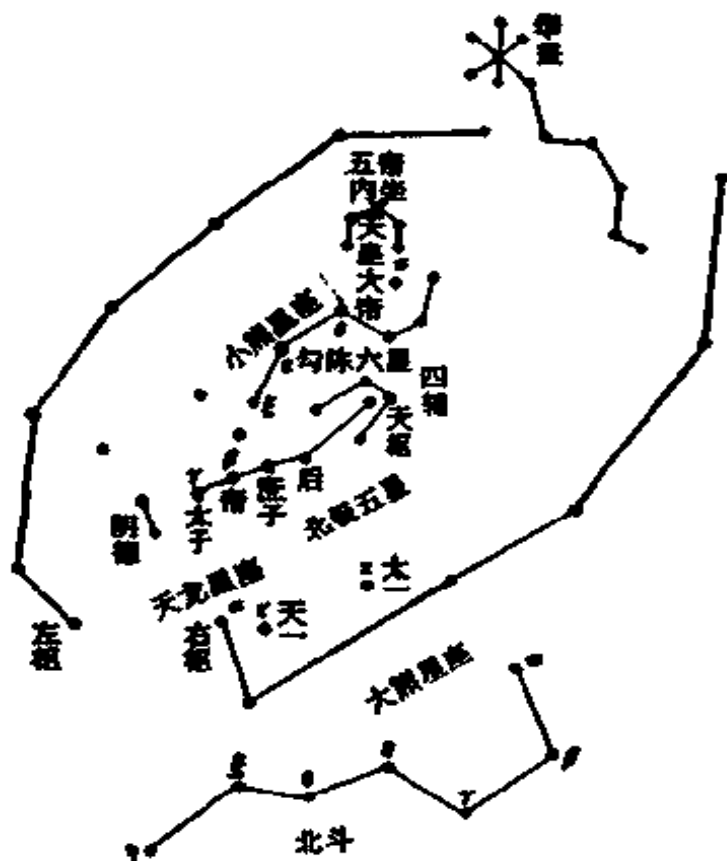
钱先生的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太一”与古代哲学概念“道”的关系。他认为在道家传统中，本来“一”是“道”的别名（如《老子》和《淮南子》），后来阴阳家起，人们把“道生阴阳”比作“一分为二”，才用“太一”代替“一”，表示终极概念的“道”（《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种概念的“太一”与作为星神概念的“太一”无关。另外，这种“太一”的概念还影响到儒家，如《荀子·礼论》、《礼记·礼运》都提到礼应归本于“太一”的说法。儒家传易，《系辞传上》和《易纬乾凿度》的“太极”也是“太一”的改头换面。第二部分是讲汉代的“太一”崇拜。作者认为“‘太一’这个名词从阴阳未分的道演变为总理阴阳的天神，大概是西汉初期的事实”（2456页），因此否认《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与汉代的“天神贵者太一”是同一种神，并以宋玉《高唐赋》为伪书，否认先秦时代有作为星神的“太一”存在。他认为古代数术有阴阳家和五行家二系（此说在中国学术界极为流行），武帝以前的郊祀是以祭祀五帝为主，属五行系；武帝以来的郊祀把五帝降为“太一之佐”，是因为阴阳家压倒了五行家。从此人们才把“太一”当总领阴阳的天神，“天一”、“地一”当分任阴阳的天神，形成“三一”。第三部分是讲“太一”的星象学含义。作者认为“太一”作为星名也是汉武帝以来才有。此星在先秦时代本来是叫“北辰”。这个“北辰”是古代北极五星中的亮星，即小熊星座的 β 星(β UMi)，2,000年前，位置与今北极相近，《淮南子·天文》称之为“太帝常居”，《史记·天官书》称之为“太一常居”，《春秋纬》称之为“天皇大帝”，《石氏星经》称之为“帝星”。两晋时期，人们才以勾陈六星中的第一星即小熊星座的 α 星代替原来的 β 星。另外，与“太一”有关，作者还对“天一”的星象学含义也做了探讨。作者指

出《天官书》讲的“天一”是阴德三星，位置在北斗的斗口之上。这三颗星与后世星图的阴德同名，但位置不合。后世星图往往以“太一”、“天一”指属于天龙座的两颗小星，即 χ Dra 和 ϵ Dra [案：《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219页编者注说“天一星应为 10Draco，而太一则应为其边上的一颗小星”，认为钱说有误]，显然不是《天官书》的“太一”和“天一”（图三三）。其来源是《石氏星经》。“天一”的天文学功能主要在于它是代表岁星（木星）的反影，“太阴”、“青龙”、“太岁”皆其异名。第四部分是讲“太一”和古代传说中的“泰皇”、“太帝”的关系。作者指出古之所谓“三皇五帝”的“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见《路史·九头纪·泰皇氏》引秦丞相王绾语），是比照“天一”、“地一”、“太一”的概念而来，“泰皇”即源于“太一”。这种“泰皇”也叫“泰帝”，它在汉代传说中往往被人格化，或指黄帝（《封禅书》、《郊祀志》），或指太昊（《史记索隐》）。此外，汉代纬书《春秋合诚图》、《河图括地象》和《神农本草经》佚文还提到一位叫“太乙”或“太一子”的神人。《汉书·艺文志》也著录了不少与“泰壹”有关的兵书和数术、方技之书。作者认为，它们都是托名“太一子”的伪书 [案：《鹖冠子·泰鸿》有“泰皇”、“泰一”问对，是把“泰皇”、“泰一”当作两个神人^①。《汉志》所录“泰壹”各书可能即采取类似形式。这种书属于依托之书，但称为“伪书”不妥]。第五部分是讲与式法有关的“太一九宫”和“天一六壬”。作者认为前者是汉人依托《说卦》，以八卦分配八方，而以太一居中，由天一代行九宫。其说见于《易纬乾凿度》、

^① 见《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鹖冠子》，28-32页。

《黄帝内经》、《黄帝九宫占》、《五行大义》、《唐会要》、《太乙金镜式经》等书。《易纬乾凿度》和《黄帝内经》都是西汉就有的古书，但作者认为此说只见于前书卷下和后书第十八卷，盖出后人附益，应是东汉新起的数术〔案：此说可商〕。而“天一六壬”，则见于《道藏》所收《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匱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大概也不会太早。

紫宫北斗合图



图三三 钱宝琮理解的太一、天一在星图中的位置

钱氏对与“太一”有关的问题基本上都涉及到了。此文对于我们的研究无疑是重要参考，但其致命弱点是受顾氏之说误导，

把古书的“层累形成”理解为“层累作伪”，因此对古书年代有许多错误估计。他的文章从发表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但他的结论却至今没有得到过认真的检查和批评。近来虽有学者怀疑古代文献中的“太一”并非如钱氏所说，是先指“道”而后指“星”，再派生出其他概念，而很可能是一种来源相同，可以互换互释的现象^①，但反对的看法还缺乏坚强的支持。

三、来自考古发现的新线索

现在与“太一”有关的考古发现已有多起，它们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这里按年代早晚介绍如下：

（一）“兵避太岁”戈（图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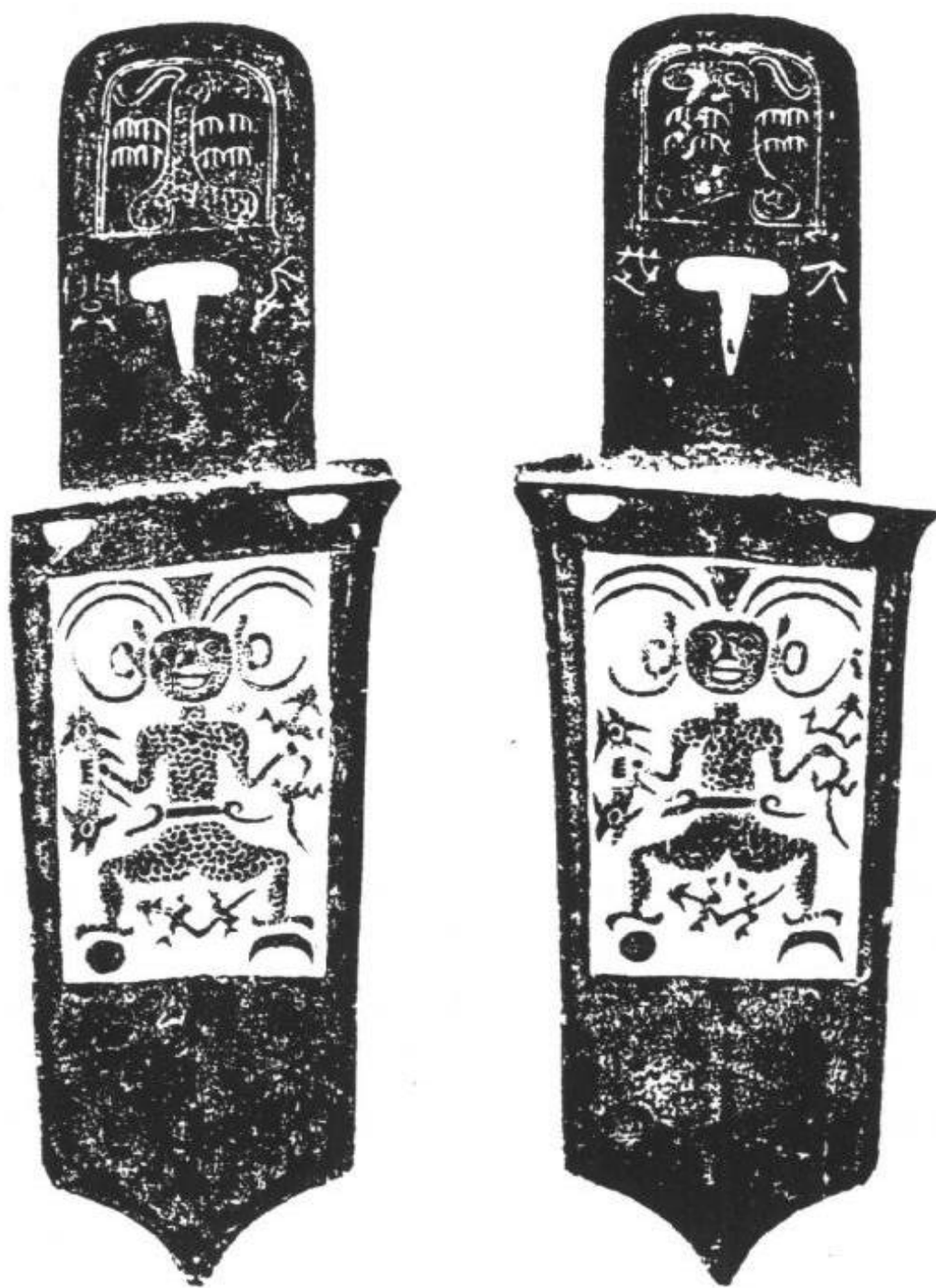
1960年湖北荆门市漳河车桥战国墓出土^②。戈为巴蜀式，长22、宽5-6.8厘米，无胡，援部中间起脊，近阑处有二穿，锋呈三角形，内带T形穿孔。戈援和戈内正背纹饰相同。援部纹饰为浮雕，作一“大”字形戎装神物，头戴分竖双羽的冠冕，疑即古代所谓的“鹖冠”（一种武士戴的冠冕）^③，身披铠甲，双手和胯下各有一龙。三龙，左手所握与胯下者相同，形似蜥蜴，右手所握为双头无足龙，形状与甲骨文中的“虹”字相似^④。“大”字

^① 葛兆光《众妙之门——北极与太一、道、太极》，《中国文化》3期（1990年12月），46-65页。

^② 王毓彤《荆门出土一件铜戈》，《文物》1963年1期，64-65页。

^③ 见李零《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文物天地》1992年3期，22-25页。

^④ 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2-6页。



图三四 “兵避太岁”戈上的“太一锋”

形神物左足踏月（在右），右足踏日（在左）。内部纹饰为阴刻，是一侧首张翼之鸟。铭文在内部穿孔的两侧，正背各两字，作“兵闢（避）太岁”^①，年代属战国中晚期^②。

（二）包山楚简中的占卜类简文（图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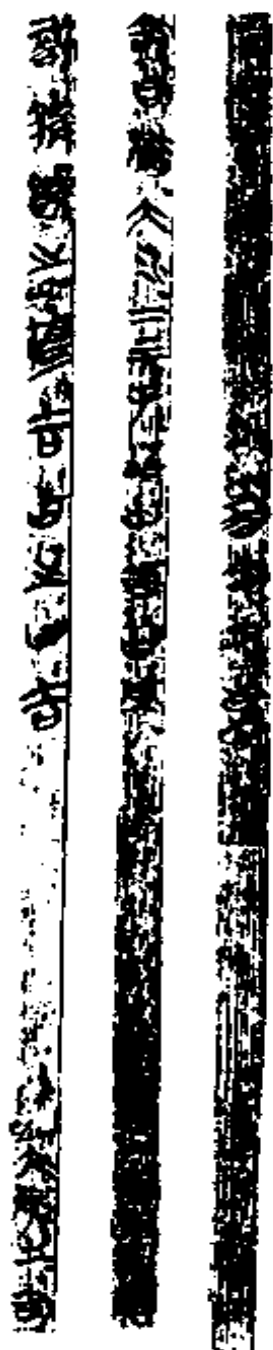
1987年湖北荆门市包山2号墓出土^③。这种简文过去也见于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和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竹简^④。包山占卜简所述往往涉及祷祠（禳除凶咎的祭祷），其祷祠对象包括许多神祇。这些神祇中列在首位的神，其名作𠂇、𠂇，有时还加有示旁或从示从大，字形与古文字中的“蔡”、“覈”等字相近（图三六），应该都是从“大”字派生，表示钦鉞

① 见俞伟超、李家浩《论“兵辟太岁”戈》，收入《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138-145页。

② 参看俞伟超《“大武闢兵”铜戚与巴人的“大武”舞》（《考古》1963年3期，153-155页）和《“大武”舞戚续记》（《考古》1964年1期，54-57页）；马承源《关于“大武戚”的铭文及图像》（《考古》1963年10期，562-564页）和《再论“大武舞戚”的图像》（《考古》1965年8期，413-415页）；注①引俞伟超、李家浩文；李学勤《“兵避太岁”戈新证》（《江汉考古》1991年2期，35-39页）；李零《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案：李学勤先生指出此戈图像同于下《避兵图》，这是研究此戈的关键突破，但他把图像中的“大”字形神物理解为“天一”则误。后来他在《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年4期，18-28页）一文中已从予说改正。拙作指出此戈图像乃“太一”符，“太岁”只是图中的“三龙”，而非图中的“大”字形神物，图中的“大”字形神物乃是“太一”。

③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共78页，图版177幅。

④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5期，33-55页；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1期，71-1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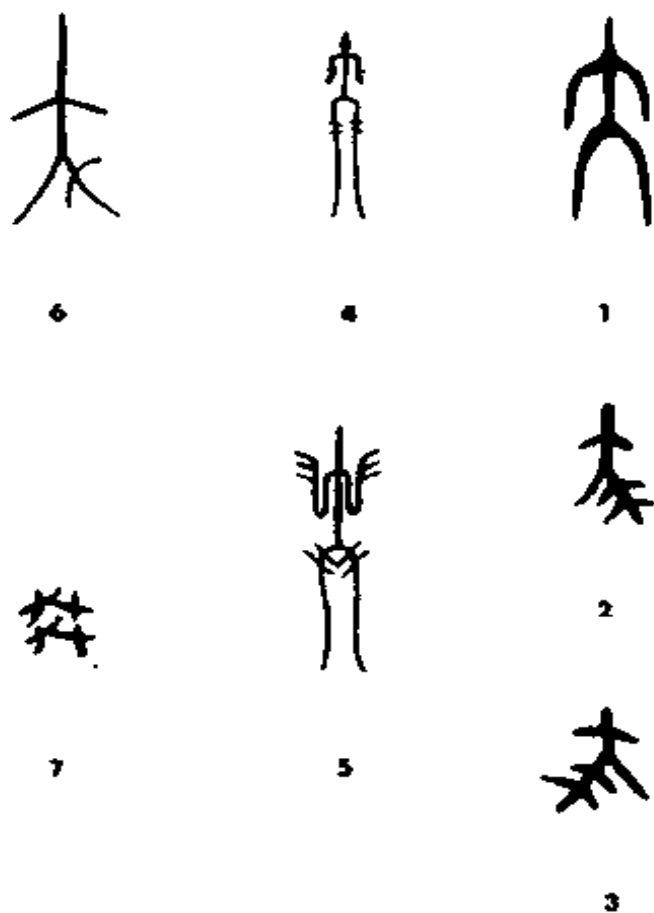
215

命、司禘、大水、二天子、冬山、既皆城。
 哉、猪、贖之、盥吉、占之曰吉。

台申又惠。

太、候土、司

图三五 包山占卜筒上的“太一”



图三六 与“大”字有关的字

1 大 2-5 篆 6 隶 7 隶

之义（用刑具加于颈或四肢），笔者释为“太”^①，疑即《九歌》中的“东皇太一”。简文的钞写年代为公元前 318 - 前 316 年，和“兵避太岁”戈年代相近^②。

① 参看李零“Formulaic structure of Chu divinatory bamboo slips”, *Early China*, no.15, pp.71-86 和《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一）》，中华书局，1993 年，425-448 页。

② 同上。

(三) 马王堆《避兵图》(图三七)。



图三七 马王堆帛书《避兵图》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墓出土^①，兼有图画和文

^① 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考古》1990年10期，925-928页；《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35页。

字。图是用青、赤、黄、白、黑五色绘成，图像与前者类似，据题记可知是以“太一”循行的方位来避兵。图的上部正中也有“大”字形神物，其身体为赤色，头亦戴“鹖冠”（但双羽变形作波磔形），上衣模糊不清，裤为青色（或黑色），左腋下标“社”字（用圆圈圈起），据题记即“大（太）一”。图的下部也有三龙，但形状、位置略有不同，三龙皆为双角鳞身四足之龙，手中的双龙移至图的下方：左手下方为前爪捧持火炉的黄龙（题记作“黄龙持炉”），龙作赤首黄身，炉作赤色；右手下方为前爪捧持水瓮的青龙（题记作“青龙奉容”，疑“容”读“瓮”）^①，龙作黄首青身，瓮作青色（或黑色）；胯下之龙，无题记，也作黄首青身。另外，此图还多出其他一些神物。一是在“大”字形神物的上身两侧多出的神物，左肩一侧的神物（在右），据题记是“雨巾（师）”，仅存头；右肩一侧的神物（在左），据题记是“雷公”，上着赤衣，下着带黑、白、青三色条纹的裳。二是在“大”字形神物的下身两侧多出的神物，据题记为四个“武弟子”，他们从右到左，第一人身体为赤色，头戴“山”字型冠（青色？），青衣（？）赤裳，持戈^②；第二人身体亦赤色，冠同上，上衣颜色不清，裳的形制和颜色同“雷公”，持剑；第三人身体亦赤色，冠不清，似着赤色的连体紧身衣（注意：其上叠印有第一人的痕迹，并非着青衣），据题记是着裘衣，可以避弓矢，故手中无兵器；第四人身体为黄色，冠同“太一”，衣似同于前者，持戟。

① 上引周世荣文所附摹本把“容”字误摹为“甕”。关于汉代瓮的形制，可参看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327页，图版83：17。

② 此戈在上引周世荣文所附摹本上看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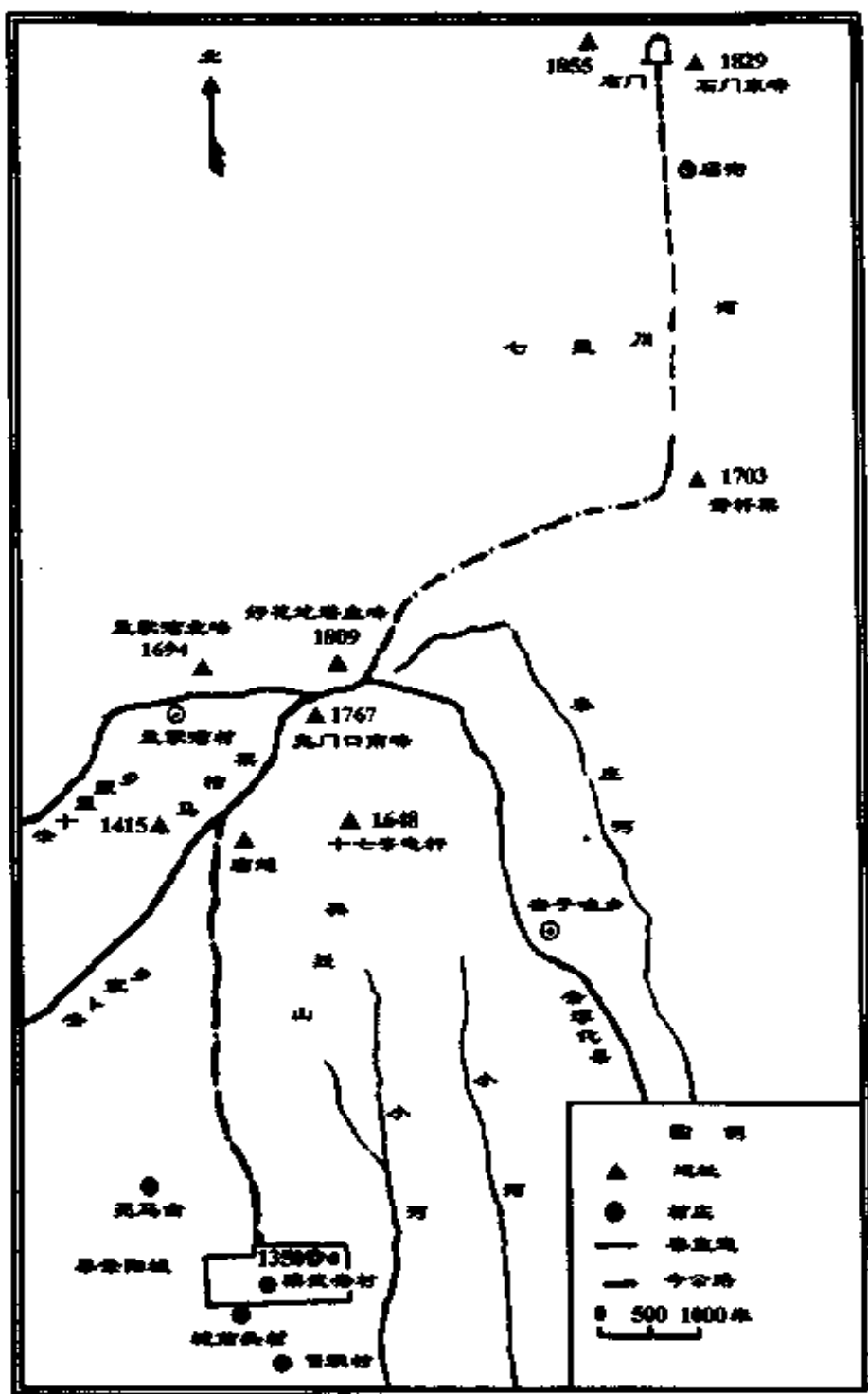
帛书的钞写年代约在公元前 179 - 前 168 年之间^①。

(四) 汉甘泉宫遗址 (图三八)。

1978 - 1986 年, 陕西淳化县文化馆多次对该县北 25 公里处的古甘泉山 (今名好花圪塔) 及周围地区的秦汉建筑遗址进行调查^②。这些遗址中最重要的是甘泉山主峰和其正南山脚下的两个遗址, 主峰遗址在甘泉山的峰顶、南坡和东坡。峰顶有一圆锥形夯土冢, 南坡为呈梯形的三层平台, 东坡也有一层平台, 占地约 35,000 平方米。其正南山脚下的遗址在今梁武帝村、城前头村和董家村一带, 为一东西约 880 - 890 米, 南北约 1,948 - 1,950 米的小城, 城内有若干建筑基址和水道遗迹。两遗址内散落着许多铺地砖、空心砖、板瓦、筒瓦和陶片等物, 其中尤以带“甘林”铭文的瓦当最值得注意。它可以证明汉代的甘泉宫就在这一

^① 参看李零《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应属避兵图》,《考古》1991 年 10 期, 940 - 942 页; 陈松长《马王堆汉墓帛画“神祇图”辨正》,《江汉考古》1993 年 1 期, 88 - 92 页; 李家浩《论〈太一避兵图〉》,收入袁行霈主编的《国学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277 - 292 页。案: 上引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未能理解此图是用于避兵,李学勤《“兵避太岁”戈新证》、李零《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论之。李学勤文把“兵避太岁”戈中的“大”字形神物理解为“太岁”即“天一”,所以把此图中的“大”字形神物旁题记中的“大(大)一”误释为“天一”(以为“大”字上泐去横画)。李零《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应属避兵图》虽指出此图中的“大”字形神物是居中宫的“太一”,但当时尚未意识到图中所绘即“一星在后,三星在前”的“太一锋”(陈松长、李家浩文也未指出这一点),李零《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始及之,并纠正李学勤文的误释。

^② 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 年 2 期,51 - 60 页; 王根权、姚生民《淳化县古甘泉山发现秦汉建筑遗址群》,《考古与文物》1990 年 2 期,1 - 4 页。



图三八 甘泉山一带的汉代遗址

带①。另外，沿穿越峰顶的秦直道，还有其他若干遗址可能与这两个遗址也有一定关系。

(五) 曹氏墓解谪瓶上的朱符(图三九)。



图三九 曹氏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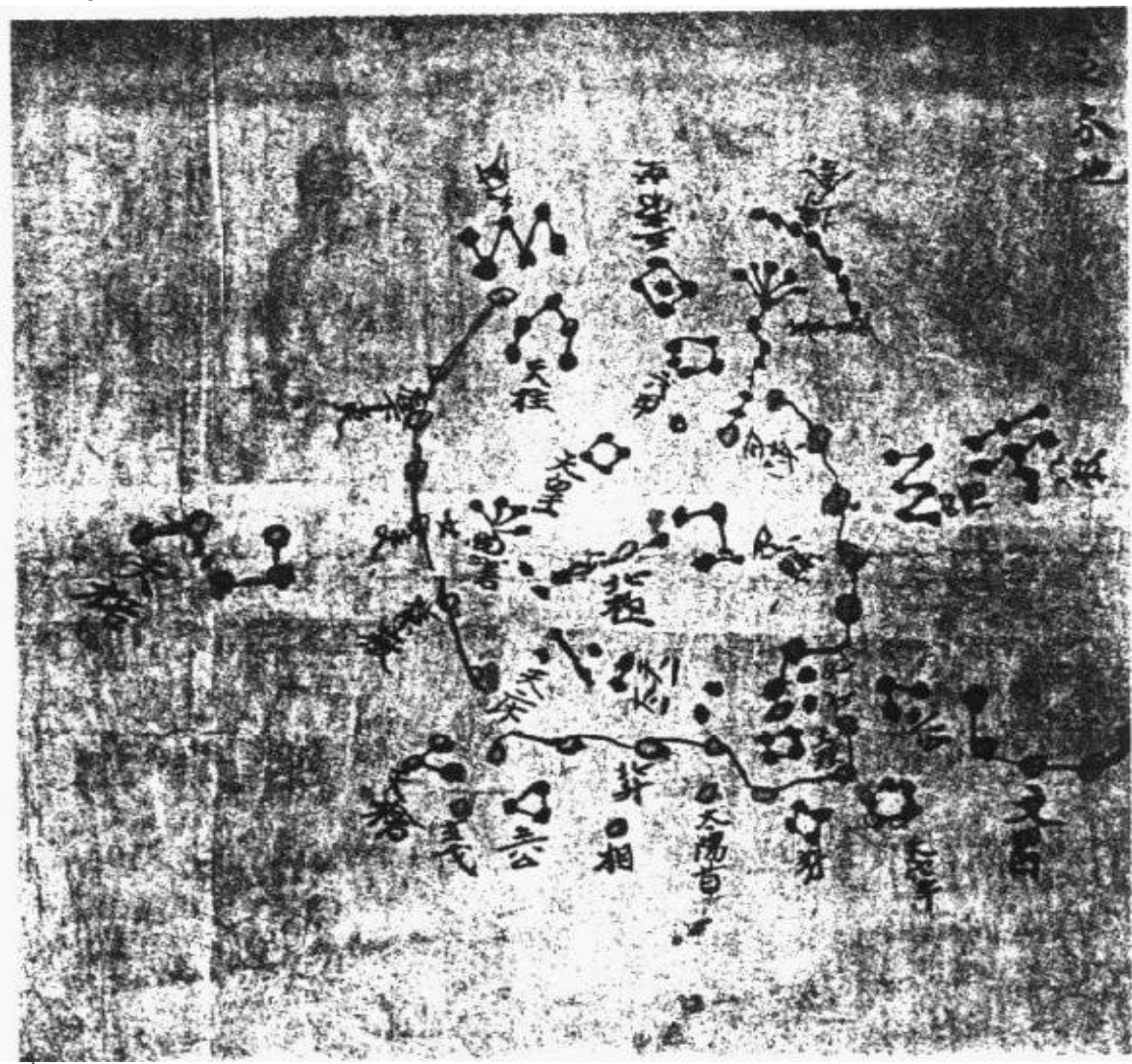
1972年陕西户县朱家堡曹氏墓出土②。其符缀于铭末，作左右排列。右边一符，上半为“土”字；下半的右边为“斗”和“鬼”两字；下半的中间为“月”字；“土”字的两横之间和下半的右边是五个“日”字。左边一符，外边所围是一类似篆书“允”字的符号，里边有一由四颗星组成，形状如Y的符号，符号上标“大天一”三字，左右两边书“主逐煞□鬼□□”。其书

① 参看王根权《甘泉宫考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84-89页；姚生民《关于汉甘泉宫主体建筑位置问题》，《考古与文物》1992年2期，93-98转67页。

② 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创刊号，44-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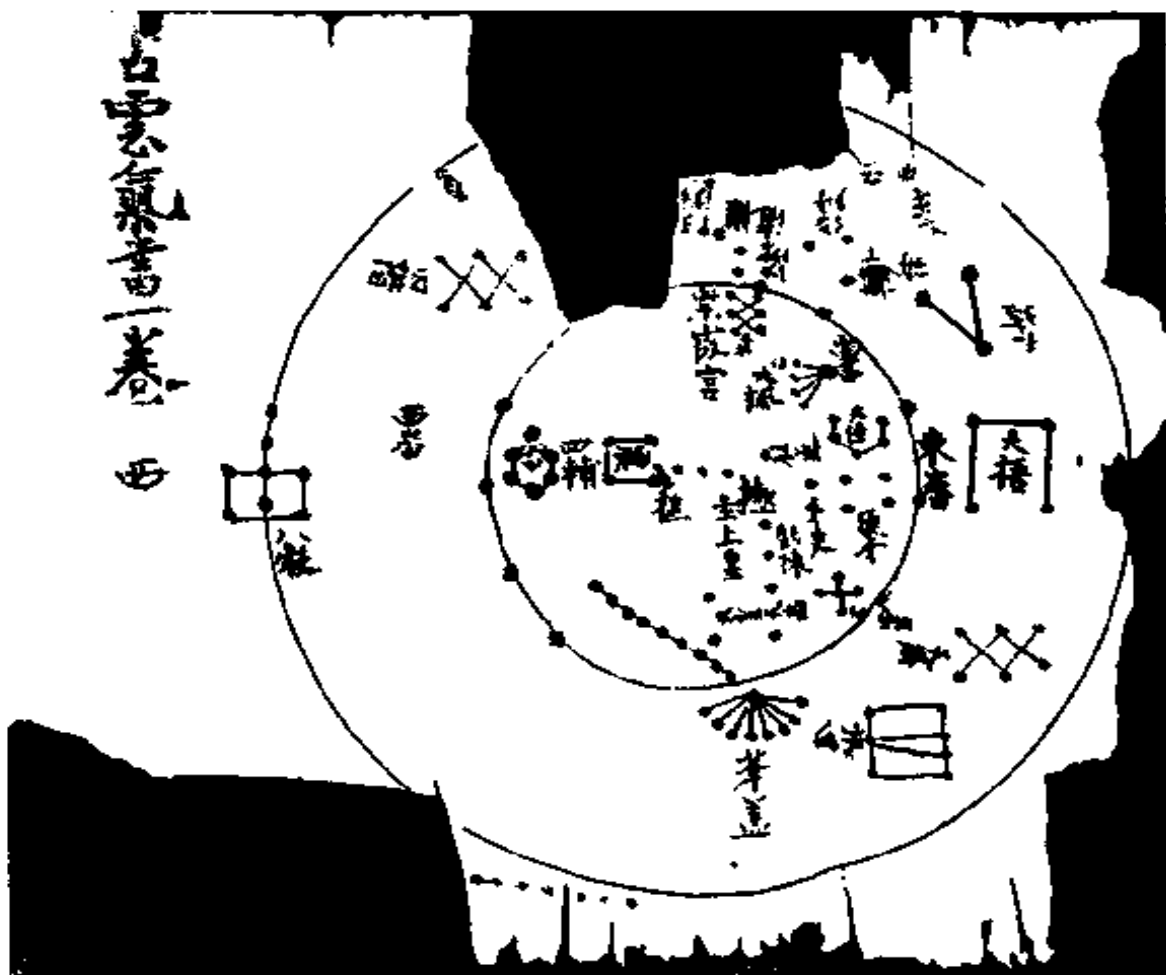
写年代为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 133 年）^①。

（六）唐敦煌星图（图四〇、四一）。



图四〇 敦煌星图甲本

^① 参看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 年 1 期，45 - 56 页。此文指出曹氏朱符的第二符，其中作 Y 字形的四星即“太一锋”，实为卓见。又拙作《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也有讨论。



图四一 敦煌星图乙本

有甲、乙二本。甲本是 1907 年斯坦因所得，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 S.3326；乙本是 1944 年向达先生在敦煌发现，现藏甘肃敦煌县文化馆，编号写经类 58 号^①。这两幅星图的紫微宫，甲本在北极五星和斗柄间标“太一”、“天一”各一星，在紫微右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图版一（甲本）和图版一二（乙本）。

垣外和斗口上方标“太”、“天”各一星。乙本也有“太一”、“天一”，位置与甲本相似，但斗口上方残缺。甲本钞写年代约在公元705-710年之间，乙本钞写年代约在公元900年左右^①。

上述材料涉及到“太一”概念从战国中晚期到两汉和唐代的发展，对于重新检验以往的研究无疑很重要。

四、分析与讨论

上述出土发现对我们的启发并不都是直截了当，有些要同文献对比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首先，经与《史记》、《汉书》对比，我们意外地发现，上述“兵避太岁”戈、《避兵图》的图像和曹氏朱符的第二符就是汉代所谓的“太一锋”。《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既立甘泉太畤，于同年（公元前112年）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天）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即用画有“太一锋”的“灵旗”摄护其军，直指敌国，祈求出兵能“旗开得胜”。这种“灵旗”，上面画有“北斗”、“日月”和“登龙”。“北斗”见于曹氏朱符的第一符（作“斗”、“鬼（魁）”等字），“日月”见于“兵避太岁”戈（作图形）和曹氏朱符的第一符（作“日”、“月”等字），“登龙”见于“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皆作三龙）。“太一锋”，据《汉书·郊祀志》晋灼注是“一星在后，三星在

^① 参看上页注^①引书：181-194页，席泽宗《敦煌星图》；195-198页，马世长《敦煌星图的年代》；199-210页，马世长《敦煌写本紫微垣星图》；211-222页，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

前”，与曹氏朱符的第二符作 Y 形的四星正好相合，对比可知，“一星在后”即“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中的“大”字形神物；“三星在前”即“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中的三龙。另外，《避兵图》中的“太一”何以要在腋下标“社”字，曹氏朱符何以要把“土”字与“斗”、“鬼（魁）”二字并书，这点也很值得注意。我们理解，这是因为“太一”和北斗皆居中宫，中宫于五行方位当土位（“社”字从土，为土地之神）。在出土物中，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所绘青龙、白虎和北斗二十八宿，其中的北斗也是由“土”、“斗”二字组成^①；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式于地门书“土斗戊”^②，也是类似之例。

“太一锋”星象结构的发现对重新理解以《史记·天官书》为代表的早期天文学体系很重要。这个体系是以“太一”、“北斗”、“二十八宿”和“日月五星”为框架，按中、东、南、西、北的顺序，从里向外讲。“太一”叙在最前，指北极五星中的亮星（“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其次为“天一”，则是位于斗口和北极之间的三颗星，形状如三角形，顶角朝向北极，亮度较差（“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它们是最重要的一组。另一组是“北斗”和与“北斗”有关的文昌六星和招摇、天锋（玄戈）。这些是中宫（紫微宫）最重要的星。再下来是讲分属于东、南、西、北四宫的“二十八宿”。再下来是讲“日月五星”。如果我们把这种宇宙模

^① 见《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上册，356页，图二一六，彩版一三，图版一二一、一二二。

^② 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12-31页，图一〇。

式比作钟表，那么“太一”、“北斗”就是指针，“二十八宿”就是刻度。例如古代的占卜工具——式就是模仿这种钟表，它们都有两套指针。如太乙、遁甲等九宫类的式都是以太一为枢，天一为针，循行九宫为特点；六壬式是以北斗居中，玉衡为枢，斗柄为针，循行十二位为特点。并且前者虽然是以太一行九宫为特点，但也常以古人视为斗枢的“招摇”居于中心，代替“太一”（如汉汝阴侯墓出土的九宫类古式和《灵枢·九宫八风》就是以招摇居中，表示太一）^①，后者虽以斗行十二位为主，但其值神有“天乙”、“青龙”、“太阴”，皆“天一”之别名，则与“太一”有关。子弹库楚帛书也是以十二月左行，青、赤、白、黑四木右行，表示这两类指针的循环。过去大家比较熟悉“北斗”类指针，而对“太一”类指针不详，考古发现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其次，对于探讨“太一”一词的来源和“太一”与“道”、“太极”一类概念的关系，这些考古发现也很重要。如包山楚简提到“太一”，其名作“太”，这点就很值得注意。由此，我们发现了许多相关的现象。例如：（1）“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中的“太一”神都是用形如“大”字的人形来表示，实际是以“大”字代指“太一”；（2）曹氏朱符的第二符把“太一锋”叫做“大、天一”，虽然我们可以把“大”理解为“大（太）一”之省，但也可能是以“大”代指“太一”；（3）《老子》除常以“一”称“道”，也有以“大”称“道”的例子，如其第二十五章

^① 前者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发掘简报》的25页图九；后者见《灵枢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142-144页。又参看《吴子·治兵》（《诸子集成》第六册：《吴子》，6页）和《礼记·曲礼上》（《十三经注疏》下册，1250页上）。《汉书·礼乐志》引《郊祀歌·惟泰玄》，颜师古注（《汉书》，1057页）说“招摇”也是“灵旗”所画。

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①，对比于《吕氏春秋·大乐》“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②，可见“大”正指“太一”；(4)《礼记·祭法》：“燔祭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③，称祭天之坛为“泰坛”，汉武帝立甘泉宫太一坛也把“太一坛”称为“太峙”。这些现象似表明“太一”的概念本来就可用“大”、“太”或“泰”来表示。另外，楚占卜简把“太一”当作首神，并提到“云君”(相当《九歌》的“云中君”)、“司命”(疑即《九歌》的“大司命”)、“司祸(过)”(即司中，疑即《九歌》的“少司命”)等神^④，这点与《九歌》其实很相似。过去钱宝琮先生受疑古派影响太深，总以为先秦文献中的“太一”与汉代的“太一”完全是两码事，得此可知其非。《九歌》把“太一”叫“东皇太一”，《文选》卷三二吕向注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⑤过去，钱先生以为此神既配东帝，则必非总领群神的至上神^⑥。其实这种把“太一”放在某一方向的做法同汉代的制度并无矛盾。例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汉武帝初兴太一坛，地点在长安东南郊，据谬忌说就是根据古制。后来匡衡和王莽等人主张在长安东

① 见《诸子集成》第三册《老子注》，14页。

② 见《诸子集成》第六册《吕氏春秋》，47页。

③ 《十三经注疏》下册，1588页上。

④ 参看李零“Formulaic structure of Chu divinatory bamboo slips”和《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

⑤ 见《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616页。

⑥ 见《太一考》，2454-2455页。

南郊祭“太一”也是援《礼记·祭法》为说，托之于古。甘泉太畤则把居中宫的黄帝置于西南。而且“泰帝”既可以是黄帝也可以是太昊（见上第二节），后者正是东方之帝。可见《九歌》把“太一”称为“东皇太一”是不足为怪的，它和汉代的“太一”恐怕还是有关。

第三，“太一”和“北斗”不仅是古代天文体系和式法中的重要指示物，在古人看来，其顺逆向背，还有避兵的作用。上面提到的“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就是起这种作用。曹氏朱符表明，这种图解的“太一符”还具有符书的作用。古代的避兵符是以太一、北斗和日月为主，如曹氏朱符的第一符是以北斗、日月为主，第二符是以太一和天一为主。“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的图像虽然是以“太一”和“天一”为主，但后者的题记也提到“北斗为正”。在传世文献中，《抱朴子·杂应》也提到“辟五兵之道”的各种符，如所谓“但知书北斗及日月字，便不畏兵刃”^①，正合于曹氏朱符的第一符；所谓“但诵五兵名，亦有验。刀名大房，虚星主之；弓名曲张，氏星主之；矢名彷徨，荧惑星主之；剑名失伤，角星主之；弩名远望，张星主之；戟名大将，参星主之”^②，《避兵图》也有执戈、执剑、着避弓矢之服和执戟的四神。他们应当也是代表星象，并与四方或四时相配。

第四，关于“太一”和“天一”在古代星图中的位置，这点也很值得讨论。过去钱宝琮先生已指出，“太一”应即北极五星中的北极或帝星^③。这点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天一”的位

① 《诸子集成》第八册：《抱朴子》，67页。

② 同上。

③ 见《太一考》，2459-2460页。

置却值得讨论。《天官书》说“天一”是阴德三星，位置在斗口上方，形状作三角形，如同《避兵图》和曹氏朱符的第二符所绘。敦煌星图上的“太一”和“天一”有两套，一套在斗柄的玉衡、天权二星（ ϵ UMa 和 δ UMa）之上，一套在斗口上方（距北极较远）。在《晋书·天文志》和《隋书·天文志》中前者叫“太一”、“天一”，后者叫“阳德”、“阴德”^①。另外《石氏星经》说“阴德二星在紫微宫内，尚书西”^②，它们都和《天官书》不合，应是后起的一种变化。“阴德”的位置和星数发生变化，原因可能在于它与“太一”总是形影相随，会随天极的位置变化而变化。上文既然已经提到古代天极有从小熊星座的 β 星向 α 星的换位，那么“阴德”可能也有对应的变化。当然这一变化到底应当怎样理解，恐怕还要做进一步推算。

最后，我们还想顺便讲一下，学者在讨论“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时，因为未能认出二图表现的图像就是古书中的“太一锋”，曾根据“太一”左右的“雷公”、“雨师”以定它们的置图方向（上北下南或上南下北）^③，其实在我们意识到它们表现的就是“太一锋”后，这种争论也就可以化解。因为“太一锋”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引夏鼐文 212-213 页列有《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和《敦煌星图》甲、乙本的对照表，其中(13)、(14)项甲本栏中的“天”、“太”是“天一”、“太一”之误，而(19)项甲本栏中的“天一”、“太一”是“天”、“太”之误，二者应互倒。

② 见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石氏星经》，《史记》，1290-1291 页。

③ 参看李零《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应属避兵图》；陈松长《马王堆汉墓帛画“神祇图”辨正》；李家浩《论〈太一避兵图〉》。案：李家浩文与拙作商榷，但未提及拙作《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

是一种与北斗相似，可以旋转的指针，正如我们不能说“北斗”应当指北还是指南，我们也不能说“太一”有什么固定的方向。特别是曹氏朱符的第二符，它所表现的“太一锋”是作三星在上，一星在下，同“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作一星在上、三星在下正好相反。这也足以证明，“方向之争”是无谓之争。

五、总 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试做总结：

（一）虽然现在我们还无从得知“太一”崇拜究竟起源于何时，因此也无法直接断定“太一”与“道”、“太极”这类哲学概念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证明“太一”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是一种兼有星、神和终极物三重含义的概念。它说明，钱宝琮先生认为“太一”在先秦时代是哲学概念，只是到汉代才演变为星名，然后再发展为天神中的至尊者，发展为天帝，并派生出与之有关的各种式法等等，这种估计其实并不正确。

（二）由于作为宇宙本体和原始创造力的“道”和“太极”，天象中的极星，以及天神中的至尊者，不仅在战国时代是一种共时的现象，而且它们在发生原理上也是属于可以互换互释的相关现象，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同出而异名”，而不是象钱先生判断的那样，是由本来毫不相干的东西一层层加上去，最后混为一谈。

这样的澄清，我想对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意义是很大的。

1994年1月22日写于北京菊门里

本文常用参考文献的版本：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3) 钱宝琮《太一考》，《燕京学报》12期（1932年），2449-2478页。
又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207-234页。
后书对旧作有少许修改。

(4) 凌纯声《秦汉时代之畴》，《民族研究所集刊》18期，113-143页。

(5) 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

(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补记】此文初以英文发表（“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aiyi (Grand One) worship,” translated by Donald Harper, *Early Medieval China*, vol.2 (1995-96), pp.1-39)。案：学者对“兵避太岁”戈和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的讨论仍多分歧，这里所论只是众说之一。拙见于戈铭是取俞伟超、李家浩释，图像之解则受李学勤、王育成启发。李家浩先生专以我为批判对象（于李、王之说不置一辞），除上所引，又有新作，曰《再论“兵避太岁”戈》（《考古与文物》1996年4期，28-35页），请参看。

“三一”考

在汉代的神祇崇拜中，太一崇拜最重要。与“太一”的研究有关，“三一”是个向乏明说、迄无确解的大问题。本文以饶宗颐先生的想法为基础^①，对这一问题试做探讨，不妥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一

《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立长安太一祠（约前 133 - 前 122 年左右），所祭神祇有三套：一套是采用亳人谬忌的“太一方”，是祭“太一”（“天神贵者”）和“五帝”（“太一佐”），在坛上，最尊；一套献方者佚名，是祭“三一”（“天一”、“地一”、“太一”），也在坛上，其次；一套亦不知何人所献，是祭“黄帝”、“冥羊”、“马行”、“太一”、“泽山君”、“地长”、“武夷君”、“阴阳使者”（“黄帝”与第一套的“五帝”重；“太一”亦重；“泽山

^① 饶宗颐《图诗与辞赋——马王堆新出〈太一出行图〉私见》，收入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79-82页。

君”可能是“绎山君”；“地长”可能与“八神”中的“地主”有关；“武夷君”见九店楚简，是“司兵死者”的神；“阴阳使者”可能与“八神”中的“阴主”、“阳主”有关)^①，在坛旁，又其次。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有“太一”。

上述神祇，献方者都说是“古者”就有，但在疑古风气下，学者多认为这是汉代造神运动的杰作，是“方士化的儒生”为了配合“三皇五帝”的造作特意编造出来的^②。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很多问题都得从新考虑。关于太一崇拜，我们曾做过专门讨论^③。笔者的看法是，楚占卜简中居众神之首的“太”应即“太一”；“兵避太岁”戈、马王堆帛书《避兵图》上的图形是图解“太一”和“天一”；其中的“大”字人形是“太一”，三龙是“天一”（“天一三星”）^④；而曹氏朱符中的“Y”字形符号，上面标注“大、天一”三字，则是这类图形的简化（但方向相

① “绎山君”，《汉书·郊祀志》作“皋山山君”。“八神”见《史记·封禅书》，为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武夷君”见九店楚简，作“武夷”，“夷”字从弓从土，参看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506页：简43。

② 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有童书业序、翁独健跋），蒙文通、缪凤林《三皇五帝说探源》，吕思勉《三皇五帝考》，《古史辨》第七册（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0-282、314-381页。又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四篇“三皇传说之起源及其演变”，《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75-189页。

③ Li Ling,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aiyi (Grand One) worship,” translated by Donald Harper, *Early Medieval China*, vol.2 (1995-96), pp.1-39.

④ 《史记·封禅书》作“太一三星”，《孝武本纪》作“天一三星”，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五上（中华书局，1983年）以后者为是。李家浩《再论“兵避太岁”戈》（《考古与文物》1996年4期）指出此点，很正确。

反)。这些发现可以证明，太一崇拜早在战国时代就已流行。现在剩下一个大问题是，“三一”既然同祠祭“太一”有关，本身也包含“太一”，它和“太一”到底是什么关系。

关于“三一”，学者多认为它与“三皇”有关，这是没有问题的^①。但过去大家说“三一”就是从“三皇”派生^②，这个假设却并不一定能成立。因为“三皇”的出现虽比《封禅书》要早，可是《封禅书》却并不一定就是“三一”的上限。

古人讲“三皇”，似以《周礼·春官·外史》和《吕氏春秋·禁塞》为早，但它们只以“三皇五帝”为称，并未详举其目；明言其目者，似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为早。《始皇本纪》引王绾、冯劫、李斯奏，谓“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说“泰皇”就是“人皇”，“盖三皇已前称泰皇”，是以“泰皇”为“人皇”的另一种说法。“人皇”而称“泰皇”，殆因“泰”字有至大至上之义，是以“人皇”为“最贵”的意思（“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在古代很流行）^③。“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其说见于许多古书，这是古人本来的讲法。比照“三皇”的“泰皇”，“三一”的“太一”也应是与“人”有关的概念。《鹖冠子·泰鸿》有“泰皇”与“泰一”的应对问答。《神农本草经》佚文也有“神农”与“太一小子”（或“太一子”）的应对问答（《北堂书钞》卷一五八、《路史·炎帝纪》、《太平御览》卷七

①② 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童书业序、翁独健跋），蒙文通、缪凤林《三皇五帝说探源》，吕思勉《三皇五帝考》。又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四篇“三皇传说之起源及其演变”。

③ 《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孝经·圣治》：“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列子·天瑞》：“荣启期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

八、九八四引), 其中的“泰一”和“太一小子”都是神化的人物。

这是我们讨论“三一”之前, 先要讲一下的有关情况。

二

研究“三一”, 从表面上看, 似乎还没有什么线索。因为在出土材料中, 我们好像并没有发现“三一”这样的字眼。但是近来饶宗颐先生有个想法很有意思, 我想把它介绍一下。

饶先生的意见是发表于一篇题为《图诗与辞赋——马王堆新出〈太一出行图〉私见》的文章中。他讨论的《太一出行图》即我称之为《避兵图》的同一帛书。饶先生的理解和我有点不同, 特别是他认为“图的主题是用兵不是避兵”, 更是专门批评我, 这里不必辩解。我想说的一点是, 文章第五节《青龙与黄龙》对我很有启发。我认为, 这对整个研究是重大突破。

《青龙与黄龙》节, 它的讨论对象主要是图中的“三龙”。这三条龙, 青龙在左下, 标注“青龙奉容”[案: “容”字, 饶文释“熨”, 乃袭周世荣释, 原件作“容”]^①; 黄龙在右下, 标注“黄龙持炉” (“炉”字原从金旁); 黄首青身龙在上, 无图注。其论证可摘要如下:

(1) 青龙和黄龙是秦汉之际的祥瑞, 如伯希和藏敦煌本孙柔之《瑞应图》(2683页)就提到“青龙, 水之精也, 乘云雨而上下, 不处渊泉, 王者有仁则出”, “黄龙, 四龙之长也。〔德〕至渊泉, 则黄龙游于

^① 见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 《考古》1990年10期, 925-928页。案: 笔者核对原件, “熨”乃“容”字之误。

池”。此外，黄龙作为祥瑞还见于《史记·封禅书》和伏侯《古今注》〔案：孙柔之《瑞应图》为齐梁古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七七有辑本，略有不同。饶文于《瑞应图》后注“2683页”，原文应作“P.2683”，P是伯希和名的缩写，非页码。《瑞应图》既说青龙是兴云作雨主水的神灵，又不住在地上的渊泉里，当然是天上的龙；而黄龙以色主土，为青、赤、白、黑四龙之长，和青龙相反，是以渊泉为归，游于池沼，也很明显是地上的龙〕。

(2)此图青龙注“青龙奉熨”，黄龙注“黄龙持炉”，其义亦可得而说。青龙所奉之“熨”指熨斗，王莽威斗盖仿之而作，故图记称“北斗为正”；黄龙所持之“炉”是冶炉，语与《越绝书》卷十一《外传·记宝剑》“蛟龙捧炉”合。“青龙”即苍龙，即太岁。黄龙即地龙，即地螾。马王堆帛书《刑德》乙本有《天一图》，图中“青龙”作“青能”，“地龙”作“地能”，应即青龙和黄龙。〔案：“《刑德》乙本”乃“《阴阳五行》甲本”之误。饶先生称为《天一图》者，“青龙”是外圈二十八神中的南方第四神，其“龙”字原作“龙”，不作“能”；“地能”有米字线为隔，应分读为“地”、“能”，乃内圈九神中的南方二神，不是地龙。“熨”字是“容”字之误〕。

饶先生的看法在细节上容有可商，但他以《瑞应图》为证，指出图中“三龙”即“三一”：青龙是天龙，代表“天一”；黄龙是地龙，代表“地一”；黄首青身龙则是“太一”的象征，我完全赞同。

三

饶先生的看法，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把“太一”和“三一”联系起来。

在上述图符中，“大”字人形有《避兵图》的题记为证，可以肯定就是“太一”，但三龙到底是什么？它除去代表“天一三星”是不是还有其他含义？过去并不清楚。这里以饶先生的看法为线索，再做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看法是：

(1) 在《避兵图》中，青龙、黄龙不仅是天龙、地龙，也是木、土之象（青为木色，黄为土色）或水、火之象（“瓮”读“瓮”为水之象，“炉”为火之象）。图中没有金象，应是寓金于土，由黄龙来代表（炉为冶器，乃铸金之具）〔案：“兵避太岁”戈于“大”字人形的两足下标日、月，可能有类似含义〕。此外，“青龙”为“太岁”的别名，与《淮南子·天文》表示“大时”的“咸池”有关；《天官书》说“轩辕”是“黄龙体”。它们还与“咸池”、“轩辕”有对应关系。青龙、黄龙是代表“天一”、“地一”。这是图解“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吕氏春秋·大乐》）的概念。《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类似表达^①。图中的黄首青身龙，从颜色看，显

^① “太极”又见《墨子·非攻下》和《庄子·大宗师》。今本《周易·系辞》的“太极”，马王堆帛书本作“太恒”（见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123页：二十三行下），二者孰是，学者有不同看法。如王葆玟《从马王堆帛书本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75-187页）、饶宗颐《帛书〈系辞传〉“太恒”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6-19页）以为“恒”是正字〔案：《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所收张岱年、余敦康、楼宇烈、许抗生、陈鼓应、黄沛荣、李定生文同其说〕，廖名春《帛书〈系辞〉释文校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2期，1-10页）、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27-35页）、朱伯崑《帛书本〈系辞〉文读后》（同上，36-46页）以为“恒”是“极”字之误。

然是合并青、黄二龙之色，即由前两种龙派生，是为“太一”（“三一”的“太一”）。三者的关系当是比照“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孝经·圣治》）的说法，即属于“两仪生三才”的概念。这种“三一”所含的“太一”和代表本体的“太一”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按“天”第一、“地”第二、“人”第三的顺序排列，“天一”、“地一”是正题和反题，“太一”是合题。“三一”和“太一”构成的图形与宋代的《太极图》在设计上有相似之处，也是用来图解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用来讲宇宙创辟、万物生化的大道理（当然不一定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2）古代式法选择有“太一行九宫”或“天一行九宫”之术，分“大时”和“小时”两种^①，“太一”居中为枢，“天一三星”围它绕行，巡行于九宫。古人把这种“前三后一”的四颗星叫作“太一锋”（《史记·封禅书》）。“天一”本指“天一三星”的第一星，即《避兵图》中用青龙代表的“天一”，所以古人也以“青龙”作它的别名。此外，“天一”主杀伐，古人还把这三颗星叫“阴德”或“太阴”，并以“太阴”为岁星反影，呼为“太岁”（《史记·封禅书》、《淮南子·天文》、《广雅·释天》）。古人以专指的“天

^① 见《太平御览》卷三四八引《太公兵法》、《易纬乾凿度》及郑玄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上册，32-33页）和《五行大义·论诸神》引《甘氏星经》、《黄帝九宫经》。参看钱宝琮《太一考》“太一九宫和天一六壬”节，《燕京学报》第12期，2471-2478页；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古史辨》第七册（中）第二三节“太一下行九宫和太一的分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89-203页；马克（Marc Kalinowski）《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华学》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2-110页。

一”作“天一三星”的总称，这和“太一锋”本来有四颗星，“太一”只是其中之首，因而用作这四星的总称是一个道理。《晋书·天文志》以来，古代星图把“天一三星”省为一星，我们估计就是以专指的“天一”代替泛指“天一”，而淘汰了“地一”和“太一”。早期的“天一”为什么要用三星？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我们怀疑，这很可能与它的“大小时”有关。因为三星可兼一正二奇：“大时”行四位（四正），可以三星中的“太一”当之；“小时”行十二位（四正八奇），则以三星全部当之。两者可用同一套指示物来表示。

总之，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太一”的了解比从前又进了一大步。以前我们就有一个看法，古代星象除天文的功用，往往还有占卜或宗教、哲学的功用。在后一方面，“太一”、“天一”比“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和“日月五星”更突出。它们比所有其他星象有更多的观念色彩，因此很难以纯粹的天文学眼光求之（如“天一”为暗星，就很难确指）^①。“三一”使我们的印象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① 《史记·天官书》以“太一”、“天一”为众星之首。它讲“太一”，说“中官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是以天极星（UMi α ）附近的亮星为“太一”所在。此星即北极五星中最亮的UMi β ，应无问题，但《天官书》讲“天一”，说“前列直（值）斗口，随北端兑（锐），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则存在争论。学者或以后世的“太一”、“天一”或“阴德”当之，不一定对。因为我们从原文的描述看，“天一”正好是在“太一”（UMi β ）和斗口二星（Dra α 、 δ ）之间，一星在近于北极的一端，两星在它前面，正对斗口，作三角形分布（顶角在北），亮度较差，若隐若现（这一带无亮星）。其位置应在 Dra μ 和 Dra 4、6、7、8、9 一带，即后世的“太一”、“天一”和“阴德”之间。

四

研究“三一”，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一种“三位一体”概念^①。这种概念在战国秦汉很流行，其典型说法是天、地、人“三才”（也叫“三仪”、“三极”、“三元”）。笔者认为，“三一”和“三皇”都不是源头式的东西，它们都是“三才”的派生物。“太一”（或“道”）是“两仪”（“天”、“地”）的源头，“两仪”是“万物”或“人”的源头，这是中国自然哲学的传统表达。

古人讲宇宙创辟、万物生化有很多不同讲法。在这些讲法中，除“气”的重要性^②，“水”也是活跃因素。

例如，最近发表的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其中就提到“太一”和“水”的关系（以下释文用宽式，凡通假字皆直接用破读字代替，缺文补在〔〕号内，脱文补在【】号内）^③：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

① 这里指“一分为三”或“合三为一”的概念。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序》曾以“三一”翻译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概念，两者并不一样。

② 参看裘锡圭《稷下道家精气说研究》、《〈稷下道家精气说研究〉补正》，收入所著《文史丛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6-50、51-58页。

③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124-126页。

【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寒热之所生也。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这段话是以“太一”为天地万物之源：“太一”首先生出的是“水”。有了“水”才有“天”，有了“天”才有“地”，有了“地”才有“神明”，有了“神明”才有“阴阳”、“四时”、“寒热”、“湿燥”，有了“阴阳”、“四时”、“寒热”、“湿燥”才有“岁”〔案：“寒热”原作“仓然”，《说文》等古书或以“仓”、“沧”、“沧”字表示寒义，使人以为属于同义换用，但战国楚文字“寒”、“仓”字形相近，二者也可能是形近混用〕。“水”的地位是介于“太一”之下，“天”、“地”、“人”之上。这同《避兵图》以“水”配“天一”，然后为“地一”，然后为“太一”有点相似。

古人尚水，比较有名的，还有《管子·水地》。但《水地》的说法和上面这段话有点不同，它更强调的是：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菴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

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目之所以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于淑湫。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

《水地》讲的不是“太一生水”，而是“地生水，水生人”。它是把“水”当作“地”与“人”的中间环节。

在《老子》一书中，“水”是道家“贵柔”之说的象征。后世道教对“水”也特别重视，如东汉道教有所谓天、地、水“三官”（也叫“三官帝君”、“三官大帝”、“三元大帝”）。“三官”是不是与“三才”有关？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五

最后，同“太一”和“三一”的概念有关，还有几个概念值得注意。

（一）“三气”和“九皇”。

《易纬乾凿度》、《白虎通·天地》等古书有太初、太始、太素“三气”说^①，学者多以为是汉代的创造。但认真考察起来，战国古书特别是道家的书都不止一次出现这类概念。如“太初”（或“泰初”）见于《庄子》的《天地》、《列御寇》及《列子·天瑞》，“泰始”见于《鹖冠子》。此外，《庄子·列御寇》还有寓言人物是以“泰清”和“无始”为名，似乎也与这类概念有关。特别是《鹖冠子》，它有两篇是讲“泰一”，其中不仅提到“泰始”，

^① 前者，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11、29页。

还提到“泰鸿”、“泰皇”和“九皇”，显然都与“泰一”有关。其文曰：

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也。故九皇受傅，以索其然之所生傅。……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泰皇问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一曰：“爱精养神内端者，所以希天。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时，陶埏无形，刻镂未萌，离文讲然者也。地者，承天之演，备载以宁者也。吾将告汝神明之极。天地人事三者，复一也。……（《泰鸿》）

入论泰鸿之内，出观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为物稽。天有九鸿，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傅，请成于泰始之末。……（《泰录》）

文中“泰鸿之气”可能是“太初”的别名。《易纬乾凿度》讲“三气”，说“太初”是“气之始”，“太始”是“形之始”，“太素”是“质之始”，皆天地未分、万物未生时的混沌之气。《淮南子·天文》把天地未形称为“太昭”。“太昭”恐怕也是“太初”的别名（“昭”与“鸿”含义相近）^①。又“泰皇”与“九皇”同时出现，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泰皇”是“人皇”的别名，“九皇”也是“人皇”的别名，它们都与“三一”有关。前人以为这种叫法是汉代才有，看来也要重新考虑。

（二）“黄泉”。

“黄泉”是指地下的泉水。《淮南子》往往以“九天”对“黄

^① 《吕氏春秋·执一》：“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高诱注：“昭，明；鸿，盛也。”

泉”（《修务》）或“黄垆”（《览冥》、《兵略》），其义与“九野”同（《原道》）。可见“黄泉”的“黄”是与“地”有关。《淮南子·地形》说“黄龙入藏生黄泉”，可见“黄龙”与“黄泉”也有关。楚帛书有“黄崩（渊）”，应即“黄泉”的本字^①。古书以“泉”代“渊”例子很多，皆避唐高祖讳改字。如《淮南子·天文》说“日入于虞渊之汜”，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卷一、《初学记》卷一引“虞渊”皆作“虞泉”。汉代于朝那（今宁夏固原）设湫渊祠（《史记·封禅书》），今本《说文解字》卷十一上“湫”字和《水经注·河水二》“湫渊”皆作“湫泉”，就都是经唐人改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三天”和“三清”。

古书常见“九天”，是一种九宫图式的平面布局。古人如何表示其高下层次？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楚帛书有“三天”，林巳奈夫指出道教也有“三天”^②。道教的“三天”，一说是“玉清”、“太清”、“上清”，即“三清”；一说是“太赤天”、“禹余天”、“清微天”。《抱朴子·杂应》有飞升之法，云乘“飞车”，“上升四十里，名曰太清”，是以“太清”为四十里之高。道教黄白术有“禹余粮”和“太一禹余粮”（后者或作“太一余粮”），亦以“禹余”为名^③。

（四）“泰山”。

^① 古书只有“黄泉”没有“黄崩”，故商承祚释“崩”读“泉”，见所著《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9期，8-20页。拙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从之，应纠正。

^② 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东方学报》36卷（1964年），53-97页。

^③ 见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

古人称天地万物之始为“太极”，天神之尊为“太一”（或“泰一”），人祖之尊为“泰皇”。泰山为五岳之尊，称“泰”是同一道理^①。

1998年2月10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1998年5月1日改定于北京蓟门里。

【补记】本文引用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最初是据崔仁义《荆门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初探》（《荆门社会科学》1997年5期，31-35页），当时正式释文尚未发表。现在《郭店楚墓竹简》已经出版，我们对这段引文有所修正。

^① 泰山，见《诗·鲁颂·閟宫》、《左传》隐公八年、《论语·八佾》等先秦古籍。

地
书
发
微



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

中国早期的地理观念，直观性和整体性很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以“大视野”三字概之，讲一点粗浅体会：

（一）天地相应的概念。

《易·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个“俯”和“仰”关系很大。古人观天，直观印象是天作球形悬转；而察地，直观印象是地作平面延伸。前者同后者相切，只有半个球面可以让立在地面上的人看到。所以他们把天看作覆碗状，比喻成车盖或穹庐；地看作方板，比喻成车箱或棋盘，叫“天覆地载”[案：所以“地”也叫“舆地”，“地图”也叫“舆图”，参《淮南子·原道》]。中国古代的天论（即宇宙模式）有所谓“三家”或“六家”，但早期真正流行的是“盖天说”。“盖天说”的“天”和“地”有一定矛盾，前者圆隆，后者方平，两相扣合，四角不掩，但古人仍按投影关系把二者整合在同一坐标体系内。例如古人模仿“盖天说”做成的占卜工具——六壬式就是把天地做成磨盘的样子：圆形的天盘是扣在方形的地盘上，沿着固定的轴旋转，二者有对应的干支和星宿（出土古式，天盘多作圆饼状，但上海博物馆藏六朝铜式的天盘是隆起的）^①。特别是《淮南子》的《原

^① 参看拙作《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89-176页。

道》和《天文》还把天宇和地面同样按九宫格来划分，称前者为“九天”，后者为“九野”〔案：《天文》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抄《吕氏春秋·有始览》。它以“九天”和“九野”相套，表示星野的概念，但并不是说“九天”等于“九野”〕，连方圆的差异都可忽略不计。过去，我读《孙子·形》，不懂它讲的“九天”、“九地”是什么意思，以为是九重天、九层地，后来才明白它就是《淮南子》讲的“九天”、“九野”，其实是平面概念。同样，遁甲式的“九天”、“九地”也是这个意思^①。二者是对应安排。古人讲地理虽可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是天文，东西是靠昼观日景，南北是靠夜观极星。他们是在“天”的背景底下讲“地”，所以“地”的总称是“天下”。

（二）四方和极至的概念。

古人讲天、地、人“三才”，人是介于天、地之间。但天是神的世界，地是人的世界。人与地比人与天关系更密切。古人讲地理，从来都是人文地理。凡与“人”有关的活动（如农业、土木工程和军事）多与“地”有关。例如古代兵家有个传统，为将者要上知天文（明习式法、风角等术），下知地理。可是古代战争主要是在地面上进行，“地”的重要性自然比“天”大。《孙子·计》讲庙算有“五事七计”，“天”、“地”皆在其中，但书中讲“天”没有专篇，讲“地”则有《行军》、《地形》、《九地》三篇，占了很大篇幅。它所说的“地者，高下、广狭（狭）、远近、险易、死生也”（此据银雀山竹简本，今本无“高下”），其中除“死生”是兵家特有的概念，其他都是一般地理学所常用。“远近”是长

^① 参看拙作《〈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06—310页。

度，“广狭”是宽度，“高下”和“险易”是高度和倾斜度。

如果撇开“天”不谈，光说“地”，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地”是由两条射线穿越观察点作十字交叉，向四个方向作平面延伸（没有曲率）。这两条射线，古人叫“二绳”；四个方向，古人叫“四方”（方有旁、侧之义）。与“四方”的概念配套，古人还把“四方”之间的平分线叫“四维”（“维”也是绳索之义），并把“四方”代表的方向叫“四正”，“四维”代表的方向叫“四隅”（“隅”是夹角之义），由此构成米字形的“四方八位”（现在也叫“四面八方”）。“四方八位”在世界上是一种普遍概念，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例如美国西雅图的街道名往往就是按“四方八位”来标识，即以它的市中心(downtown)为中宫，把周围分成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块，组成一个九宫图。中国古代讲“四方”，最典型的图式是“钩绳图”^①。“四正”是由子午（南北向）和卯酉（东西向）“二绳”来表示，“四隅”是由“四钩”，即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夹角来表示。

与“四方”的概念有关，古人还有许多与“四”字有关的地理概念，如“四郊”、“四野”、“四国”、“四土”、“四望”、“四陲”、“四封”、“四裔”、“四海”、“四荒”等等。这类概念的四个方向都是以观察者的眼睛所在为中心。古人把观察者的眼睛所在视为一种“极”（端的意思），而把他由近及远望出去的眼界范围视为另一种“极”，称为“四极”，所以“四位”同时也是“五

^① 法国学者马克（Marc Kalinowski）的《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把这种图称为“钩绳图”，见《华学》第1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2-110页。

位”，“八位”同时也是“九位”。这种“极”和电视上讲李乐诗登“三极”（南极、北极、珠峰）的“极”不同，完全是平面上的“极”。古人用以表示视野范围，除“四极”之外还有一个词是“四至”。例如《左传》僖公四年讲“齐太公之命”，就是用“四至”表示征伐范围，西周铜器铭文讲土地诉讼也是用“四至”表示田界范围。这种“四至”虽然总是讲“东至于某，西至于某，南至于某，北至于某”，强调的是“四正”，但实际上却常常是用立于“四隅”的“四封”（封土堆）来标识。也就是说是用四个角来卡定四条边。

（三）九宫和空间的概念。

古人为什么要讲“天圆地方”？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虽然“天圆”比较直观，但“地方”却不一定。人所看到的地平线其实也是圆的，并没折角。从道理上讲，由二绳、四维构成的地平面，我们既可以把它画成方形，也可以把它画成圆形。画成圆形，可与天图密合，没有四角不掩的问题，本来更直观也更方便，但古人为什么还要把地理解成方形呢？我想这大概与视野的表现形式有关。熟悉绘画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视野可以用焦点透视，也可以用散点透视。比如中国的山水画就有散点透视的传统。我们观天，因为是仰观，视野比较开阔，焦点透视比较方便；但察地可就不一样了，你立在地面上看，必然看不远，看见的只是一小片，大面积的观察，如果不借助于抽象，只能一小片一小片往起拼，采用散点透视。焦点透视，只有一个十字坐标，视野是辐射状的圆图，其远近距离和层次感是用同心圆，大圆圈套小圆圈来表现，而面积分割也是像切蛋糕那样，作扇形分割，这在实际使用上是不大方便的。而散点透视就不一样，一个十字坐标可以变成很多十字坐标，很多十字坐标也可以变成一个十字

坐标，便于分割，便于拼接，也便于计算。它的特点是化线为块，化圆为方。中国古代的方块图形是从上面讲过的十字图或米字图发展而来。比如十字图用块图代替线图是“四方”加“中央”的五位图，米字图用块图代替线图是“八位”加“中央”的九宫图。后者包含前者，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图。例如邹衍的“大小九州”，小九州是九宫图，大九州也是九宫图，内外都是九。还有《周礼》等古书讲到的里制，它是以方里为基础。古人说的方里和井田是一回事，它是由一井九顷之地构成的一个九宫图，但方里以上有两种拼联法，一种是按四进制，也就是所谓井、邑、丘、甸、县、都的制度；还有一种是十进制（即方1里等于 1×1 平方里，方10里等于 10×10 平方里，等等），则是所谓井、通、成、终、同、封、畿的制度^①。还有古书中的国野制和畿服制，古人也习惯于把它想象成大方块套小方块，而不是同心圆。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以“计里画方”（语出胡渭《禹贡锥指》）为基础，局部是“方”，整体也是“方”。它对土地面积的测量、计算都很方便。例如《九章算术》头一章就是讲“方田”，它是以“方田术”作基础来研究其他形状的田，如“圭田”（等边三角形）、“邪田”（直角三角形）、“箕田”（梯形）、“圆田”（圆形）、“宛田”（球冠形）、“弧田”（弓形）、“环田”（圆环形），有一整套化圆为方的计算方法。方形比圆形好计算，那是十分显然的。中国古代的地面设计，不但田是方的，房子是方的，城郭是方的，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是方的，而且用以绘制地图的网格也是方的

^① 参看拙作《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文史》第28辑，59-75页；《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学人》第2辑，江苏文艺出版社，224-256页。

(参裴秀“制图六体”)。所以也就难怪古人要把地平面想象成一个大方块。

(四) 山海的概念。

《山海经》把地平面划分为“山”、“海”两大类，“海外”包“海内”，“海内”包“山”，“大荒”和“海外”意思相同。有人以为“山”就是指山地，“海”就是指海洋，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第一，古人所说的“海”初义并不是“海洋”之“海”(即《说文》称为“天池”的那种“海”)。在古书中，“海”训晦(《释名·释水》、《广雅·释水》)，本来是指“昏晦无所睹”(《尚书考灵囿》)、“荒晦绝远之地”(《荀子·王制》注)，引申为“海洋”之“海”，只是因为古人观海，极目远眺，空阔无边，正是这样的荒远之地。例如楚帛书“山川四海”就是把“海”写成“晦”；《山海经·海外南经》“四海之内”，《淮南子·地形》引作“四极之内”；齐楚召陵之役，楚成王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左传》僖公四年)；《尔雅·释地》以四方蛮夷戎狄之地为“四海”。这些“海”就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海”。同样，《山海经》的“海”，细读原书可知，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海”，而只是表示荒远之地。“海洋”之“海”，即百川所归之“海”，古人多称为“沧海”或“瀛海”，“沧”以象其色(字通“苍”)，“瀛”以状其大。例如邹衍讲“大小九州”，环绕“小九州”有“裊海”(小海)，环绕“大九州”有“大瀛海”(大海)，就是这样的“海”。当然，古人所说的“海”，既有亲眼所见，也有推导而得。例如齐威、宣、燕昭和秦皇、汉武派人人海求仙的“海”主要是今天的渤海或黄海、日本海这一带，而孙权派人人海求壘州、夷州的“海”则是今天的东海或南海一带，再晚如法显、郑和等人的航海则更远，还包括南至马来群岛，西抵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但

中国早期文献讲的“海”主要是环绕中国大陆东部和南部的“海”，对其他两面的“海”毫无所知。邹衍设想的四面环绕大陆的“大瀛海”，西、北两面都是按对称原理推出来的。

第二，古人所说的“山”也不简单就是山地，而是有两重含义。一是与“海”（“海洋”的“海”）相对，代表大陆，就像古人把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叫“三神山”，是指高出海面的陆地部分。二是与“水”（河流）相对，像日月星辰代表“天”之“文”，它是代表“地”之“理”。古人讲“地理”（重点是内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山”，一条是“水”，《禹贡》主水（《河渠书》、《沟洫志》、《水经注》亦侧重于水），《山海经》主山，但讲“山”必及于“水”，讲“水”也必及于“山”。二者互为表里，不仅可以反映地形的平面分布，也涉及其立体的“高下”和“险易”。古人对“地”的认识虽然主要是平面概念，地表以下，他们因打井和采矿才略有涉及，知道的只是“黄泉”一类地下水和各种矿物，对地壳的构造不能深入了解。但地形分类的概念，古人还是很重视。例如《管子·地员》和《尔雅》的《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篇就对高山、丘陵、原隰和川谷做了详细分类，“山”者概其高，“水”者括其下，是一种提纲挈领的东西。另外，象《淮南子·天文》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还以神话形式生动表达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总体印象（西北高而东南低，河水多东流而注海）。

（五）九州的概念。

“九州”是古代华夏民族对中国大陆的“核心部分”即其活动范围的一种板块划分。这种划分有双重考虑，一是按山水走向

把它划分为九个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二是按职贡朝服把它划分为九个不同的行政区划。“州”字，《说文》的解释是“水中可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禹贡》讲大禹治水有所谓“导九河”，“九州”就是配对于“九河”。这样的“九州”应与九宫图式的设计有关，但要把上述两种考虑纳入同一体系，并且严格按九宫图来划分，实际做不到，只能看作寓含这类设计的一种弹性网格。在古书中真正按九宫图划分“九州”的只有《淮南子·地形》，这种“九州”，名称与《禹贡》不同，如果上应天星，则与“九野”的概念相同。

古人所说的“九州”也叫“禹迹”，所谓“芒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虞人之箴》）。“禹迹”这个词，古书极为常见，不仅商人的后代追述其族源要说自己的先祖是住在“禹迹”（《诗·商颂·长发》），周人的后代也一样（《诗·大雅·文王有声》、《书·立政》和《逸周书·商誓》）。特别是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如秦公簋和叔弓钟也分别提到“禹迹”和“九州”，早为王国维所注意。他说：“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案：指齐、秦〕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批评疑古派“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在方法上有问题^①。

“禹迹”或“九州”，有出土发现为证，不仅绝不是战国才有的概念，可以上溯于春秋时代，而且还藉商、周二族的史诗和书传可以上溯到更早，显然是一种“三代”相承的地理概念。这种地理概念是一种有弹性的概念，虽然夏、商、周或齐、秦等国，它们的活动中心或活动范围很不一样，但它们都说自己是住在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收入《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册，264-267页。

“禹迹”，这点很值得注意。它说明“九州”的大小和界划并不重要。并且从古文字材料我们已经知道，古书所说的“雅”字，比如《诗经》中《大雅》、《小雅》的“雅”，本来都是写成“夏”^①。可见“夏”不仅是一种地域狭小、为时短暂的国族之名，而且还成为后继类似地域集团在文化上加以认同的典范，同时代表着典雅和正统（雅可训正），与代表“野蛮”的“夷”这个概念形成对照，为古代“文明”的代名词。春秋时代，中原“诸夏”强调“尊王攘夷”，使“夷夏”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这方面，秦是一个好例子。这个国家，不但其贵族本来和山东境内或淮水流域的夷人是一家，而且族众也是西戎土著，一直到战国中期的秦孝公时仍很落后，“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视之”（《史记·秦本纪》），但有趣的是，就连他们也是以“夏”自居。证据有二，一是上面提到的秦公簋，二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后者涉及秦的归化制度（即现在的移民法），规定秦的原住民叫“夏”，归化民叫“真”，只有母亲是秦人，孩子才算“夏子”，如果母亲不是秦人或出生于外国则只能叫“真”不能叫“夏”。所以“九州”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

（六）中轴线的概念。

这个问题主要与城市规划有关。古代城邑聚落的分布，本来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往往都是沿山川道路的走向作点线延伸，初疏而后密；城市本身的规划，也不见得都是事先设计好

^① 古书“夏”字和“雅”字通假的例子很多，如《荀子·荣辱》“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同书《儒效》有类似语句，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左传》中齐国的公孙灶字“子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作“子夏”。

的，完全像《考工记》所述，九经九纬十二门，四四方方，整整齐齐。但在古人的心目中，这种非尽人为、不尽整齐的背后还是有四方、九宫一类的考虑隐为其枢。中轴线的概念就是这种考虑的体现。

中轴线，从表面看也就是确定城市基址的一条南北线，即“二绳”中的子午线，但实际上却是代表整个城市坐标的一个“大十字”。只不过它是先把南北基线定下来，才在这条基线上截取一点（可能偏北偏南，不一定正好是平分点），作为城市中心，在那里建宫城一类中心建筑。古人重“面背”胜于“左右”，所以总是先南北（即“面背”）而后东西（即“左右”）〔案：中国古代常以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为正〕。中国现代城市有时是以一个十字形大街为中心向外拓展，把这种大街叫“大十字”，如西宁（甚至很多小村子，比如我的家乡，都有这样的中心，也叫“十字”）。古代城市也有类似设计，但不一定有明显的卯酉线，即穿越中心点的东西大道。现在讲中轴线，大家都拿北京当范例。北京的中轴线是起正阳门或永定门，穿天安门和故宫，直抵鼓楼。最近发表的材料还表明，汉长安城也有一条大中轴线，穿越长安城，向南向北延伸，南起子午谷，北抵天齐祠，全长74公里（图四二）。据研究者推测，它甚至可能与更大范围的空间坐标有关^①。可见这类设计早已有之。《书·召诰》讲周公营建洛邑，有“相宅”、“卜宅”和“攻位”等程序（图版八：1），我们怀疑书中的“攻位”就是属于确定基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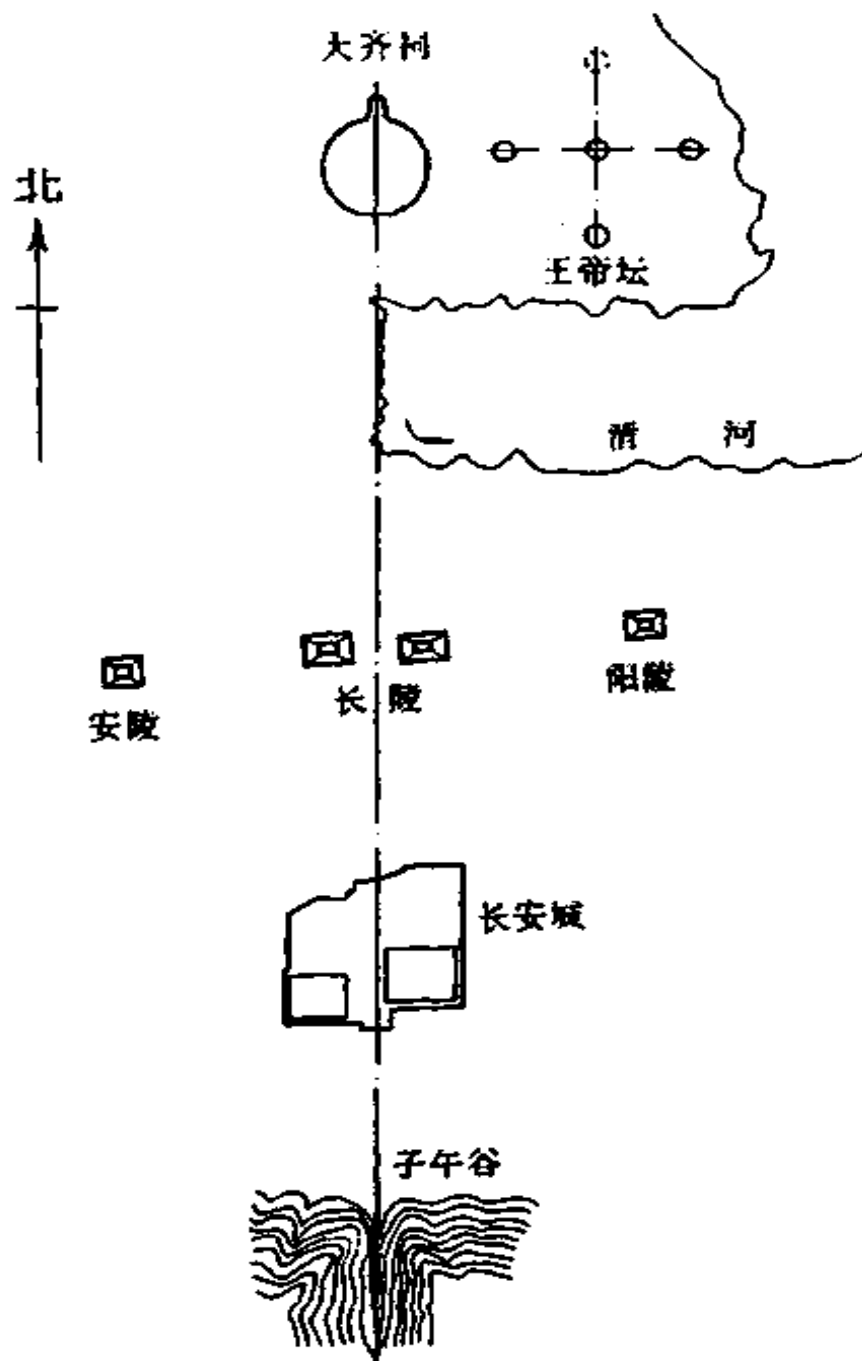
^① 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3期，4-15页。

古代的国都规划体现的是“四方之极”（《诗·商颂·殷武》）^①，“四方之极”的“极”也就是东、西、南、北、中的“中”。古人认为国都（古代叫“国”）同时也是国土（古代叫“邦”）之“中”，外面不仅有四郊、四野，还有四土、四方，本身就是一个“大十字”的中点。例如《史记·周本纪》讲周公营建洛邑，他曾说“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犹西语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出土西周铜器何尊的铭文也说，早在周人克商之初，武王就已打算营建洛邑，说是“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案：古代“邦”是国家，“国”是首都，汉以来改“邦”为“国”造成混乱，但“中国”是本来的叫法。它不是“中央国家”的意思，而只是“中心城市”的意思，和“天下之中”是同义语〕。可见在古人看来，这种中轴线，它所代表的不仅是城市本身的坐标，也是整个国土的坐标，城里边的“大十字”同时也是城外边的“大十字”。

（七）古代帝王的“周行天下”。

上面所说的“地理大视野”，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结合着实地考察、地志记录和舆图绘制，靠人“跑”出来的。我们在上面讲过，它不是通过一个点来认识，而是通过很多点来认识。人们是带着眼睛到处跑或集合很多人的眼睛，才拼出全景。中国古代的旅行，最简单的一种是靠步履，如相传大禹治水就是靠步行。他的步法很特别，据说因为“三过家门而不入”，过于辛苦和劳累，造成“四肢不用家大乱”（见马王堆帛书《养生方》），不但性功能出了障碍，而且走起路来像个瘸子。后世的方士还专门学

^① 参看唐晓峰、齐慕实《〈四方之极〉一书简介》，《中国历史研究动态》1984年2期，27-30页。



图四二 汉长安城的中轴线

他这种步法，叫“禹步”或“步罡”。他脚丫子走过的地方，也像好莱坞影星踩下的脚印，金贵得很，上面已经提到，是叫“禹迹”。还有是靠车马舟楫，例如《穆天子传》讲周穆王驾八骏，北绝流沙，西登昆仑，就是靠车马；而齐威、宣以来的航海则是靠舟楫。据出土发现，至少商代已有车马，秦代已有大船。所以无论陆地还是海洋，古人都能走得很远。

古代旅行，很可注意的是帝王的旅行。这样的“周行天下”，从穆王西游、昭王南征到秦皇、汉武的巡游，以至于乾隆下江南等等，都不是兜风解闷寻开心，而是和国土控御有关。中国的“大一统”很有传统，在行政效率不足的古代，控制广大地面得有特殊办法，君王视察是重要一着。他们的巡狩不光是“检查工作”，还往往登名山、涉大川，在山头水边祭祀。比如《山海经》里面的那些祭祀（用牲牢圭璧沉埋等等）就是属于这类祭祀。而在这类祭祀中，祭山比祭水更重要。名山是国土“四望”中的制高点，可以让人有一种“登临出世”、“与天齐一”的感觉。古人把在名山上筑坛祭天和在名山下除地祭地叫“封禅”，《史记》的《封禅书》就是以讲这类活动为主，并包括比五岳封禅范围更大的海外寻仙，以及比五岳封禅范围更小的郊祀。海外寻仙，不光是求仙访药，还是为了发现“新大陆”或“新边疆”（这等于那时的“地理大发现”或登月探险），从李少君的话可知，其实是扩大了封禅。这是最大的一圈，其次一圈是五岳封禅，再次一圈是郊祀。古代的海外寻仙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战国中期以来齐、燕等国的寻仙，第二次是秦始皇时代的寻仙，第三次是汉武帝时代的寻仙。汉武帝以后，这种海外寻仙才开始衰落，到孙权派人寻仙已是尾声。李白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梦游天姥吟留别》），“五岳寻仙不

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魏晋以来，人们对入海求仙已失去信心，觉得虚无缥缈，不如“山”来得近便，所以大家一股脑儿全改入山求仙。比如葛洪的《抱朴子》就是老讲入山的各种要领，如何避鬼魅，如何防虎狼，如何忍饥渴等等。汉代的郊祀很有意思，本来的郊祀，比如载籍所讲的先秦古制只是在城郊附近祭祀，但汉武帝时，他的地盘太大，首都也跟着膨胀，长安城外的三辅比现在连郊区县在内的整个北京市还大，他祭天（太一）要北走山路跑到今陕西淳化县甘泉山上的甘泉宫，祭地（后土）要东渡黄河跑到今山西万荣县的汾阴后土祠，祭五帝和陈宝要西行到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活动半径将近200公里。汉武帝死后，皇帝都懒了，于是不断有人倡议恢复古制，停止这种远距离的郊祀。结果时罢时复，直到汉平帝时才由王莽建议彻底废除。汉武帝之后，不但海外寻仙不再吃香，五岳封禅少有人跑，就连原来的郊祀范围也被大大缩小，所以《汉书》干脆把《封禅书》改叫《郊祀志》，最后只剩下类似明清天、地坛的那种郊祀，古代帝王“周行天下”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案：每个朝代只有盛世的皇帝才爱到处乱跑〕。

（八）绝域之行。

古代长距离、大范围的旅行，除帝王外，还有帝王派出的使者、贸易商旅和求法僧人（和尚比道士跑得远），远远超出国土之外。中国古代的域外探险范围很大，过去大家习惯说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喜欢封闭，吃亏就吃亏在不航海。这个印象本身就是一个“海外奇谈”。其实，至少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我们的域外探险还是很发达。比如《穆天子传》，即使作战国文献看，我们西行已经很远，后来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人也跑过很多地方，几乎整个亚洲大陆都被穿行，西边已接近南欧。而航海，我们也起步很早，战国时代已很发达，它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整

个中国海域，早就到达朝鲜、琉球、台湾一带，而且还向南到达马来群岛、东南亚、印度和非洲东岸，除好望角以西，中国海以东，还有南边的澳洲，也是该去的地方都去了。眼界范围包括一大洲两大洋，一点也不比同时的西方逊色^①。

（九）中国古代地理思维中的模式化倾向。

从上述（一）至（六）条，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地理思维有一种倾向，这就是它总喜欢把事实上边缘很不整齐、内部差异很大的东西塞进一种方方正正，具有几何对称性的图案之中。这很容易使人感觉好像削足适履，勉强得很。但我理解，古人的头脑还不至如此简单，连真实的东西和模式化的东西都分不清。实际上，他们的作法只是想用一种抽象的东西来化简差异，控制变化，使其直观性和整体性能够统一起来。所以尽管古人在心里揣着不少理想设计，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并不会把二者等同起来。

总之一句话，中国人不仅会“跑”而且会“想”。

1995年10月10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补记】汉景帝阳陵前正南方向有一当地乡民呼为“罗盘石”的大石（图版八：1），形状与出土汉代日晷相似，上圆下方，刻具标志四方的十字凹槽，疑与本文提到的“攻位”有关。参看林梅村《说“宫庙之碑”》（《文物天地》1998年4期，40-42页）。

^① 参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十章《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研究》；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6年。

说早期地图的方向

古人用图画表现空间概念，总是离不开方向。天图有天图的方向，地图有地图的方向，山陵原野，江河湖海，城郭宫室，田亩葬地，凡有空间概念要用图来表达，差不多都有方向的问题存在。

方向的问题表面上是外在于人，有固定标准，但实际上却是随观察者的眼睛随时变化。“天”的方向是相对于“地”，“地”的方向是相对于“人”。“人”仰观俯察而有“上下”，面向背对而有“前后”，“左右”也是以双手而定。“南北东西”虽然是固定的，画在图上，好像与人无关，但这个图怎么摆，是“上南下北”还是“上北下南”，“上东下西”还是“上西下东”，这和“人”还是分不开（比如“北”字本身就是表示人背对的方向，“败北”也是指掉转头朝背对的方向逃跑）^①。

^① “东”字，《说文》引官溥说谓“从木在日中”，一般学者都认为是表示日之所出。“西”字，《说文》以为象日落之后鸟栖于巢，或体作“栖”（原从木从妻）。但从古文字材料看，“西”字并非鸟巢的象形字，而是“妻”字所从，象女子束发之笄（西、妻、笄三字古音相近），用为方向乃是假借字。“南”，《说文》以南方为夏位，当夏之时草木枝叶繁茂，称为“有枝任”。“任”是长养之义，南、任古音相近，也是用音训为说，但从古文字字形看，我们还不明白“南”字的本义到底是什么。“北”，《说文》以为象二人相背，实即“背”的本字。这四个方向字，“东”字和“北”字含义最明确，“西”字和“南”字大概都是假借字。

古代的图，凡与“天”有关，即以星象表现或与星象有关的图，其方向都是相对于“地”，是像式盘表现的那样，地在下不动，天在上旋转。要讲“天”的方向，只能是“天”在某一时刻相对于“地”的方向。古人虽然昼观日景，夜观极星，用这类天象标志“地”的方向。但斗转星回，整个天宇相对于地面的位置并不固定，很难用静止的方向来表达，古人往往要把它表现为旋转状，寓动于静。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画面中心为北斗，内圈是青龙白虎，头尾相接，作左旋排列；外圈是二十八宿，作右旋排列，就是一种旋转的图。整个图从哪个方向看都可以。还有楚帛书，其中心是上下颠倒的两篇文字，阅读时必须左旋或右旋；周边十二短章（分别讲一年十二月每个月的宜忌，每个短章各附该月值神）是按左旋排列，四隅神树则作右旋排列。这很明显也是按旋转的方式来设计。过去学者一定要讲它是“上北下南”或“上南下北”，争得不亦乐乎。后来我们从经纬线看，其画幅延伸和大家的想像全然不同，原来是按上春下秋、左冬右夏书写，如果一定要讲方向，反而是属于“上东下西”^①。现已发现的早期星图（如洛阳卜千秋墓和西安交大壁画墓的星图）和从星图派生而被我们称之为“式图”（即式盘上的图式）^②，以及从“式图”派生而与“式图”相似的很多数术书的插图，其设计也多半如此。

古代的方向，严格讲起来，主要还是和“地”有关。这种学问，现在属地理学，但在古代却是和看风水的学问在一起，和相

① 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42-62页。

②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89-90页。

法的概念分不开。例如《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分六类，其最后一类叫“形法”，就是讲这类学问（其中包括《山海经》），它是以“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为特点，所谓“九州之势”是山川形势，就是讲地理。城郭室舍的“形法”，人畜器物的“形法”，和九州山川的“形法”是一个道理。这同我们现在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由于这些原因，研究古代地理，阅读古代地图，数术之书和数术之书的插图，有时也是必要的参考。

二

古代地图的方向，从可能性讲，本来应当有四种，即“上南下北”、“上北下南”，“上东下西”、“上西下东”，或者再加上兼包四种的“旋转式”，一共有五种。现代地图是以“上北下南”为正，这不完全是从西方传入。因为我国古代的地图，从碑图实物考察，唐代以来也是以“上北下南”为主流。过去一般都认为，我国的地图传统是以“上北下南”为特点，但后来地下出土了许多早期的地图和数术书的插图，情况并不如此。例如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禹藏图》和《阴阳五行》的插图等等，它们就都是以“上南下北”为正。这使很多学者的思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家又转而相信，中国早期的地图是以“上南下北”为特点^①。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134-140页。

中国古代方向有“上南下北”一说，严格讲，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因为“上下”的概念一直是与“面背”有关。中国的建筑，无论房屋还是城郭，一向都是以面南背北即背阴向阳为正（这和我国所处纬度范围内的采光条件有关）。读西周册命金文，我们常常可以碰到王“各（格）于某庙或某室，南乡（向）”，受命官员“入门，即立（位），立中廷，北乡（向）”一类话，古书也把天子端坐庙堂，南面听朝，叫“君人南面之术”，而臣民朝见君王，脸要对着北面，则叫“北面事之”。这其实就是属于“上南下北”。同样，明清北京城，“前门”（正阳门）在南，“后门”（钟鼓楼一带）在北，左安门在东，右安门在西，方位概念也是一样（崇文门、文华殿在中轴线以东，宣武门、武英殿在中轴线以西，按“左文右武”的说法，也是属于“左东右西”）。

三

不过，尽管“上南下北”在古代一直是个很有影响的传统，很多战国秦汉时期的出土物也证实，早期地图确有不少都是采用这一方向，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这是早期地图的唯一方向；或中国地图的传统是前后两截，早期是“上南下北”，晚期是“上北下南”。在《中国方术考》中，我们曾举放马滩秦墓 M1 出土的古地图为例，说明情况也有例外（136-139 页）。这件地图，据已故地图史专家曹婉如先生考证，就是以“上北下南”为正^①。这

^① 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 年 12 期，78-85 页。

里不妨再举几个例子，它们都是从数术书和数术类的文物中挑出来的：

(一)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和乙种的《视罗图》(见《中国方术考》，205页，图五一)。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图都是书的插图。这两幅图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视罗》篇的插图。两图图式相同，但乙本比甲本更完整，更准确。乙本《视罗图》是用纵三横三六条线把一个方形分割为十六块(简206-218:贰)，中间四格，外圈十二格，然后自内向外在各个空格内依次填注四时十二月，状如螺壳旋转。原书所说“视罗”也许就是指这种螺旋排列(“罗”可读为“螺”)：

(1) “正月”至“三月”(春三月)。属东方，从中间四格左下角的“寅”位开始，右旋至右上角的“辰”位，“东方”标在外圈左边四格的第二格(“十二月”后，“正月”前)。

(2) “四月”至“六月”(夏三月)。属南方，从中间四格左上角的“巳”位开始，依次进入外圈的“午”位，然后左旋至“未”位，“南方”标在外圈上边四格的第二格(“六月”后)。

(3) “七月”至“九月”(秋三月)。属西方，从“申”位开始，左旋至“戌”位，“西方”标在外圈右边四格的第二格(“八月”后)。

(4) “十月”至“十二月”。属北方，从“亥”位开始，左旋至“丑”位，“北方”标在外圈下边四格的第二格(“十月”后)。

对比乙本，我们不难发现，甲本《视罗图》(简83-90背)和它属于同样的图式。只不过甲本有省略和错误，一是漏画三条纵线的中间一条线(也有可能是画在两简之间，因在简边而泐损)，二是相当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四格皆空白不

书，三是“丑”位应与右边的空格互换。这两幅图，功用相同，形式相似，但方向并不一样，甲本作“上西下东”，乙本作“上南下北”。

(二)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置室门图》(见《中国方术考》，209页，图五三)。

这幅图是《直(置)室门》篇的插图，画面表现的是一个东西窄而南北长的大宅院，院子四面有很多门。篇题“直(置)室门”，“置”是安置之义，“室门”即图中之门，意思是按方位吉凶起盖或翻修“室门”。其阅读顺序，根据篇文所述，是作：

(1) 南面。有六座门，从右到左依次为：寡门、仓门、南门、辟门、大伍门、则光门；

(2) 西面。有五座门，从下到上依次为：屈门、大吉门、失行门、云门、不周门；

(3) 北面。有六座门，从左到右依次为：食过门、曲门、北门、鹊门、起门、徙门；

(4) 东面。有五座门，从上到下依次为：刑门、获门、东门、货门、高门。

院子里面，根据文字题记，北面是一大殿，大殿左后方是一羊圈，右面是一猪圈，猪圈前边是一圆形粮仓。其南北两面是由两条纵线来分割，一条连接曲门与辟门，一条连接起门与仓门，北门在没有画出的子午线的西侧，南门在没有画出的子午线的东侧；东西两面是由卯酉线来分割，西门叫“失行门”，就是由这条线与东门相连。另外，还有两条线是用来连接四隅。

图中的二十二门，吉凶宜忌，各有所主，应是起盖或翻修室门可供选择的方位，而不一定真有这么多的门。刘乐贤先生指

出，“可以肯定这是一篇古代的相宅书，而且是专相门的”^①。传世相宅之书，如《黄帝宅经》，其所附图式（除以八卦定位，几乎全同“式图”）往往是取“上南下北”之势，但此图北门在上（偏西），南门在下（偏东），东门在左（正西），西门（失行门）在右（正东），却是作“上北下南”。

（三）马王堆帛书《避兵图》和曹氏朱符中的“太一锋”（见图三七、三八）。

马王堆帛书《避兵图》是起避兵符作用的图画。画幅上方的“大”字人形，有文字题记为证，应即太一神；中间的四个神像是避兵之神，文字题记称为“武弟子”；下面三条龙，一条是黄龙，一条是青龙，一条是黄首青身龙。我们认为，此图主题是“一神三龙”，它们就是《史记·封禅书》提到的“太一锋”。“大”字人形代表的是《史记·天官书》开头讲的“太一”，“三龙”则是《天官书》在“太一”后面讲的“前列直（值）斗口三星，随北端兑（锐），若见若不”的“天一”^②。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同样主题也见于湖北荆门车桥出土的“兵避太岁”戈^③。

在陕西户县朱家堡汉墓出土的解谪瓶上，我们也发现了性质相同的符书，形状如拉丁字母 Y 字形，并在 Y 字形的叉口内标注“大天一”三字，用指“大（太）一”和“天一”。王育成先生早

①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51页。

② 李零《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应属辟兵图》，《考古》1991年10期，940-942页；李零《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文物天地》1992年3期，22-25页；Li Ling,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aiyi (Grand One) worship,” *Early Medieval China*, vol. 2 (1995-96), pp.1-39.

③ 李学勤《“兵避太岁”戈新证》，《江汉考古》1991年2期，35-39页。

已指出，这种用点线表现的符书，从符书的传统看应是代表星象，即《汉书·郊祀志》所说“一星在前，三星在后”的“太一锋”^①。

比较《避兵图》和上述符书中的“太一锋”，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也是可以互证的同类之物，但前者是作倒 Y 字形，和后者正好相反。可见这样的符书并没有固定的方向。过去，有些学者以为这样的图是“上北下南”或“上南下北”，现在看来是求之过深^②。

四

古代方向，追根溯源，都是以视觉角度而定。远的不说，光是我国境内的北方草原地区，就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如《史记·匈奴列传》讲匈奴，除与中原相似的背北面南之俗，还有坐西朝东的习惯（如其“右方”在西，“左方”在东，“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乡”）。其墓葬之序的排列，墓前石人、鹿石的面向，从出土发现看，也多半是朝东。还有与匈奴的传统有关，年代相当于唐代的古突厥碑铭也经常讲到其国土四至和邻国方位，如^③：

(1) 噉欲谷碑：“英明的噉欲谷—裴罗莫贺达干同颌跌利施

① 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1期，45-56页。

② 参看拙作《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和李家浩《论〈太一避兵图〉》，收入《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译文是据 Talâ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un Turkic*,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69,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并参考了耿世民《突厥碑铭译文》，收入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245-286页。

可汗一起，南边把中国人，东边把契丹人，北边把乌古斯人杀死了很多很多”（西6-7行），“我不知道到底有两千还是三千支军队东面来自契丹，南面来自中国，西面来自西突厥，北面来自乌古斯”（南7行），“……南边的人民及西边、北边、东边的人民都来〔臣服〕了”（南10行）。

（2）阙特勤碑：“前面（东面）到日出，右面（南面）到日中，后面（西面）到日落，左面（北面）到夜半，四至范围内的人民全都臣附于我”（南2行），“我曾前（东）征山东平原，几乎达到海〔滨〕。我曾右（南）征九姓焉耆，几乎达到吐番。并且后（西）征珍珠河外的铁门，左（北）征拔野古的领土”（南3行），“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他们曾征伐位于日出之方的莫离可汗的领土，并且西至于铁门”（东8行），“……北面对付乌古斯人民，东面对付契丹人和奚人，南面对付中国人……”（东28行）。

（3）毗伽可汗碑：“我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意为无数的）人民〔住在〕东到日出，南到〔中国？〕，西到……”（北11行）。

（4）翁金碑：“突厥人民〔曾征服过〕东到日出，西到日落，南到中国，北到山林……”（前2行）。

其方位概念是以“日出”之方即东方为前，“日落”之方即西方为后，“日中”之方即南方为右，“夜半”之方即北方为左，即以“上东下西，左北右南”为正。契丹在东，当其前；中国在南，当其右；西突厥在西，当其后；乌古斯在北，当其左。其方位概念正与匈奴的传统相合^①。契丹系统的辽也是如此，其建筑

^① 据汉文《阙特勤碑》“彼（彼）君长者，本□□□裔也，首自中国，雄飞北荒，来朝甘泉，愿保光祿，则恩好之深旧矣”，唐人是以突厥为匈奴之苗裔。

往往都是坐西朝东。

五

古代方位概念的多样性不仅见于早期，晚期也是如此。

例如唐晓峰先生在其考证梵蒂冈收藏的一幅中国清代长城图时就已发现，这幅地图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图面基本是上南下北，但因长城总是横贯画面，故宁夏一段约为上东下西”（即采取了化曲为直的近似画法）；二是其观图方向“好像是站在塞外向塞内看”，画面于城外夷人“衣服状貌风俗生活”描写极为详尽，而城内则全无一人。他说“这在为数不少的九边长城图中很是罕见。不过从《事林广记》北宋东京城图，自城外向城内看的画法，以及《西域水道记》的上南下北的方向来看，方向问题在古人做图时本不是严格的”^①。还有，近来李孝聪先生也讨论过中国古代地图方向的“灵活性”^②。他指出“中国地图采用不同的方位，是中国制图工匠从使用目的出发的方位观”。例如他以中国传统的海图为例，讲到完全相反的两种方位。一种以长卷式《郑和航海图》或《七省沿海图》为代表，地图的具体方位从不固定，是随图卷展开，不断变换，但不管方向怎么变，陆地总在画卷上方（类似上述长城图的画法），因为船在海上，是取自海

① 唐晓峰《梵蒂冈所藏中国清代长城图》，《文物》1996年2期，84-88页。

② 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7期，140-144页。

观陆之势。另一种是沿海各省区的海防军事营汛图，因为重在海防，则多取自陆观海之势。“前者似主要服务于沿海岸航行的船只，后者则用于在陆地驻防的军队”。它们和现代制图学惯用的地理坐标定位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他还提到中国古代的某些城市图，“图上的文字注记一律采取由城市中心的各个城门观测的角度题记。当某一城门处于图的上方时，有关这座城门的注记文字对读者来说是正的，可以读；其它城门的注记文字则是倒置或横写。所以，必须把地图拿在手中旋转着看，才能阅读图上的全部文字”〔案：上文提到的《置室门图》也是这样书写各门的位置〕。这些例子虽然年代偏晚，但其方向随视角转移和古代是同一个道理。

我相信，无论早期还是晚期，方向“反常”的地图今后一定还会有不少新发现。

1997年9月27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附录】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中的地图方向

此书共收古地图147幅（图版1—205）：

（1）战国地图（图版1—17）。8幅，其中《兆域图》（图版1、2）为上南下北，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地图第五种（图版12、13）为上北下南，余不明。

（2）西汉地图（图版18—29）。4幅，其中《地形图》、《驻军图》（图版20—27）为上南下北，余不明。

（3）东汉地图（图版30—36）。4幅，《市井图》为上北下南，余不明。

(4) 唐代地图 (图版 37 - 41)。只有《五台山图》1幅, 是五代画师据唐代流传的底稿绘制, 方向为上北下南。

(5) 伊斯兰地图 (图版 42 - 44)。2幅, 方向不明。

(6) 宋元地图 (图版 45 - 205)。128幅, 其中绝大多数是上北下南, 但《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汉唐都城要水图》、《郾道元张掖黑水图》、《今定黑水图》、《九夫为井之图》、《黄河源图》、《江宁县图》、《河源之图》(图版 105、106、110、111、122、168、192、205) 为上南下北, 《皇朝建康府境之图》、《茅山图》(图版 189、194) 为上东下西, 《九州山川实证总要图》、《今定禹河汉河对出图》、《历代大河误正图》(图版 107 - 109) 为上西下东, 《元经世大典地理图》(图版 179) 为左上南、右下北。

【补记】关于突厥碑铭, 近有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一书出版, 可参看。

数
术
丛
谈



“南龟北骨”说的再认识

本文是篇读书札记，因为时间仓促，讨论不够深入，这里只能讲点肤浅的印象。

—

在中国古代的占卜中，“卜筮”是最古老的一类。在“卜筮”中，“卜”又比“筮”更古老（至少从考古发现看）^①。研究没有文字的史前史，从实物讲思想，一向被考古学家视为畏途（或称“考古学的局限性”）^②。但“卜”与原始信仰有关，与早期人类的思想有关，不但可同历史时期的发现作对比，也可由晚近的人类学调查来印证，却是不难识别的一类。如俞伟超先生讲“考古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251-271页。

② 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读书》1996年12期，26-31页。

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就是拿“卜”作为例证^①。

说起“卜”的历史，过去我们满脑子全是殷墟甲骨，前边是空白，后边也是空白。这是因为那时的发现太少，我们注意的太少。现在发现多了我们才知道，不仅殷墟以后还有西周甲骨、东周甲骨^②，殷墟以前还有二里冈甲骨、台西甲骨（图四三）^③，而且时间跨度更大，地理范围更广，西有马家窑、齐家文化，中有仰韶、龙山、二里头文化，东有龙山、岳石文化，北有富河文化，很多有关发现都在不断露头，线索越追越早。情况表明，“卜”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整个青铜时代都很重要的考古现象，商周以后也有很长的延续。特别是近年来，与“卜”有关，又有两个发现很值得注意：

（1）1996—1997年，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出土了两件岳石文化的羊卜骨，卜骨残缺，但有“字迹”（图四四：1），是难得的发现^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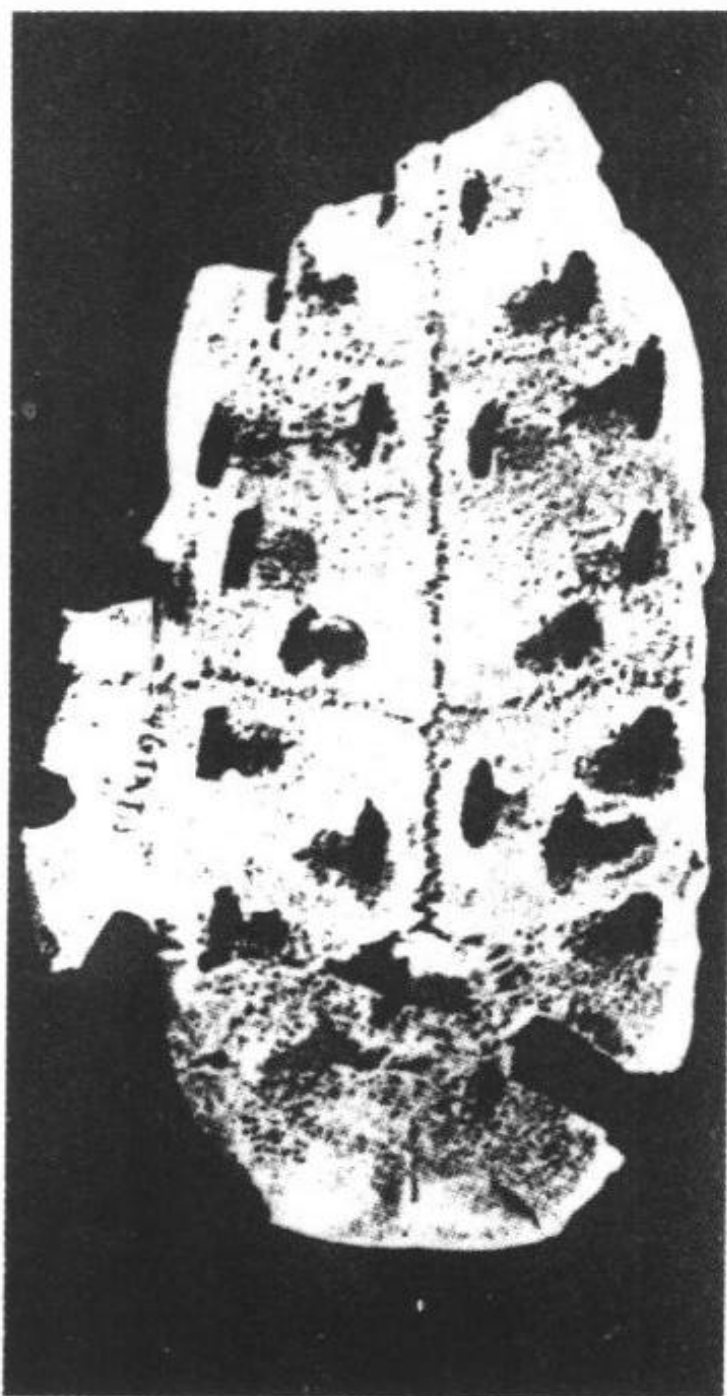
（2）1997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三峡出土文物展上展出过一件唐代卜龟（图四五），卜龟为腹甲，有86个圆钻，明显有别于商周甲骨，是晚期龟卜的见证（龟卜汉以后衰落，但一直

① 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57—63页。案：该文又经删节，以《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为题，收入他的《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37—1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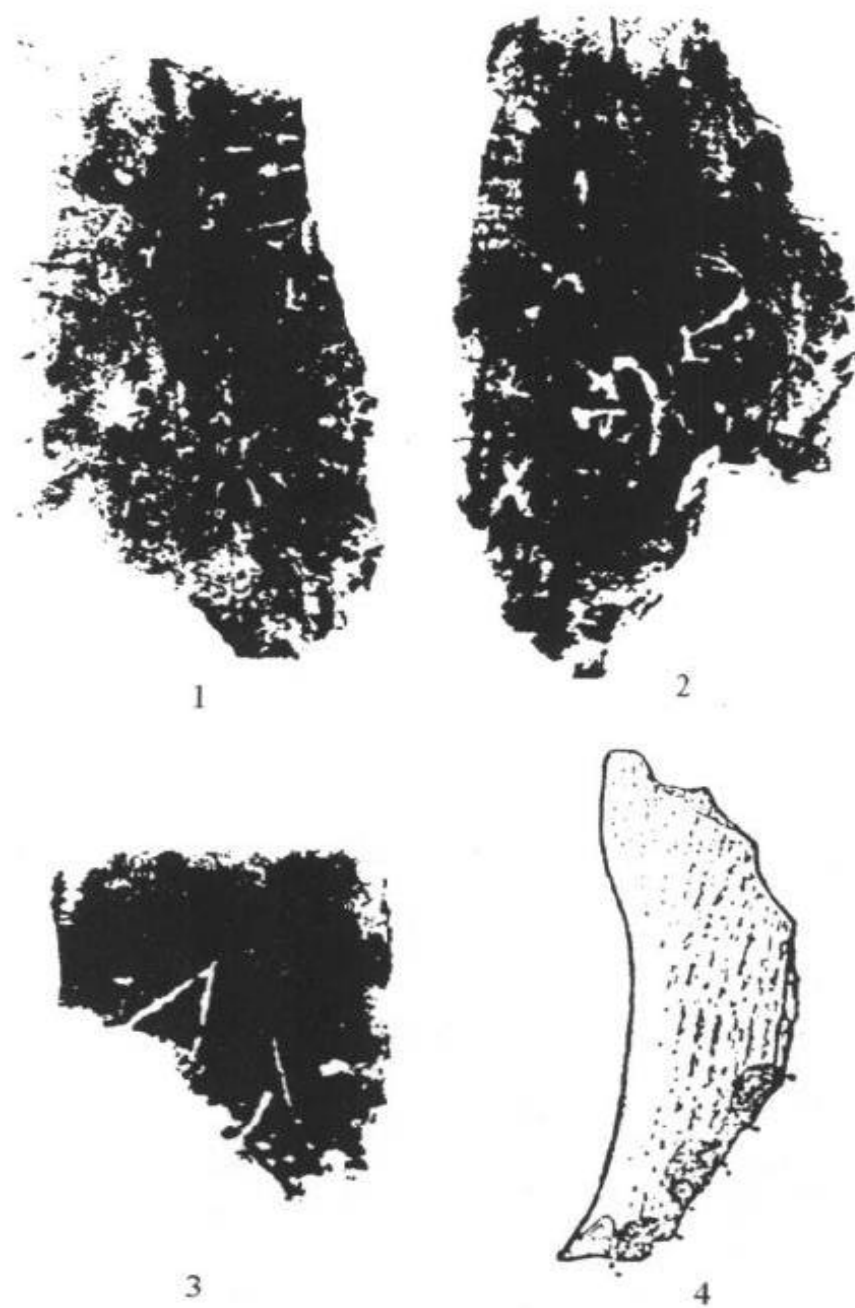
② 《中国方术考》，234—238页。

③ 河南省文化局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37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87—88、143—145、189—192页。

④ 淄博市文物局《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11期，1—18页，图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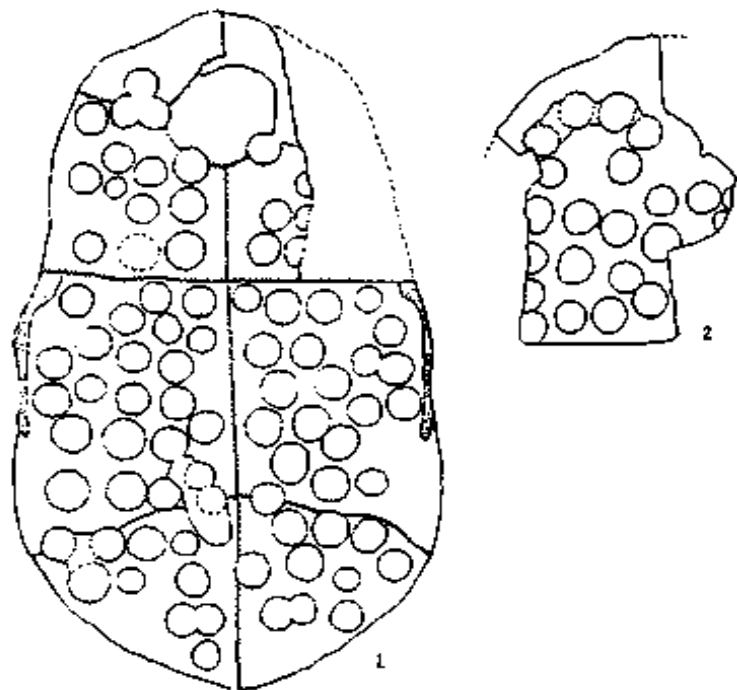


图四三 台西甲骨



图四四 岳石卜骨

1-3 史家卜骨 4 尹家城卜骨



图四五 唐代卜龟

沿用到明清)^①。

总之，从各方面看，有关发现已经到了一个应当认真总结的时刻。

二

研究中国古代占卜，我们应有开阔的视野，不能随便讲“中

^① 承俞伟超先生告，此龟是1994年四川云阳县明月坝遗址出土，现藏云阳县文管所，长15.6厘米，展览图录《不没的记忆——三峡库区文物存真》将由朝华出版社出版。案：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15页说“春秋战国以降”是甲骨占卜的“末声”，可商。

国特色”。一定要讲，必须先有比较。

在《中国方术考》一书中，我们曾提到，用动物的肩胛骨占卜（scapulimancy）在全世界是一种延续长而分布广的习俗。这类占卜分“冷卜”（apyro-scapulimancy）和“热卜”（pyro-scapulimancy）两种，从分布情况看，是“东热西冷”。“冷卜”主要流行于旧大陆的西部，“热卜”主要流行于旧大陆的东部和新大陆（52-53页）^①。我们中国的“卜”是“热卜”，即灼骨成兆的一种。这是一般印象。其实严格讲，中国的卜材并不限于胛骨，还包括肋骨^②；不仅包括兽骨，还包括龟甲。龟卜在世界其他地方好像没有（是不是绝对没有，还可以做进一步调查）^③，商代的“卜”是龟、骨并用，龟的地位渐优于骨（前者的数量大于后者）^④，汉以下且取代骨卜成为主流，它比骨卜更有中国特色，恐怕谁也不会怀疑。

研究中国的卜法，学者有一种印象，骨卜主要是北方的传

① 参看 David N. K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3 引 John M. Cooper 说；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139-150页。

② 注①引李学勤书指出东北亚（如日本、朝鲜）的“热卜”除用胛骨，也用肋骨，并且商代卜辞也有刻于肋骨者。案：商代甲骨所用动物的种类和骨头的部位有很多种，但有些不是用于占卜。

③ 日本的龟卜是唐代从中国传入，见 *Oracles and Divination*,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Carmen Blacker, chapter 3: Japan, by Carmen Blacker, pp.64-72.

④ 注①引 Keightley 书对龟、骨的数量比例有所讨论，参看该书 Appendix 1: Identification of the inscribed turtle shells of Shang, by James F. Berry, pp.157-164.

统，龟卜主要是南方的传统，是谓“南龟北骨”说^①。这样的印象只是一种模糊的看法。事实上，不可能做截然的划分。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卜骨有很多种，野生有鹿，家养有牛、羊、豕^②。这些动物，鹿骨是东北亚（我国东北、朝鲜、日本和东西伯利亚）和美洲很古老也很流行的卜材^③，但我国的中原地区也有出土^④。牛、羊、豕三种，真正属于北方特别是西北的动物是羊，整个新石器时代，南方遗址都不出羊骨^⑤，后世羊骨卜也主要流行于西北^⑥。但牛分黄牛（*Bos exiguus* Matsumoto）、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 Hopwood），台西甲骨、殷墟甲骨都是兼而用之^⑦。黄牛当然是北方的，水牛却是南方的，豕也是南北方共养^⑧。这是卜骨分布的复杂性。同样，古代的卜龟也有多种，如商代卜龟有四种，其中亚洲大陆龟（*Testudo emys*）是从很远的南方进贡，花龟（*Ocadia sinensis*）、水龟（*Clemmys mutics*）也是中国南方的特产，但金龟（*Geoclemmys reevesii*，也叫乌龟）却在北方

① 上页注①引 Keightley 书，p.7。

②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4-9页。案：陈氏所论“牛骨卜”条的“蹄占”不一定是用牛骨占卜。

③ 参看《比较考古学随笔》的介绍。

④ 如邢台曹演庄商代遗址所出，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43-50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194-198页。

⑥ 宋元时期，羊骨卜仍流行于西北地区，并且后世纳西族也有此俗。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5-6页。

⑦ 《殷墟卜辞综述》，5页；《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43-145页。

⑧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4-198页。

有广泛分布^①。如果再加上贸易的影响，南北的界线更乱。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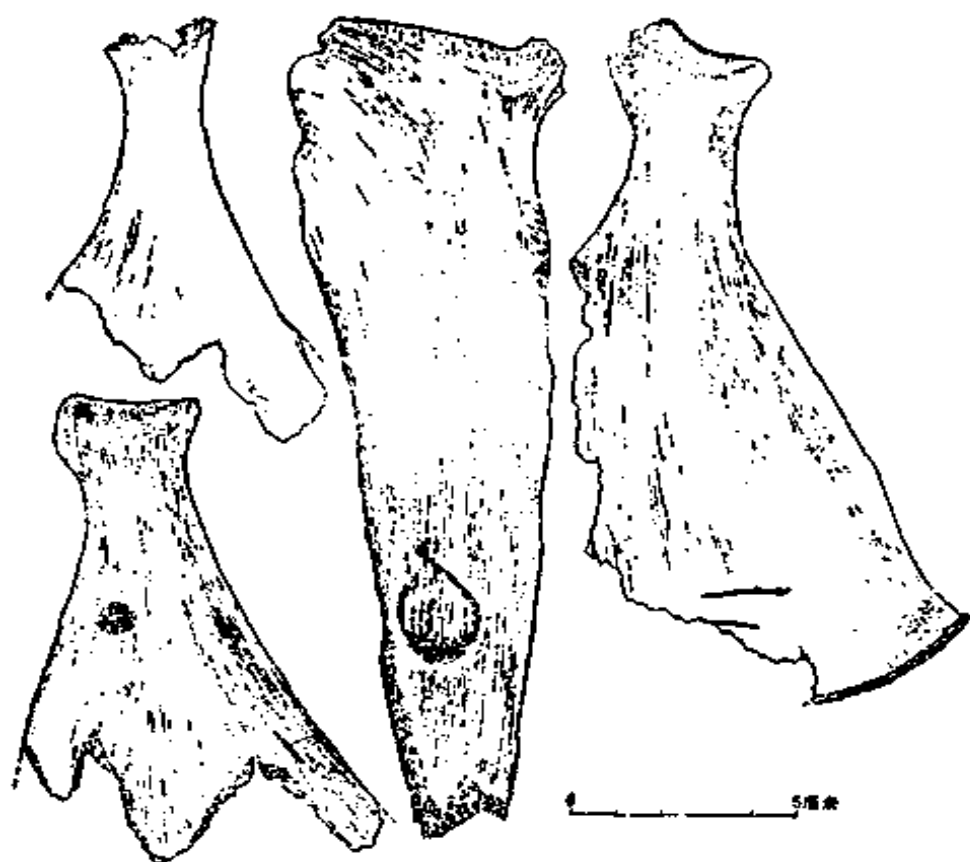
中国的骨卜和龟卜是什么关系？光从物种的生态分布讲，恐怕讲不清。占卜是人类活动，考古材料更重要。我们先讲骨卜。

研究骨卜的起源，近来有篇文章值得推荐。这就是谢端琚先生的《中国原始卜骨》（《文物天地》1993年6期，14-16页）。谢先生是长期从事西北考古的专家，所见多广，他所提供的信息和见解非常重要。

谢先生说：

卜骨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与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辽宁、内蒙古、陕西与甘肃等8个省共有35处遗址出土原始卜骨，其中31处遗址出土的卜骨均有具体数目，合计187件。除齐家文化73件与富河文化1件外，其余113件都是属于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系统。出土卜骨数量最多者为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共出卜骨39件；其次是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共出卜骨19件；再次为甘肃灵台桥村遗址，出卜骨17件。少者为河南浍池仰韶村与孟津小潘沟、浚县大赉店、郟城郝家台、

^① 前页注^①引 Keightley 书，Appendix 1: Identification of the inscribed turtle shells of Shang, by James F. Berry, pp.157-164;《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二：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的龟甲，189-192页。



图四六 傅家门卜骨

山西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山东曹县莘冢集、河北磁县下潘汪、永年台口村以及内蒙古昭乌达盟富河沟门等110处遗址，均仅出1件卜骨。卜骨的用料已鉴定者均是动物的肩胛骨，共133件。以羊的肩胛骨占多数，共74件，占卜骨总数的55.6%；其次是猪肩胛骨，共28件，占21.5%；再次为牛肩胛骨，共21件，占15.7%；鹿肩胛骨10件，比例较少，仅占7.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羊骨卜在甘肃占的比例特别大，共53件，占羊

卜骨总数的 71%。

此外，除这 187 件，谢先生还特别介绍了 1992 年甘肃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属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出土的 6 件卜骨（图四六），分羊、猪、牛三种。如果加上这 6 件（他认为这几件卜骨年代最早），数目可达 193 件。

我们从这些材料看，骨卜起源于北方特别是西北，似可成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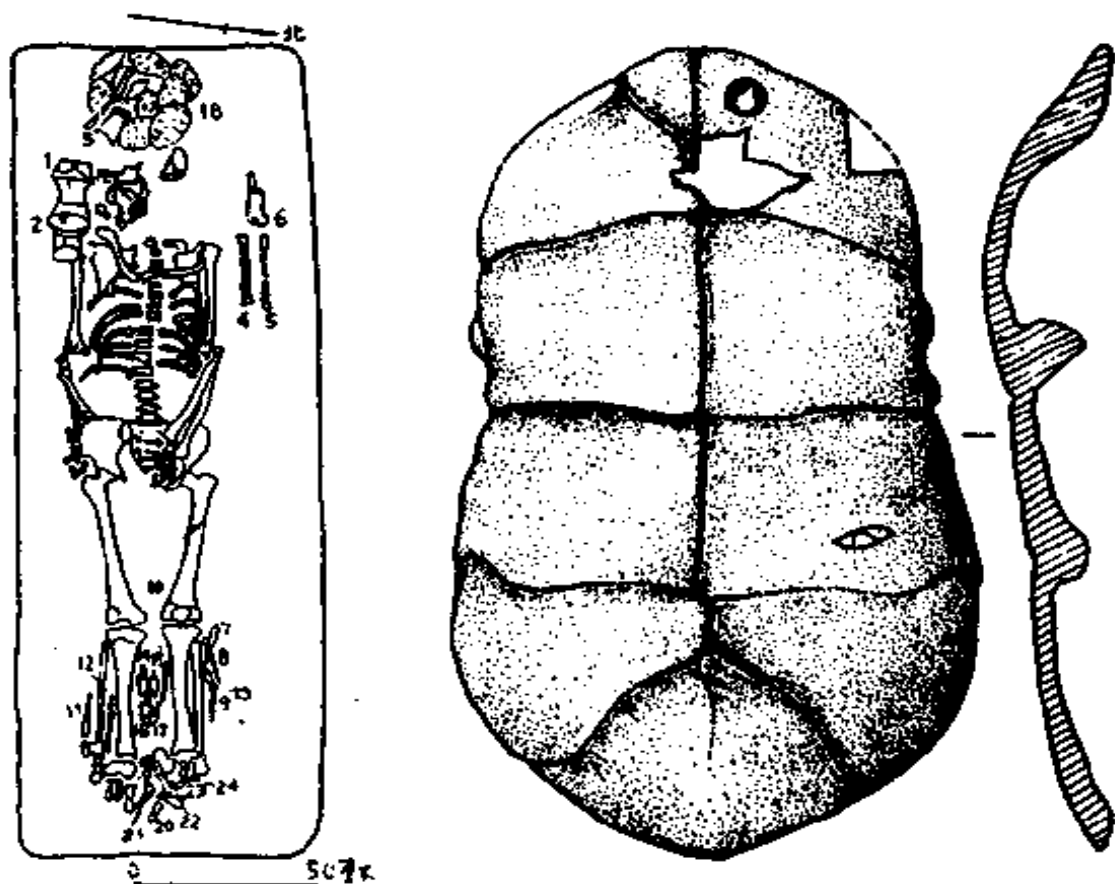
四

同骨卜相比，中国的龟卜似乎要年轻得多。因为如果我们所说的“龟卜”是指在龟甲上施火为兆、视兆而问的占卜方式，这样的占卜，其最早的标本只能早到商代^②。

研究龟卜的起源，当然还可以向上追溯。例如学者往往提到的所谓“龟灵崇拜”的葬俗就很值得注意。这种葬俗是以龟壳随葬。龟壳上下剖分，背甲、腹甲穿孔，以绳缀合，多数置于腰间，少数放在头部，或胸部，或腿部。背甲前端往往有四个穿孔，腹甲前端往往有一个穿孔，内盛骨针、骨锥或石子（图四七）。这种葬俗，过去发现主要是在大汶口文化分布区的南部，即江苏的淮北及山东的中南部，并零星见于河南渐川下王岗（仰韶

① 这些材料中的品种比例，羊多于猪，猪多于牛，和殷墟正好相反。这可能与地区差异和礼制差异有关。殷墟多牛是礼制需要，因为牛是“大牢”，在祭礼上地位最尊，王可以比较多地杀牛为祭。但中国农村，牛是耕畜，轻易不杀（古代法律常有禁杀耕牛的规定），普通吃肉，还是猪、羊为主。

② 河南省文化局工作队《郑州二里冈》，37 页。



图四七 贾湖葬龟

文化半坡类型)、四川巫山大溪(大溪文化)、江苏武进圩墩(马家浜文化)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①。1983-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相当裴李岗时期)发掘墓葬300多座。在这批墓葬中,“龟甲往往成组出现,龟甲内往往装有数量不等、大小不均、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小石子。有的龟甲、

^① 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收入《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57-70页。

骨器或石器上有契刻符号”^①。从发表图像看，它们似乎也有类似的穿孔。这一发现为上述葬俗提供了更早的例证^②。

与上述葬俗可能有关，在中国早期的玉器中，有一种模仿葬龟的玉龟也很值得注意。如：

(1) 1989年辽宁建平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 M21（属红山文化）出土的青玉小龟（M21：10）。这件玉龟（图四八：1）长 5.3、宽 4.1、高 2.7 厘米，作龟壳状，腹甲中心有一圆凹窝，凹窝壁上前后各有一个圆孔^③。与 M21 同冢的 M1 出土“玉龟”两件（M1：6、7），其实是玉鳖〔案：在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发现中，玉龟与玉鳖或同出，但龟多作龟壳形，而鳖是全形，从体形上不难区别〕^④。

(2) 1985年安徽含山凌家滩 M4（属当地的原始文化）出土的灰玉小龟（M4：29、35）。这件玉龟（图四八：2），长 9.4、宽 7.5、高 4.6 厘米，背甲和腹甲剖分，两侧有孔，以绳缀合，腹甲前端四孔，背甲前端一孔，同大汶口葬龟不仅年代相近，而且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2期，1-20转75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期，1-14转47页。

② 这些葬龟的种属似还缺乏系统鉴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葬龟有一标本，经鉴定是属于地平龟（*Terrapene culturalia*, sp. nov.）。这种龟在美洲以外还从未发现，学者推测是在更新世晚期从美洲传入。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159-163页，附录二；叶祥奎《我国首次发现的地平龟甲壳》。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 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8期，9-14页，封内：3，11页；图三：1。

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8期，4-8页。

形制也相似^①。

(3) 1975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出土的墨玉双联小龟(F11: 4)。这件玉龟(图四八: 3), 长3、宽5厘米, 发现于房基填土中, 同出还有玉鳖(F11: 5)、石鳖(F11: 18)各一。与牛河梁所出的玉龟、玉鳖是类似之物^②。

(4) 1974-1977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大墓M202出土的青玉小龟(M202: 4)。这件玉龟(图版七: 1; 图四八: 4), 长仅2.4厘米, “中部有一穿孔”, 与红山玉龟酷为相似^③, 疑与红山玉龟有渊源关系。

(5) 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63出土的青玉小龟(I11M63: 90-10)。这件玉龟(图版七: 2; 图四八: 5), 长5.4厘米, “两端穿孔贯通首尾”^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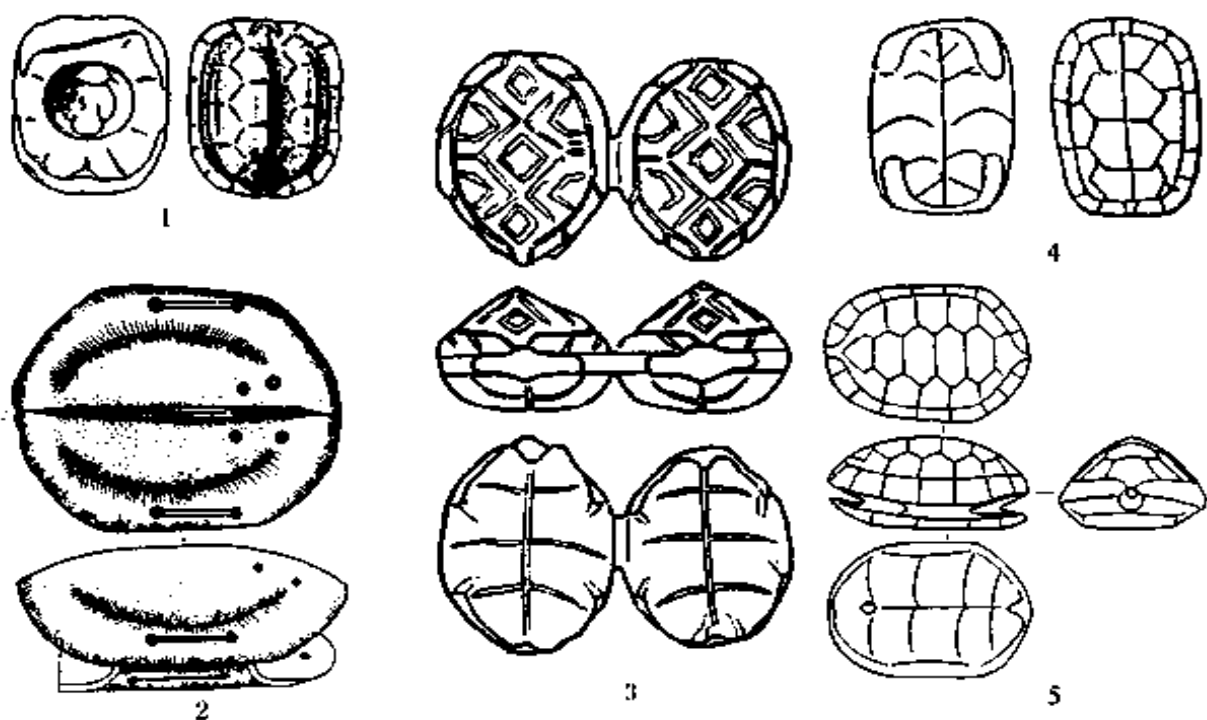
这些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最发达、玉器也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及东南沿海的邻近地区, 葬龟分布区与玉器分布区似乎有某种重叠。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4期,1-9转30页,图版壹:1、2,6页;图一五。关于玉龟穿孔的研究,参看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1992年4期,56-61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掘》,《考古》1976年4期,264-272页转263页,图版柒:1,269页;图一一:2。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233页,图版一〇一:5,235页;图一四四:1、2。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8期,4-21页,19页;图二八:1。



图四八 玉龟

1 牛河梁玉龟 2 凌家滩玉龟 3 殷墟玉龟；

4 琉璃河玉龟 5 晋侯墓地 M63 玉龟

五

上面所说的葬龟和模仿葬龟的玉龟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现在还值得探讨。关于后者，俞伟超先生有一种推测。他说：

凌家滩遗存的龟卜方法大概是由巫师（或祭司）当众口念占卜的内容，然后在玉龟空腹内放入特定的占

卜物品，固定玉龟，加以摇晃，再分开玉龟，倾倒入放入的占卜物品，观其存在的形式，以测吉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最早期的龟卜方法^①。

这是把凌家滩玉龟视为“摇彩”式的占卜工具。很多学者都采用这一解释。如李学勤先生就引用这一假说，推论早期的葬龟也是同样的东西^②。还有学者把葬龟类型的遗物解释成“冷卜”的法器^③。

除去这类推测，值得注意的是，北美印第安人也有做法相似的龟壳。比如1995年夏，我到西雅图探亲，当时有个以“成吉思汗”为名的中国东北和内蒙地区的出上文物展（*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Heritage of Genghis Khan*）正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举行。我去看展览，顺便到温哥华一游。在温哥华的街上，有许多出售印第安艺术品的商店。其中一家就摆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龟壳。这些龟壳，颜色是碧绿，髹以清漆，闪闪发光。龟壳内盛鹿皮小囊，有绳索系口，穿过龟壳，可供悬挂。我正纳闷它们是干什么用的，碰巧有个印第安人进来，脖子上挂着个小龟壳。他解释说，这些龟壳都是“护身符”，小者挂于脖颈，大者悬于腰侧。一边说，一边把囊中的东西倒出来让我看，原来是些石子和硬币。他说他们相信，这些小东西会给他们带来运气——当然最好是细小的水晶条，他补充说。

我的印象，印第安的龟壳和我们的葬龟很像。这是不是亚美文化联结的一种远古遗存？希望今后能做进一步调查。

-
- ① 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
② 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139-150页。
③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515-517页。

六

对于研究骨卜、龟卜各自的起源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上述考古发现的年代序列很重要，这里不妨试作排比：

(一) 卜骨。中国最早的卜骨，过去都认为是 1962 年内蒙巴林左旗富河沟门出土的鹿卜骨（见《中国方术考》，58 页，图三），其¹⁴C 年代为公元前 3,510 - 前 3,107 年^①。但谢端琚先生在《中国原始卜骨》一文中说中国最早的卜骨不是这件，而是 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在甘肃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出土的 6 件卜骨。谢先生的文章是发表于《文物天地》1993 年 6 期，发掘简报是发表于《考古》1995 年 4 期^②，当时遗址年代还未测定，所用年代是参照甘肃甘谷县灰地儿遗址的年代。灰地儿遗址，¹⁴C 年代是公元前 3,980 - 前 3,697 年^③，确实比富河沟门早。但傅家门遗址的¹⁴C 年代，后来公布的正式数据是公元前 3,352 - 前 3,036 年^④，还是比富河沟门晚。骨卜的延续，以中原地区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 - 1991 年）》，文物出版社，1992 年，55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 4 期，289 - 296 转 304 页。

③ 注①引书，276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二）》，《考古》1995 年 7 期，655 - 659 页。

论，至少可以晚到西周（如周原甲骨就有卜骨）^①。

（二）葬龟。中国最早的葬龟是舞阳贾湖遗址所出。贾湖遗址分三期，目前已测出的¹⁴C数据有五个，“属一期的两个：H1木炭为距今 $7,920 \pm 150$ 年，H82泥炭为距今 $7,561 \pm 125$ 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8,053 \pm 125$ 年）。二期两个：H39泥炭为距今 $7,137 \pm 128$ 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7,762 \pm 128$ 年），H29泥炭为距今 $7,105 \pm 122$ 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7,737 \pm 122$ 年）。三期一个：H55泥炭为距今 $7,017 \pm 131$ 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7,669 \pm 131$ 年）”^②。其最早的¹⁴C数据是公元前6,680—前6,420年^③，比年代最早的卜骨还要早。葬龟的延续，到龙山时期似乎中断。山东泗水尹家城的龙山灰坑（H795：4）虽然出土过一件龟腹甲，但性质还有待研究^④。

（三）玉龟。中国最早的玉龟（模仿葬龟的玉龟）是建平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M21所出。其年代应与一号冢的M8相近。M8的¹⁴C年代为公元前3,360—前2,920年^⑤。其次，是含山凌家滩M4所出。M4的热释光年代为距今 $4,600 \pm 400$ 年^⑥，约与大汶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无出版年月。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

③ 上页注①引书，180页。

④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156页，图版六九：1。案：泗水尹家城龙山期的¹⁴C年代有两个标本，一个是公元前2,577—前2,404年，一个是公元前2,470—前2,140年，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39—140页。宋先生说此甲“火灼透过龟版，正面犹可见到灼焦痕”，见所著《夏商社会生活史》，519页，但我们从照片上很难看出这一点。

⑤ 上页注①引书，67页。

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

口文化的年代相当。小屯村北的房基是商代晚期的房基^①，琉璃河 M202 是西周早期墓，它们所出的玉龟年代比较晚^②。

(四) 卜龟。中国最早的卜龟，目前所知，似乎还是二里冈所出^③。商代以前，二里头有没有卜龟？岳石有没有卜龟？龙山有没有卜龟？它们和龙山以前的葬龟是什么关系？这中间尚有缺环。龟卜，商代、西周极为发达。汉以后衰落，传统发生变化，但并非绝后，一直可以拖到明清。

七

上面的时间表可以澄清过去的一些认识。如有学者说中国最早的卜骨是浙川下王岗三期的卜骨，中国最早的卜龟是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卜甲。其实它们的年代都不是最早的^④。

从上面的时间表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最早的龟卜，我是说

① 《1975 年安阳殷墟的新发掘》。

②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1973-1977)》，73 页。

③ 《郑州二里冈》，37 页。

④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515 页说：“目前所知最早的卜骨，是豫西地区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仰韶三期羊肩胛骨，上有烧灼痕，距今约 6,000 年左右。最早的卜龟，出诸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为一块大龟的腹甲，背面有火烧过的痕迹，正面有坼纹，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案：下王岗遗址三期出土的卜骨，见《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 年，200 页，图版五三：8；北阴阳营商代遗址出土的卜甲，见《北阴阳营》，157 页，图版七〇：1、2，158 页；图六七：4。前者的¹⁴C 年代是公元前 2,920 - 前 2,491 年，晚于富河沟门；后者的¹⁴C 年代是公元前 1,440 - 前 1,168 年，晚于郑州二里冈。参看前页注①引书，102、150 页。

狭义的龟卜，它比中国最早的骨卜要晚得多，两者之间有近2,000年的时间差。同样，中国最早的骨卜比中国最早的葬龟也要晚得多，两者之间也有3,000多年的时间差。现在我们的知识，中国的葬龟与中国的龟卜，两者之间仍有缺环。中国的龟卜与骨卜共时目前只能追到商代，并且刚一出现就有相似的钻凿。这些钻凿，它们在龟甲上的出现很突然，但在骨卜的发展序列里却有很长的渐变过程：中国的骨卜，早期无钻无凿，只有灼烧痕迹，钻的出现是在岳石文化时期（图四四：2）^①，凿的出现是在商代^②。从这些情况看，我很怀疑，中国的龟卜虽与早期葬龟可能有某种历史联系，但未必就是葬龟的直接延续。它很可能是骨卜在商代或比商代略早的一段时间里（龙山晚期或岳石文化期）才移用于龟甲。这也就是说，“南龟”可能只是“北骨”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变种。

1998年4月6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① 如泗水尹家城出土的岳石卜骨（T232⑦：39、42）即有钻有灼，见《泗水尹家城》，197页，图版七八，198页；图一三四：20。

② 《中国方术考》，233-234页；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517-520页。

【附录】

卜法的发展

	骨卜	葬龟	玉龟	龟卜
约8,500-7,500年前		贾湖葬龟		
约5,500-4,500年前	富河、马家窑卜骨 (有灼, 无钻凿)	大汶口葬龟	红山、含山玉龟	
约4,500-4,000年前	龙山、齐家卜骨 (有灼, 无钻凿)			
约4,000-3,500年前	二里头、岳石卜骨 (有钻无凿)			
约3,500-3,000年前	商代卜骨 (有钻有凿)		商代玉龟	商代卜甲 (有钻有凿)
约3,000-2,700年前	西周卜骨 (有钻有凿)		西周玉龟	西周卜甲 (有钻有凿)
约2,700-2,200年前				东周卜甲 (有钻有凿)
约2,200-200年前				秦汉和秦汉以后的卜甲

【补记一】 承陈星灿先生告，北美印第安人还有以龟甲为摇鼓之俗。他于4月7日来信说：“关于龟甲使用方法，北美颇多可供参考之例。Creek人每年在广场上举行宗教仪式舞蹈时，妇女们将小石子装入龟壳内作成摇鼓绑在腿上跳舞。在易洛魁人(Iroquedis)的宗教舞蹈中，男人和妇女摇着龟制手摇鼓跳舞。易洛魁人居住的地区不产龟，因此这些龟甲都是从其他地区远程交换来的。Seminole人的腿摇鼓是由若干系在一起的小龟甲组成，龟甲上都有小孔（见Liu Li, 1994, *Development of Chiefdom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in Neolithic China - A Stud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录此备考，并志感谢。(1998年4月10日)

【补记二】承山东大学考古系栾丰实先生告(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李水城先生转告)，泗水尹家城所出的龙山龟甲并无钻孔或灼烧痕迹，山东境内所出龙山卜骨皆有灼无钻。(1998年4月26日)

【补记三】记录贾湖葬龟的发掘报告近已出版，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舞阳贾湖》(上、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上卷第六章第五节“龟鳖及其它动物骨骼”之第一小节“龟鳖类”，分别介绍了所出龟、鳖的埋藏状态、龟甲上的人工痕迹、龟内石子。下卷第一章第二节“动物群落”之第三小节“爬行类和鱼类”，则介绍了贾湖遗址中龟鳖类甲壳的种属。下卷第七章较多地讨论了贾湖遗址的“龟灵崇拜”、“龟祭”、“龟腹石子与卜筮的起源”。龟甲及内装石子见于彩版四一至四三。契刻符号见于彩版四七至四八。

【补记四】除洛阳等地，侯马铸铜遗址也出土了东周卜甲六片，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册，425页，图二二六：13；下册：图版三〇四：3。又该书426页指出“卜甲应与铸铜生产中的卜筮习惯有关”。

跳出《周易》看《周易》

——“数字卦”的再认识

—

在中国古代的占卜中，卜筮是自成一类。卜用龟（或骨）而筮用策（或蓍），这是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中国方术考》中，我曾专门讨论过这个类别，指出卜、筮在商周时期地位很高，二者本来是结合在一起；卜衰筮显，分道扬镳，只剩“三易”中的《周易》广为人知，那是汉代和汉代以后的局面。它和《周易》作为儒籍地位不断提高有关。当时，为了勾画古代筮占的总体轮廓，我曾强调，在《周易》之前，还有一个“前《周易》”的发展时期；《周易》之外，也有《连山》和《归藏》，古代筮占绝不止《周易》一种。这些都是受考古发现启发^①。

考古发现对我们既有知识的突破，主要是现在已为大家熟知，流行于商代到战国，见于多种书写材料，用数字符号表示的“数字卦”。这样的“数字卦”，过去有不少学者做过搜集，彼此略有出入，释读和理解也有一些差异，但大家对这类符号的性质却有高度一致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64-68、251-298页。

的看法。大家都认为它是一种与《周易》类似的卦画^①。

现在我们能够认识“数字卦”，这有一个过程。李学勤先生和唐兰先生都有贡献，但功劳最大还得属张政烺先生。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学界对“数字卦”达成共识，几乎所有研究都是追随张先生^②。回顾以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者破译“数字卦”，《周易》是突破口^③。例如早在1956年，李学勤先生就已猜测西周甲骨上的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④；而1978年，张政烺先生对这类符号做全面论述，出发点也是“文王演周易”^⑤。由于大家的思路老是围着《周易》转，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往往都把出土发现的“数字卦”直接转写为《周易》的卦画。例如张政烺先生就是把出土“数字卦”化简，一、五、七归为阳爻，六、八归为阴爻（当时尚未发现数字九），按《周易》转写，列为表格，分别注明其对应的“经卦”和“别卦”（如“数字卦”六八一—五一，“经卦”为乾下震上，“别卦”为大壮）^⑥；李学勤先生考证中方鼎，也是把铭末所缀的重卦“七八六六六六”和“八七六六六六”理解为坤下艮上的剥卦和坤下坎上的比卦，并按《左》、《国》筮例定为“遇剥之

① 见《中国方术考》251-258页引用的各家说法。

② 见《中国方术考》251-258页对这一研究过程的描述。

③ 见《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收入《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1-8页）所记张政烺先生的发言。

④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16-17页。

⑤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403-416页。

⑥ 同上。

比”^①。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讨论的是，学界认为与《周易》类似的“数字卦”，它们和《周易》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即它们是不是就是早期的《周易》？如果不是，有没有可能是《连山》或《归藏》？或者就连《连山》和《归藏》也不是，而是“三易”以前或以外的筮占？

我想，对上面这些问题，现在还不可能有最后的结论，但从近几年的考古发现看，有不少线索已经表明，大家把所有“数字卦”都归入《周易》的范畴是不大合适的，整个思路还有待拓广。

下面先讲材料。

二

上面所说的“近几年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指《中国方术考》出版后又发表的新材料^②。

^①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153-160页。

^② 《中国方术考》出版后，笔者又见到一些新材料和新著作。参看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94年1期，46-51页），徐锡台《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划奇偶图形画研讨》（同上，52-56页）。又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补记提到四十年代四川理县板岩墓出土双耳罐右耳上有卦画作“一八七一八九”，拙作失收，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73-178页论之，定为西汉前期之物，认为卦画的第一个“一”字也可能是“九”字。这是现知年代最晚的“十位数字卦”，应当补入。

在《中国方术考》中，我对截止 1993 年已经发表的“数字卦”进行搜集，经过核实，共得九十四例。通过对这些实例的研究，我的印象是：第一，现已发表的“数字卦”尚未发现早于商代晚期的实例，过去学者引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例子（如江苏海安青墩遗址所出和辛店陶器上的纹饰），其实都并不可靠；第二，这些“数字卦”是以刻铸于甲骨和铜器为最多，其次是书于或刻于陶、石、玉、骨和竹简等物，甲骨刻卦似与卜筮并用有关，而铜器上的卦则可能是用来为铸器择日，可见施用甚广；第三，其用数包括一、五、六、七、八、九，过去学者以为商数用八，周数用九^①，就发现实例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小屯南地卜甲上有“九”，淳化陶罐上的“九”实为“八”），所缺者唯二、三、四（因竖写会发生混淆而省去）和十；第四，现已发表的“数字卦”，年代较晚的实例是见于战国楚占卜简（发表者仅限于天星观楚简和包山楚简），其卦画包括一、六、七、八、九，除未发现五，和商代西周的实例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五，现已发现的《周易》古本有马王堆帛书本和双古堆竹简本，两种都是西汉早期的写本，其卦画阳爻作“一”，阴爻作“八”^②，年代更晚于上述材料。

对重新检验上述认识，近年来有三大发现很值得注意：

（一）商周“数字卦”中数字“十”的发现。

① 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3期，9-14页）曾有此说，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67-168页把淳化出土西周筮数陶罐上的“八”字解释为“九”就是受此说影响。笔者在《中国方术考》257页已指出商代甲骨有“九”字。案：河南三门峡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筮数陶罐，惜尚未发表。

② 学者曾把“八”误释为“六”，参看《中国方术考》258页。

1993年后，又有一些新的“数字卦”被发现，其中尤以曹定云先生揭示的四例最重要（图四九）^①。它们是：

（1）1973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小屯南地甲骨》4352，中华书局，1980年），铭文作“十六五”（倒书）（图四九：1）。

（2）1969—1977年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墓葬出土的铜爵（M354：2）。铭文作“五五五”（图四九：4）。

（3）1955—1957年陕西长安沣西西周遗址出土的陶纺轮（T105：4：12）。铭文作“六六五六六八”（图四九：2）。

（4）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宫殿基址出土的卜甲（H11：235）。铭文作“六六十”（图四九：3）。



图四九 商周数字卦中的“十”

^① 见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

这四个例子，前两例属于商代，后两例属于西周，其中属于商代的例（1）和属于西周的例（4）都有数字“十”，这是重要发现。它说明无论商代还是西周，其“数字卦”都是省去二、三、四的“十位数字卦”，学者以统计方法总结的用数规律，现在看来应重新考虑。

（二）战国楚简《周易》的发现。

近年来，有一批楚简自大陆（估计是湖北荆门）盗掘出土，流失海外，被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这批楚简，年代可能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相近，即大约在战国中期^①。现在这批竹简仍在整理之中，尚未公开发表，但个别实物在今年全面开馆的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已先期展出，其中包含竹书《周易》“豫”、“大畜”两卦每卦的第一简。另外，此书尚有部分残简流落香港，如最近饶宗颐先生披露的一枚残简，就是属于《周易》的“睽”卦，同上博楚简《周易》为同书^②。

这三条简文虽非全帙，但仍可借以窥见楚简《周易》的大致面貌。我们的印象是：

- （1）简文只有经文，即卦形、卦名和卦爻辞，不包括传文；
- （2）简文的卦形是以“一”表示阳爻，“八”表示阴爻，形

^①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7期，35-48页。简报把郭店楚墓的年代定在战国中期的晚段，即约公元前350-前300年左右。

^② 饶宗颐《在开拓中的训诂学——从楚简易经谈到新编〈经典释文〉的建议》，《第一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论文集》，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1997年，1-5页。

式完全同于马王堆帛书本和双古堆竹简本的《周易》；

(3) 简文分卦书写，以不同的章句符号相区别，自为起迄，内容与今本大同小异，所不同者只是个别文字，而且多半都是属于文字假读方面的差异。

它说明《周易》一书至少在战国中期就已定型，具有和今本相似的面貌。《周易》的卦爻从战国到西汉一脉相承，都是采取“一”、“八”字样，这对探讨今本《周易》卦爻的来源很有帮助。关于今本《周易》卦爻的来源，过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的原形是数字，前身是上面说的“数字卦”（张政烺先生和多数学者的看法）^①；一种认为它的原形和今本一样，阴爻作八分式样，乃是因为竹简或帛书行栏狭窄，如作中间断开的直线，易于模糊混淆，从而有所变通，和数字恐无联系（金景芳先生和李学勤先生的看法）^②。就现已发现的材料看，我们更倾向于前一种看法。因为第一，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早于古本《周易》（战国一种，西汉两种）而与今本卦爻相似的材料；第二，与这些古本年代相近的简本《归藏》（详下），其阳爻作“一”，阴爻作“六”或“八”，形式也非常相似；第三，这样理解也便于和早期的“数字卦”相互衔接。

（三）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

1993年，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发掘了十五座

^① 上引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

^② 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96页；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215页。又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2期，155-163转154页）举商末周初铜器和战国玺印铭文中类似《太玄经》的“几何直线符号”为说，认为这些符号与八卦同源不同流，是年代最早的卦画。

秦墓，其中的王家台 15 号秦墓，共出土竹简 800 余枚，包括《效律》、《日书》、《易占》和讲邦国灾异的一种^①。据简报介绍，此墓与江陵地区历年发掘的大部分秦墓相似，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 278 年（白起拔郢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元年）。简文抄写年代大约在战国晚期。其中的《易占》共包括五十余卦，卦名有“同人”、“旅”、“兑”、“师”、“丽（离）”、“匡（颐）”、“蚕”、“节”等（原文 40 页所说“人”卦是“同人”之误），卦画是以“一”表示阳爻，“六”、“八”表示阴爻（二者似是混用）。简报发表释文三简（简 213、198、182），照片两简（简号未发表，据下王、李二文为“劳”和“大过”两卦），未讨论其性质。现在经学者研究，此书实即“三易”中的《归藏》。其有关论著有：

（1）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收入古方等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 年 10 月，101-112 页）。此文以古书引用《归藏》（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书所收辑本）与王家台秦简《易占》比较，指出简文应即《归藏》。作者是王家台秦简《归藏》的整理者，此文共发表简文二十四条（简 194、213、536、470、339、336、333、304、550、196、482、491、560、215、473、455、259、204、538、471、563，以及漏印简号的三枚残简），包括简报释文中的简 213、198（此文作简 194，疑简报有误），以及照片中属于“劳”卦的一简（此文作简 536），但没有提到简报释文中的另一简（简 182）和照片中属于“大过”卦的另一简（简号不详），增加卦名“明夷”、“劳”、“晋（晋）”、“丰”、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 1 期，37-43 页。

“夜（蛊）”、“复”、“毋亡（妄）”、“比”^①，使我们对简文的了解又增进了一步。但可惜的是文章印刷不够理想，很多卦画都看不清楚，有些甚至漏印。

(2) 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4期，66-68页）。此文与上文发表时间相近（从见书时间看要早于前者），论点论据大体相同。其所用简文仅限于简报发表的三简。

(3) 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1期，46-52页）。此文发表稍晚，论点论据亦大体相同。其所用简文仅限于简报发表的五简（作者所说与“比”卦相当的“闭”卦，从照片看，卦名笔画不清，卦画似作“六一六六一六”或“六一六六一八”，相当《归藏》“萃”卦，王文所揭释文作“劳”卦，释“闭”恐误）。

这三篇文章都是以前人所辑《归藏》佚文论定王家台秦简《易占》就是战国晚期的《归藏》，从而证明前人的疑伪之说（主要是以著录的存佚有无和时间先后为说）实不可信。这不仅对我们重新认识《归藏》本身很重要，而且对进一步考虑整个“三易”以及“三易”以前或以外的筮占也很有意义。

^① 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1-13页）所附《周易》、《归藏》对照表是以《周易》“蛊”卦相当《归藏》“蜀”卦，《周易》“姤”卦相当《归藏》“夜”卦，其实从这几个字的古音看，二者的关系正好应当倒过来，王明钦文以“夜”卦相当“蛊”卦是正确的。

三

上面提到的考古发现，其意义何在？在众多学者精彩研究的基础上，我想讲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一）今本《周易》是东汉魏晋以来整理定型的本子，它同马王堆和双古堆出土的西汉写本的《周易》相比，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写本的《周易》相比，当然会有一些字句差异（主要是文字通假和个别字的出入），卦序排列有时也不太一样（如与马王堆帛书本不同）。但从大的方面讲，我们不应夸大其差异。因为从卦形、卦名和卦爻辞的内容讲，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总体特征上还是比较接近。这也就是说，至少从战国到西汉早期，其形式相对稳定，很明显是一种连续的发展，在当时的筮占中乃自成一类。这种类型的筮占，它是用“一”、“八”二字来表示卦形，显然不同于商周时期流行的“十位数字卦”，文字内容同下面所说的《连山》、《归藏》也有区别。

（二）古代筮占形式多样，在《周易》流行的时间范围里，《周易》与《连山》、《归藏》曾长期并存，合称“三易”，“三易并占”确为制度。如《周礼·春官·大卜》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书·洪范》说“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贾公彦疏说“盖筮时《连山》、《归藏》、《周易》并用”；《礼记·礼运》引孔子说有《坤乾》、《夏时》之说，郑玄注以《坤乾》为《归藏》；还有《左传》、《国语》所见筮例，除属于《周易》系统的例子，尚有所谓“泰之八”（《国语·晋语四》）、“艮之八”（《左传》襄公九年），以及

“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国语·晋语四》）等说法，据《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这些筮例都是属于《连山》或《归藏》的系统。但《连山》、《归藏》，班志不载^①，或云汉初已亡，东汉魏晋反而出现（如桓谭《新论》、《晋中经簿》和隋唐史志所载），且有伪本续作^②，令人滋疑。现在《归藏》佚文的可靠性已由王家台秦简的发现得到澄清，《连山》疑伪，情况类似，恐怕也应重新考虑。

（三）现存《连山》佚文，数量较少，有些佚文的归属也有争议，但魏晋以降，古人引用，不能完全抹杀，如《帝王世纪》引《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启”，《水经注》卷二二《颍水注》“（颍水）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易）曰‘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卷三十《淮水注》“故《连

^①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虽无《连山》、《归藏》之名，但仅凭书名，不能断定必无其书，且《数术略》筮龟类有《大筮衍义》二十八卷和《大次杂易》三十卷，亦属谈易之书，或收之。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尝言“故就史志以考古书之真伪完阙，虽为不易之法，然得之者固十之七八，失之者亦不免二三”（3页），指出历代史志于当时之书多有阙漏不收，佚而复出乃寻常之事。

^② 《连山》、《归藏》的西汉传本，史无明文，不能具论，但桓谭《新论》有所谓“《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之说，皇甫谧《帝王世纪》、酈道元《水经注》等书俱引之，则东汉魏晋南北朝，二书固存于世。前书，或者亡佚略早，《隋书·经籍志·经部》易类只有《归藏》没有《连山》，《子部》五行类有梁元帝《连山》三十卷，疑为续作；又《北史·刘炫传》有刘炫本《连山》，《郡斋读书志》有《三坟》本《连山》，学者断为伪作。后书，《隋书·经籍志·经部》易类有晋太尉参军薛贞注本，共十三卷，小序说“《归藏》汉初已亡，案《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所谓“汉初已亡”，以桓谭所见，可知纯属推测；“圣人之旨”，也是以《周易》为准，太多偏见，现在看来，并不可信。

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是也”，《史记·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鯀封于崇”，等等。这类佚文中的有些条，如《水经注》卷二二引，或以为《归藏》，或以为《连山》，或以为《连山》、《归藏》共有，尚有争议，但不能说所有佚文都是伪造^①。从现存佚文看，《连山》同《归藏》比较接近，而与《周易》的区别稍微大一点。例如：

(1) 《连山》的卦名虽不可考，但繇辞与《归藏》相像，同样是依托传说的帝王和圣贤；

(2) 据《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杜预注和孔颖达疏，《连山》、《归藏》都是用七八，以不变为占，这和《周易》用九六，以变为占是不太一样的；

(3) 《连山》、《归藏》的卦序与《周易》也不一样，例如《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就是差别^②。

(四) 《连山》、《归藏》，从简文和古书佚文看，其繇辞多依托古代传说人物，有女娲、夸父、黄帝、炎帝、蚩尤、共工、羲和、后羿、嫦娥、舜、皋陶、鯀、禹、启、桀，以及殷王、巫咸、耆老、周武王、周穆王等等。战国秦汉多称二书为夏、商之易或羲（伏羲）、黄（黄帝）之易，也许就是根据繇辞的内容，但其实际年代还有待研究（古代数术之书有不断改写的习惯，准确定点无异刻舟求

^① 古书真伪存佚往往有疑似之间虽高才之明不能决者，故前人辑佚多取宽式，效史迁心法，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昔容庚先生尝言：“以伪为真，去之尚易；以真为伪，补之则难，故于诸器非灼知其伪者辄为收入”（《秦汉金文录》序，北平，1931年）。李家浩文为排除王家台秦简《归藏》有可能是《连山》，对《连山》佚文只挑存在争议者（两条）为说，摒其余不论，可商。

^② 见《周礼·春官·大卜》贾公彦疏。

剑，我们只能求其大致的时间范围)。例如现在发现的王家台秦简《归藏》和前人所辑《归藏》佚文，其繇辞提到周武王和周穆王，当然不会是商代的内容。我们怀疑，所谓“三易并占”，很可能是以年代、国别不同的筮占系统合并为一，它们在共时关系里还是比较接近，在占法上有许多可以相互沟通的地方。例如：

(1) 据《大卜》篇文，《连山》、《归藏》、《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三者在此卦数上是一致的；

(2) 《连山》卦名虽无可考，但《归藏》六十四卦，经学者比较，除去异体、通假和加字等差异，真正不同者只占一小部分^①；

(3) 《连山》、《归藏》用“七八”，《周易》用“九六”，虽有不同，但都没有超出“七八九六”的范围，它们似乎都是以“大衍之数”或类似于“大衍之数”的策数和分组方法为基础。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三易”与“三易”以外的其他占卜可能也有某种关系。例如李学勤先生就已指出，《周礼·春官·大卜》讲卜、筮、梦，卜有“三兆”，筮有“三易”，梦有“三梦”，彼此可能有对应关系^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左传》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卜筮并用的例子，其中有些卜辞与《连山》、《归藏》相似，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晋国卜偃卜纳襄王，其卜辞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对比《归藏》佚文“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太平御览》卷九七引），就是类似的辞例。也许以传

① 参看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所附《周易》、《归藏》对照表。案：饶先生以“荧惑”、“耆老”、“大明”为卦名，相当《周易》的“贲”、“大壮”、“中孚”，王明钦文和李家浩文已根据王家台秦简《归藏》，指出它们都是繇辞中的人物或辞语，并非卦名。

② 见《周易经传溯源》，28-42页。

说人物为占，正是早期占卜的重要特征。

(五) 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商代西周似乎是以十数为占者为主体。战国时期，这种“十位数字卦”仍在使用（见于楚占卜简），但与同时的“三易”似有所区别。这个时期的《连山》尚未发现，但估计是与《归藏》、《周易》比较接近。王家台秦简《归藏》以“一”为阳爻，“六”、“八”为阴爻，上海博物馆藏《周易》以“一”为阳爻，“八”为阴爻，当然有可能是从“十位数字卦”简化。即前者有可能是“三易”或“三易”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前身。但前者的延续（可以晚到西汉，见308页注②）可与后者共时，而形式有别，应慎重对待。我们不能简单说在“十位数字卦”中，“一”与“五”、“七”、“九”无别，“六”、“八”也是一样（否则何必还要不辞惮烦地把这么多的数字全都写出来呢）。况且按通常理解的“大衍之数”，我们也不可能得到“十位数字卦”。所以，就目前能够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认为，最好还是按直观特征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十位数字卦”（是否可以称“易”还有待证明），一类是“两位数字卦”（“三易”）。后一类又分两小类（《连山》、《归藏》为一类，《周易》为一类）或三小类（《连山》、《归藏》、《周易》各为一类）。

在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对《周易》适用性的怀疑其实早就存在。例如张政烺先生就已坦承，由于从一到八数字太多，他对周初筮法的拟测，“顾此失彼，无法弥缝”，根本算不上复原^①。李学勤先生也说出土发现的数字卦“使用数字不限于七、八、九、六，便是有异于《左》、《国》筮例的明证，因此，在商周遗物上出现的数字符号，虽然看来是与《易》卦有关，可是属于《易》

^① 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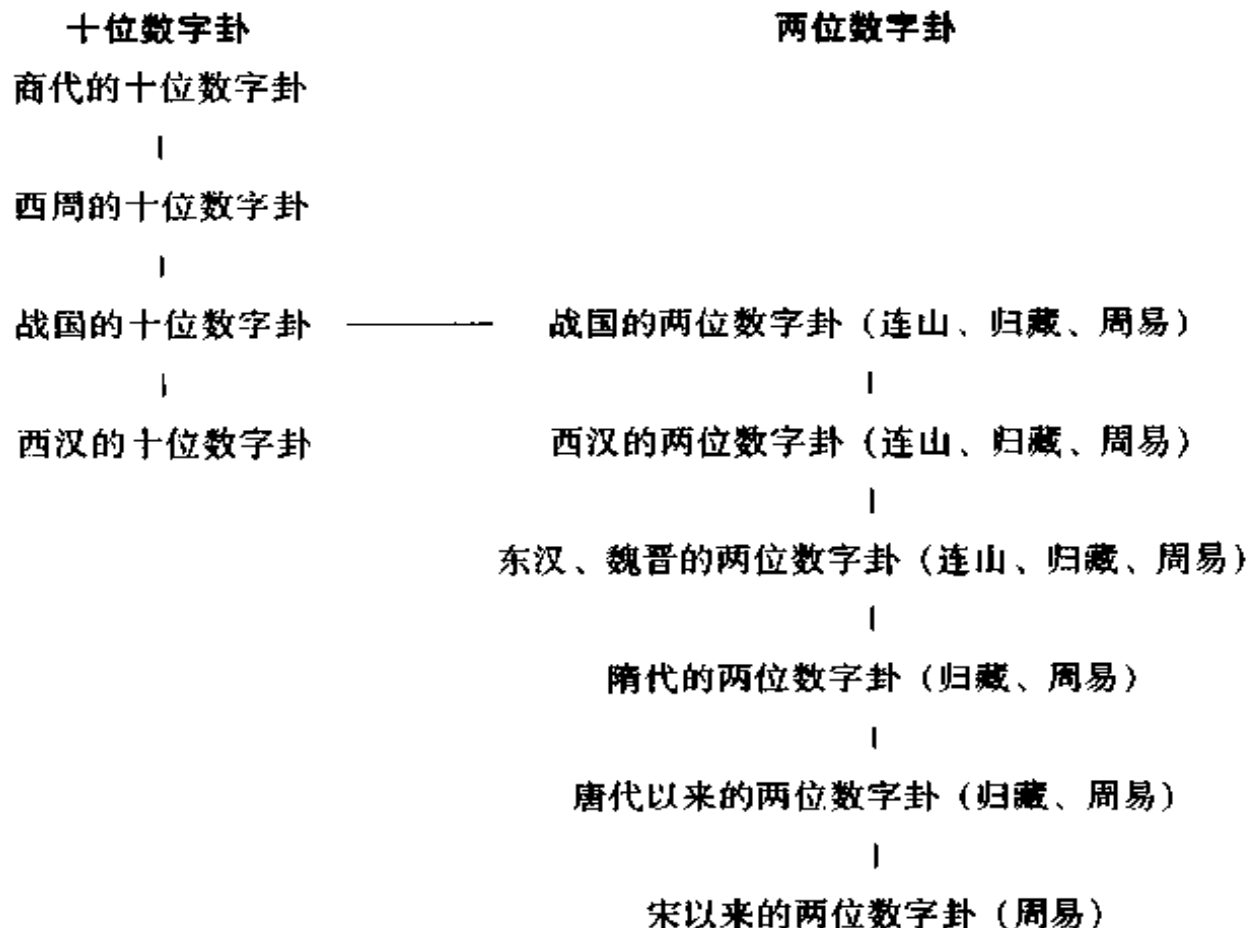
的哪一种，还是需要论证的问题”^①。

我们对“数字卦”的再讨论可以说是对这些怀疑的进一步论证。

1997年9月22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附录】

筮法的发展



^① 见《周易经传溯源》，154页。

读几种出土发现的选择类古书

择日之术，后世叫“选择”，自汉以降为数术大宗，传统从未断绝。其术出于星历、式法，向有建除、丛辰、太一、天一、刑德、堪舆、风角、五音等众多分支，名称也有“阴阳”、“五行”、“时令”、“月令”、“日书”、“历书”、“历注”、“历忌”等不同叫法^①。现在讲这类数术，出土之书日增，然发表早而讨论多，唯睡虎地《日书》^②。由于此书有自题书名，学者往往把类似古书统称“日书”，但对不太一样的书则无以名之，内容结构的分析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很有必要做汇总研究。在《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我已扼要分析过子弹库帛书和放马滩、睡虎地、旱滩坡出土的日书，这里是对其他材料的进一步讨论。

① 参看《史记·日者列传》所述汉武帝所聚占家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志的有关著录。

② 张强《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415-427页；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二十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10期，2-10页。

一、子弹库楚帛书的残片^①

中国早期的选择书，“阴阳”、“五行”是模糊说法，“历注”、“历忌”也是笼统名称。王充把它们分为“岁月之传”和“日禁之书”（《论衡·讯日》），出土发现也有这两类，如楚帛书就是属于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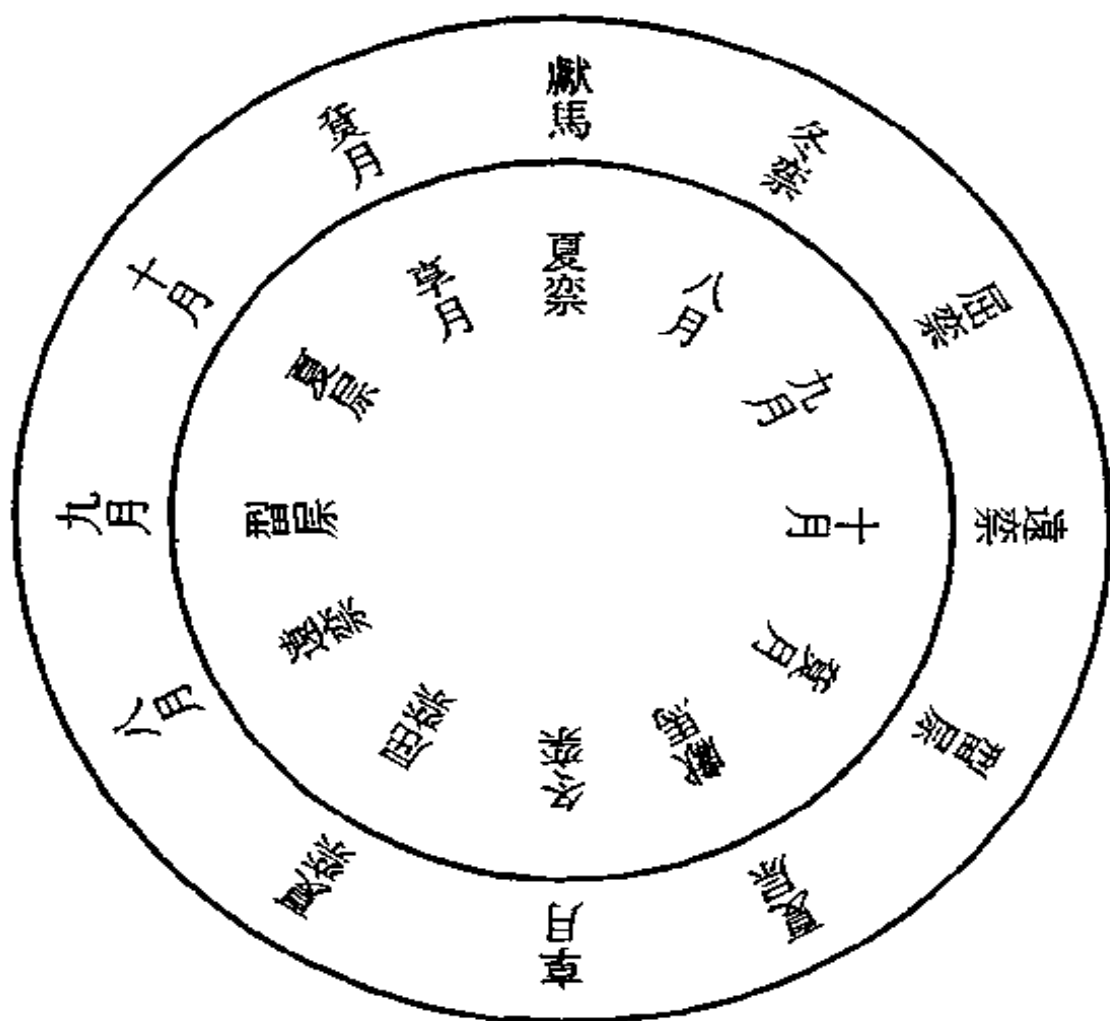
子弹库帛书是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原为蔡季襄收藏，1946年由柯强带到美国。帛书原来不只一件，但长期以来，大家讨论全是赛克勒藏比较完整的一件；其他残片只是近年才为人所知。前者，学者习称为“楚帛书”，这是不知道帛书还有其他残片。现在有了这些残片，应当各自命名。

子弹库帛书，完帛是按“四时十二月”来组织画面：十二月神分成四组，各居四方十二位，按左旋排列；四隅是以四色木相隔，按右旋排列，与“式图”属于同类设计。文字，也是围绕着四时十二月，中间两篇，是讲“岁”、“时”，边文是讲“月”。关于此篇，我们已多次讨论，这里不必再讲。现在只着重讲一下其他帛书。

正在整理的子弹库残帛，已经揭开的残片，大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从内容上看，它们包含以下四类：

(1) 朱栏黑色小字类。它包含一幅图画（图五〇），图画由两个同心圆组成，圆圈的外缘是黑色，内缘是红色，沿两个圆圈的

^① 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42-62页。



图五〇 子弹库楚帛书《月名图》

内側各书楚国的十二月名。两套同样的月名，彼此相差五位。图的下面画有朱丝栏，栏内文字是以红色粗短横分章，按“居木如何”、“居火如何”（尚未发现）、“居金如何”（尚未发现）、“居水如何”、“居土如何”，分别讲其配色配物，如“元备（服）某色”、“乘某色车”、“元味某”、“元畜某”、“树某某某”、“元皿某”、“元色某”、“元虫某”、“元兵某”、“元绪（绶）某玉”，以及时令禁忌等。商承祚先生旧藏的帛书残片（10片）就是属于

这一类^①。

(2) 无栏黑色大字类。分别书于四方，格式作“弃（掩）某方，从干支某某以至干支某某”。另有一些文字则提到“逆之曰生气，从之曰死气”等辞。

(3) 钩形符号（作直角形）标干支类。钩形符号用红色画成，干支为墨书。如其中一片是标“甲□”于折角外、“乙亥”于折角内，一片是标“□□”于折角外、“丙□”于折角内，两片是标“丁未”于折角外，而另书文字（两字）于折角内，甚至还有不书文字者。形式似与下面的尹湾《博局占》相似。

(4) 其他。还有朱栏红色大字、墨栏黑色小字的若干残片。

由于上述帛书尚未揭完，已揭残片难以拼复，现在还无法判断这四类是什么关系。但我们的模糊印象是，子弹库帛书是属于“岁月之传”：完帛与《月令》类古书（如《逸周书·时训》、《大戴礼·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相似，似可定名为《四时令》；残帛与《玄宫》类古书（如《管子》的《幼官》和《幼官图》）相似，似可定名为《五行令》。从《淮南子·时则》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时令正好是由这两个系统构成。它们和下述日书不同的地方是，它们是以“时”、“月”和节气的划分为主，并不落实到“日”，因而也就没有后者那种复杂的干支排列^②。参考王充的说法，我们不妨称之为“时令类古书”。

^① 商志譚《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书》，《文物》1992年11期，32-33转35页。

^② 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194-210页。

二、九店楚简《日书》^①

现已发现的选择书，除上所述，还有不少是属于“日禁类古书”，即通常所说的“日书”。过去我以为，这种古书主要是由建除或丛辰类的历忌总表（以日类忌）和按选择事项分类排列的杂忌而构成（以忌类日），现在看来还有不少门类值得推敲。它们或以星别（如岁、斗、玄戈、二十八宿、天李、天陷），或以历异（如朔望弦晦、朝夕启闭和反支），有时还以占梦、相宅、厌劾、祠禳等术插附其中。如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56）出土的日书就是年代较早的标本。它的抄写年代不晚于战国晚期的早段，内容形式与放马滩和睡虎地出土的秦日书相似，可以相互比勘。

九店《日书》的历忌总表分两种，一种是按“建”、“籓（陷）”、“败（破）”、“坪（平）”、“宁”、“工”、“坐”、“盍（盖）”、“城（成）”、“复”、“菀（苑）”、“散（微）”排列，一种是按“秀”、“结”、“阳”、“交”、“□（害）”、“阴”、“达”、“外阳”、“外害”、“外阴”、“绝”、“光”排列。这两套日名见于睡虎地《日书》，都是放在讲建除的部分，使人以为是建除术。但拙见以为睡虎地《日书》的历忌是分四种：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附录二；李家浩《江陵九店五十六号墓竹简释文》（506-511页）。案：关于简文释读，我有《读九店楚简》一文（待刊）作专门讨论，这里只讲一般印象。

(一) 建除。

(1) 楚除。即甲种《除》篇的第一套日名和乙种首篇复合日名的前半名称；

(2) 秦除。即甲种《秦除》和乙种《徐(除)》篇的日名。

(二) 丛辰。

(1) 楚辰。即甲种《除》篇的第二套日名和乙种首篇复合日名的后半名称(是以丛辰与建除对照)；

(2) 秦辰。即甲种《稷(丛)辰》和乙种《秦》篇的日名。对比睡虎地《日书》，我们认为，九店《日书》的两套日名，“建”字类是楚国的建除，“秀”字类是楚国的丛辰。

除历忌总表，九店《日书》还有几个小类是与岁徙和岁徙的方向吉凶有关。这也是秦代日书所有：

(1) 四时吉凶。是以四时配四方，按太岁所在的迎背左右讲十二支吉凶(从“五子”到“五亥”)，即所当方和左方为“不吉”(相当“大凶”和“小凶”)，右方为“吉”(相当“小吉”)，对方为“成”(相当“成”)。

(2) 相宅。是讲屋舍布局的方向吉凶。

(3) 朝夕启闭。是以朝夕启闭占方向吉凶、逃、入、疾、管。

(4) 岁。是讲岁徙的辰位组合和出入移徙的吉凶。

(5) 行。是讲出行的吉凶。

这类数术与修筑起盖(动土)、出入移徙关系最大，与一般杂忌有别。我们怀疑，它们或与汉代的太一术或天一术有关。

在九店《日书》中，真正属于杂忌，只有讲“裁衣”的一段简文。

此外，简文中还有讲“阴阳死生”的一种，类似后世讲“四时休王”的数术，以及祷告武夷君的一段祝辞。

三、马王堆帛书中的有关材料^①

马王堆帛书是 1973 - 1974 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 (M3)，帛书抄写于秦汉之际，下限不晚于汉文帝十三年（前 168 年）。其中与选择有关，主要是以下两种：

- (1) 《阴阳五行》。分甲、乙两种，发表者为两本的局部；
- (2) 《刑德》。分甲、乙、丙三种，发表者为乙本。

《阴阳五行》，甲本局部为五行上朔顺逆干支表，乙本局部为一九宫图（图五一）。九宫图是以米字线表示九宫，“天一”居中，四周为八神和二十八神。内圈八神为：北方“十二支”、“上奇”，东方“天溜”、“地溜”，南方“地”、“能”，西方“天枢”、“齯”。外圈二十八神为：北方“沕（文）昌”、“四其”、“北海”、“三奇”、“除衡”、“天眚（陷）”、“天狱”，东方“天李”、“伏灵”、“耕能”、“句叔”、“舆鬼”、“大（泰）山”、“天维”，南方“句陈”、“恒陈”、“日月”、“青龙”、“白虎”、“虹宫”、“上立”，西方“刑”、“德”、“小岁”、“斗穀”、“大一”、“大阴”、“大阳”。图中界线以五色别（照片是黑白片）：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

〔案：“八神”是九宫之神；“十二支”，或即地支十二；“上奇”，《史记·天官书》有“骑官”（后世叫“骑星”）；“天溜”、“地溜”，下字右半从网从目，可能是“盲”字的异体，疑读“天网”、“地网”，“天网”即“天罗”；“地”，疑即《天官书》“地侯”（“镇星”的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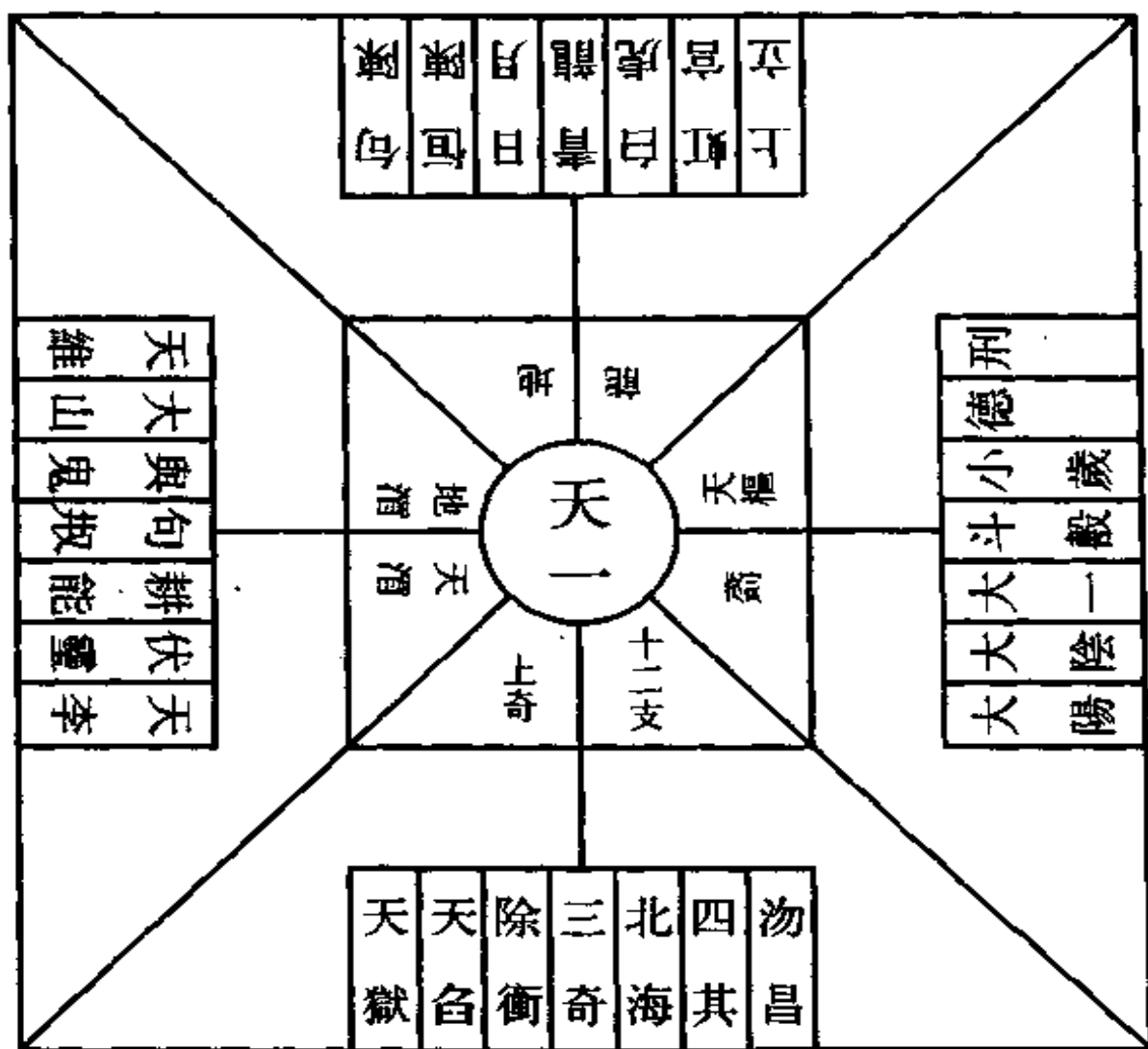
^① 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132 - 145 页。

名)；“能”，疑即《天官书》“能星”（“兔星”的七种别名之一)；“天枢”，即北斗第一星；“薊”，疑即《天官书》“天厠”。“二十八神”是对应于二十八宿；“沕昌”，读为“文昌”（“沕”是明母物部字，“文”是明母文部字)；“四其”，不详；“北海”，居北，与下“大山”是类似名称；“三奇”，遁甲式有“三奇四仪”；“除衝”，六壬十二神有“太衝”；“天陷”，读为“天陷”，睡虎地《日书》甲种有《天阨》篇，篇中“天阨”作“天陷”，即此^①；“天狱”，《天官书》叫“贱人之牢”；“天李”，即“天理”，《天官书》叫“贵人之牢”，睡虎地《日书》甲种有《天李》篇^②；“伏灵”，见《晋书·天文志》，是一种彗星（据说是从太白散出)；“耕能”，《天官书》有“三能”（即“三台”)；“舆鬼”，即朱鸟七星中的“舆鬼”；“大山”，居东，应即“泰山”；“天维”，疑即《天官书》“天睢”；“句陈”、“恒陈”，六壬十二神有“钩陈”；“日月”、“青龙”、“白虎”，皆常见星官；“虹官”，《天官书》有“官星”；“上立”，不详；“刑”、“德”，即刑德术的“刑”、“德”；“大一”、“大阴”、“大阳”，疑即“天一三星”^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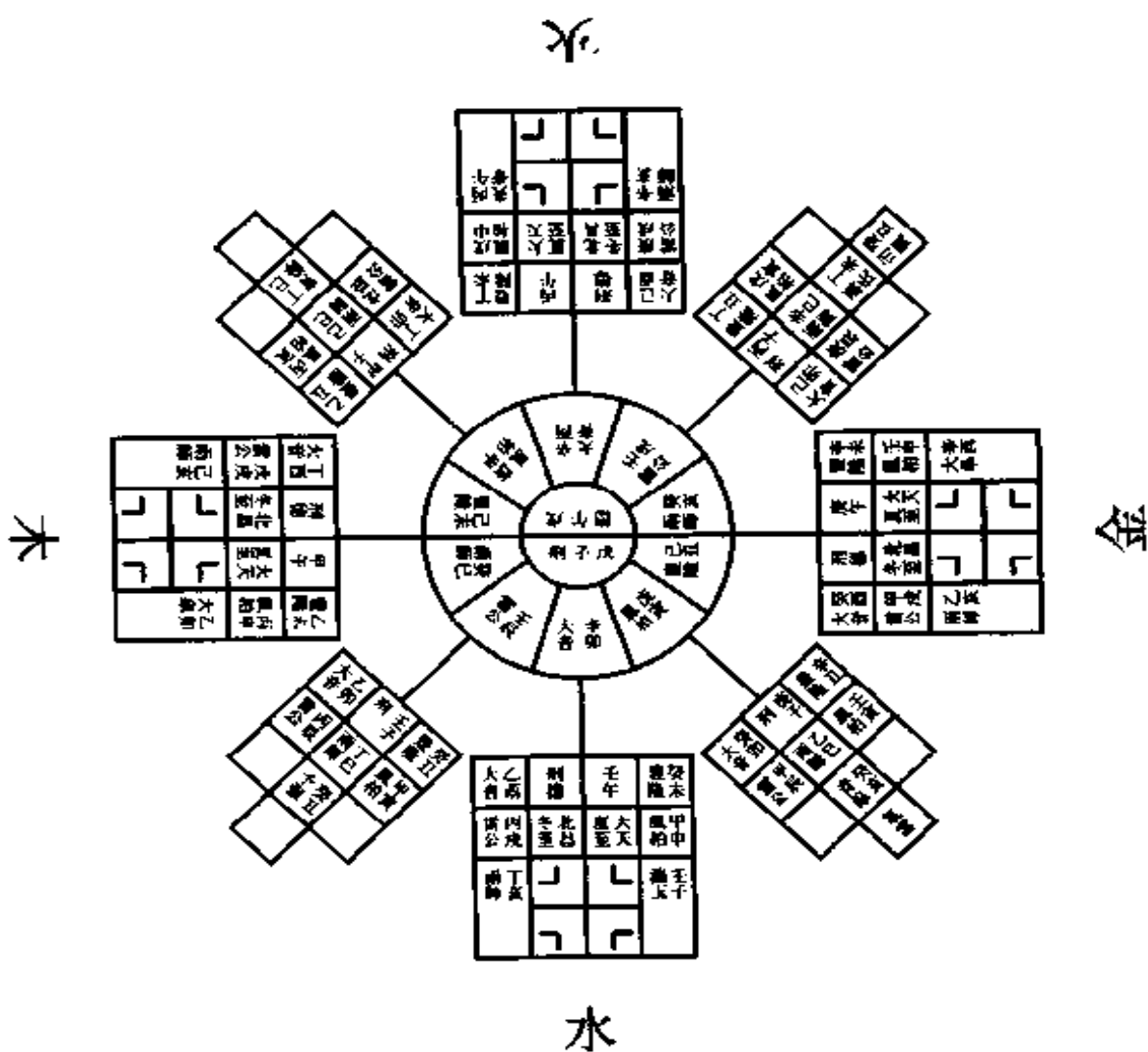
① 《孙子·行军》也有“天陷”，为五种凶煞之地的一种，但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行军》、《孙子兵法》佚篇《地形二》和《孙臆兵法·地葆》相当于“天陷”的“陷”字皆从召作。

②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299页引郑刚说以为“天狱”即“天李”，可商。

③ 马王堆帛书《避兵图》上的三龙是“天一三星”，三星相当“三一”，即青龙为“天一”，黄龙为“地一”，黄首青身龙为“太一”。我们怀疑，这里的“大一”即“太一”，“大阳”即“天一”，“大阴”即“地一”。参看饶宗颐《图诗与辞赋——马王堆新出〈太一出行图〉私见》（收入《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79-82页）。



图五一 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乙本附图



图五二 马王堆帛书《刑德》附图

《刑德》乙本是讲太阴的刑德大游和刑德小游^①。此书也有一幅九宫图(图五二):中宫为圆图,二分再五分圆面,黄色,代表土行,字迹残泐。周围八宫,则是四分再二分,各以方图标于米字线的八个方向:北方二宫,黑色,标“水”字于子位;东方二宫,青色,标“木”字于卯位;南方二宫,赤色,标“火”字于午位;西方二宫,白色,标“金”字于酉位(照片缺)。其图配五帝、五神。五帝,“湍(颛)玉(瑛)”在北,“大(太)皋(昊)”在东,“炎帝”在南,“少皋(昊)”在西(“少”误“大”),“黄帝”应在中宫(看不清)。五神,八宫皆具,为“丰隆”、“风柏(伯)”、“大音”、“雷公”、“雨师”。此外四正标“刑德”、“大天、夏至”、“北昌、冬至”和钩绳图,四隅标“刑”,东北标“予强”、东南标“青淖”、西南标“聂(摄)氏(提)”和“司鬪”、西北标“青淖”和“气云”^②。

[案:“大音”,《天官书》:“涿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似非此所当^③。道教有风、云、雷、电、雨“五神”,是与金、木、水、火、土“五行”对应,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道教玉牌,上为“风”、“云”、“雷”、“电”、“雨”,下为“金”、“木”、“水”、“火”、“土”,左右为二

① 马克(Marc Kalinowski)《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华学》第1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2-110页。

② 饶宗颐《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江汉考古》1993年1期,84-87页。案:饶文“北昌”作“升昌”,东南“青淖”作“青皋”,西南“青淖”作“官三”,此不同。

③ 注①引马克文95页引《天官书》此条,谓“我们几乎对大音一无所知”,“饶宗颐先生认为大音可能仅是太阴的一个异称,但缺乏足够的证据”。

十八宿名。疑“大音”即电神^①。“大天”或即“大一”、“天一”之省，“北昌”或即“北斗”、“文昌”之省。“青津”，《天官书》“其色大圆黄津”，《集解》谓末字“音泽”，盖形近易混]

四、其他有关材料

(一) 银雀山汉简。

这批竹简是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M1)，简文抄写于西汉初年的文、景时期，下限不晚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8年)。简文包含与数术有关的书十二种^②。这十二种古书，其中与选择有关，主要是以下五种：

(1)《禁》(篇题存)。是以木、火、金、水配四时，土配季夏、季冬，讲四时禁忌。

(2)《三十时》(篇题存)。是以6日为一节，12日为一时，讲三十时节。

(3)《迎四时》(篇题补加)。是讲天子于东、南、西、北四堂分迎四时，属古“明堂月令”之说。

(4)《四时令》(篇题补加)。是讲天子命四辅授时于民，亦古“明堂月令”之说。

^① 王育成《中国古代道教奇异符牌考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2期，25-50页。

^② 整理本尚未发表。我们只能从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发表的按简号排列的简文试为钩稽。拙作《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是专论这十二种古书中的《三十时》，并对其他十一种也做了介绍。

(5)《五令》(篇题补加)。是以德、义、惠、威、罚“五令”配鳞(木)、羽(火)、羸(土)、毛(金)、介(水)“五虫”，讲五行生克，互为德刑。

这五种书都是“时令类古书”。其中(1)(3)(4)是一类，属“四时令”；(2)(5)是另一类，属“五行令”。它们是楚帛书之后的重要标本。

(二) 尹湾简牍。

这批竹简和木牍是1993年出土于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M6)，简文抄写于西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前16—前9年)。简文包含数术书六种，其中与选择有关，主要是以下五种^①：

(1)《神龟占》(篇题补加)。书于9号木牍正面的上部，下附神龟图(图五三)，是以神龟的头尾、四肢和两肋表示米字形的八方，从左后足(东北)始，以该位为月朔，右行数日，依次经尾(北)、右后足(西北)、右肋(西)、右前足(西南)、头(南)、左前足(东南)、左肋(东)，每八日为一圈，至今日止，问亡盗得与不得、姓名和所之方向(即所至之位的方向)。其有关规定是按左行的顺序条列，不与数日之法同。

(2)《六甲占雨》(篇题补加)。书于9号木牍正面的下部，只有略如龟形的六十甲子图(图五四)和“占雨”二字，缺占雨之辞。

(3)《博局占》(篇题补加)。书于9号木牍的背面，上面是博局图(图五五)，下面是占文。博局图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方

^① 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123—126、145—147页。刘乐贤《尹湾汉墓出土数术文献初探》(作者所赠待刊稿)对这五种数术书有很好的讨论，拙作此节是参考该文而略作补充。

●用神龜之法以月量以後左足而右行至今日之日止問

直右脅者可得姓朱氏名長正西

直後右足者易得為王氏名到西北

直尾者自歸為莊氏名餘正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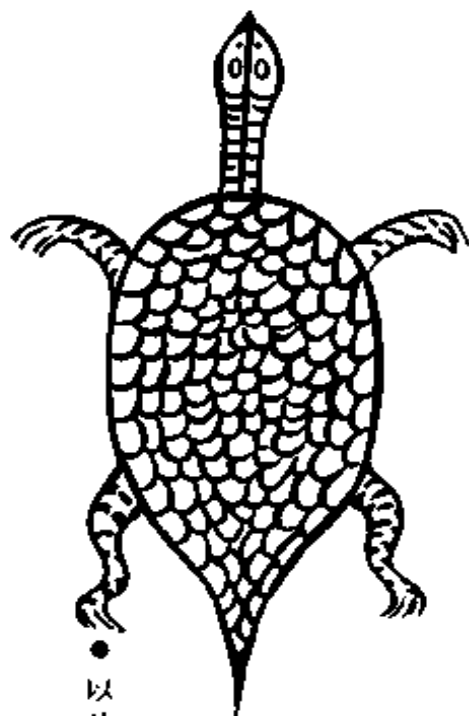
直後左足者可得為朝氏名歐東北

直左脅者可得為鄭氏名起正東

直前左足者難得為李氏名多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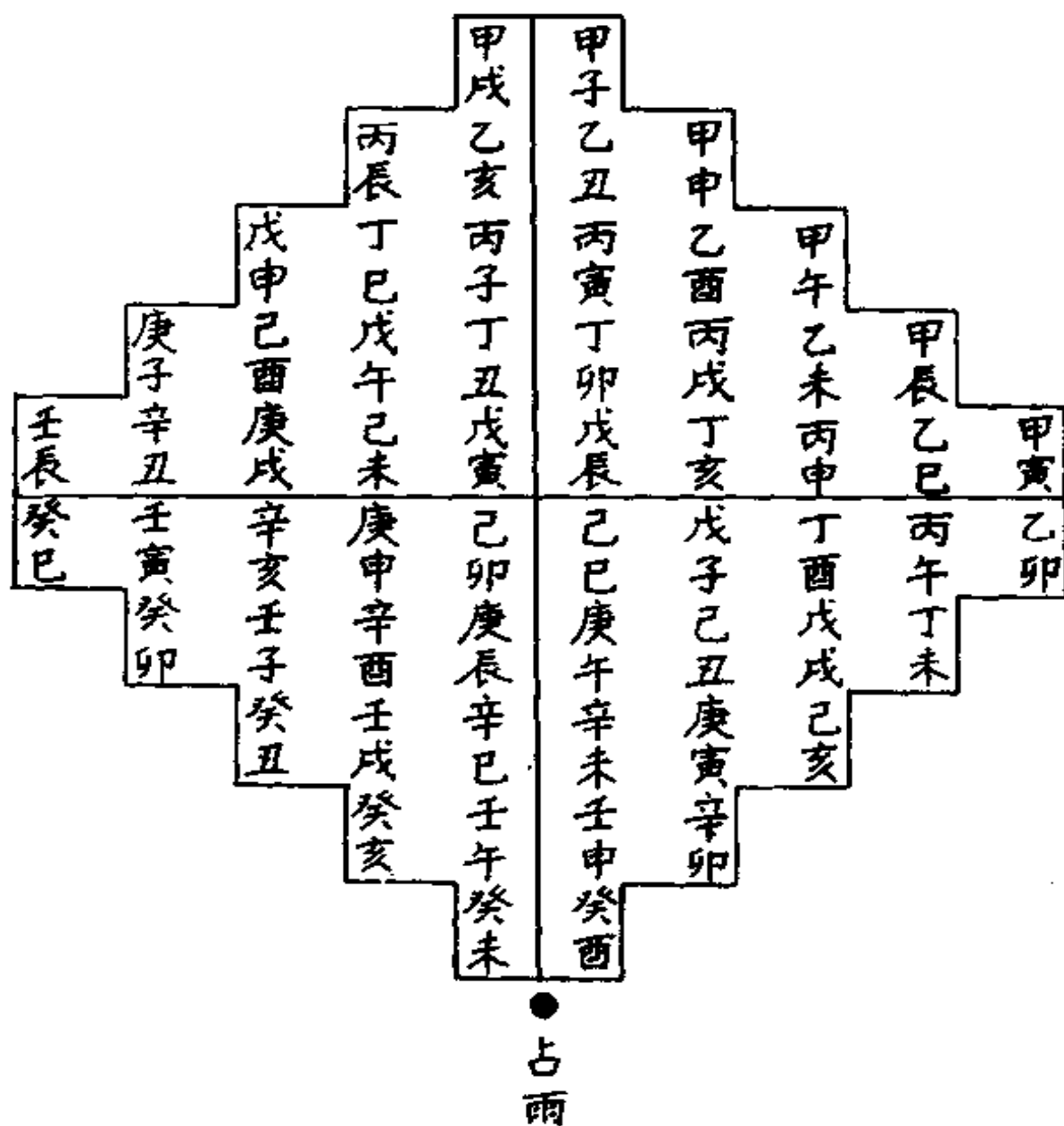
直頭者毋來也不可得為張氏正南

直前右足者難得為陳氏名安正^入西^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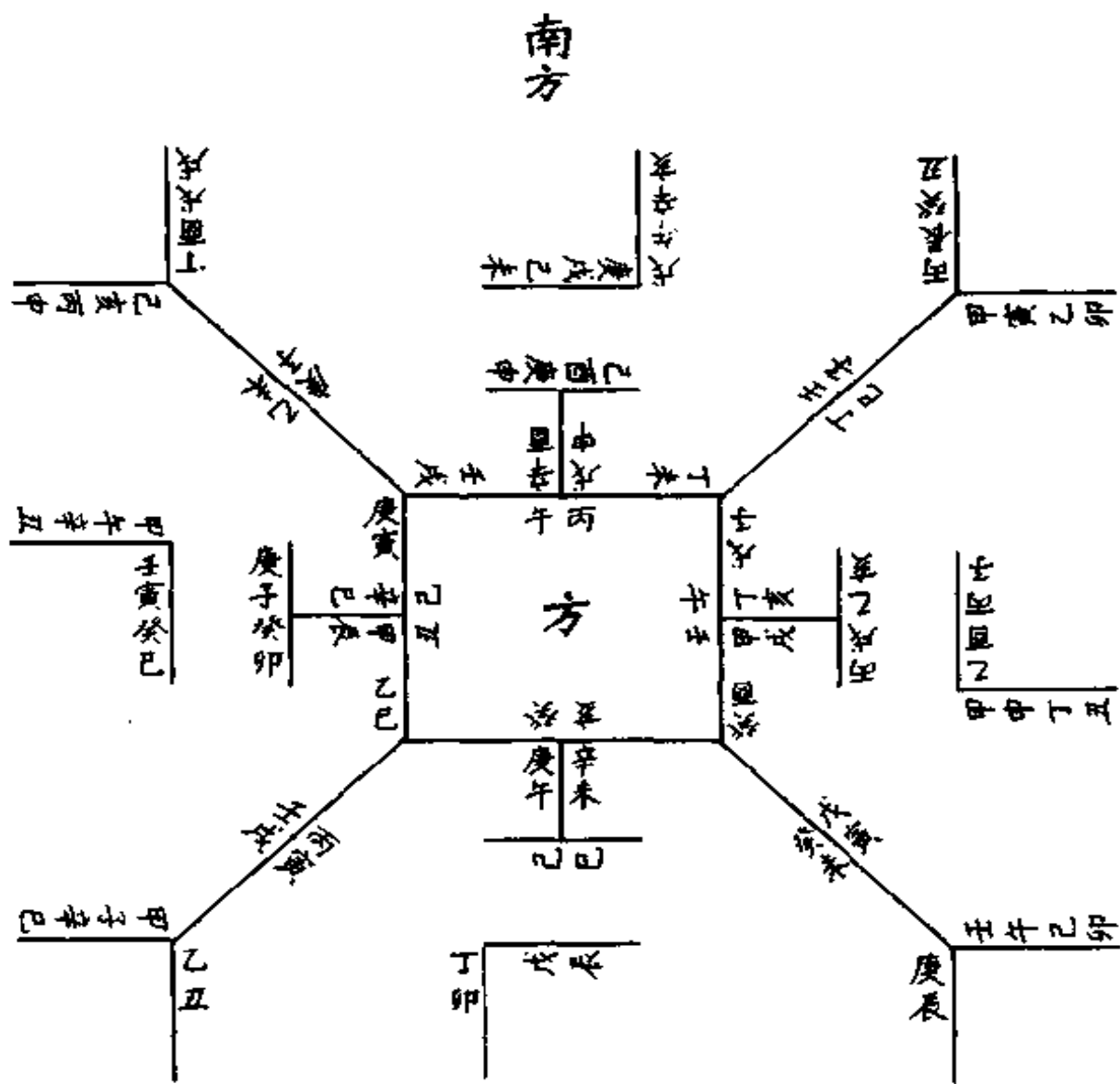


● 以此右行

图五三 尹湾汉简《神龟占》附图



图五四 尹湾汉简《六甲占雨》表



图五五 尹湾汉简《博局占》附图

框，中标“方”字，外有四组 T 形线（代表四方）；外层省去方框，内标 L 形线于四正，V 形线于四隅（代表八方）。内外两层之间形成一条走廊，外层四隅与内层四隅有线相连，书六十甲子于各条线的内外两侧（抄写有个别错误）。占文分五栏十行，其中第一行是每栏的占问项目，作“占娶妇嫁女”、“问行者”、“问殷（系）者”、“问病者”、“问亡者”，其他九行都是以“方”、“廉”、“揭”、“道”、“张”、“曲”、“拙”、“长”、“高”起首，横竖互为经纬。李学勤先生指出这里的九名相当许博昌口诀的“方”、“畔”、“揭”、“道”、“张”、“究”、“屈”、“玄”、“高”^①，甚确。它们的位置，我怀疑，“方”即标注“方”字的方框内侧（“方”指方形），“廉”即方框外侧（古代算家称方形的边为“廉”，角为“隅”，“廉”与“畔”同义），“揭”即 T 形线的纵线（“揭”是植木为表，此象其形，“揭”是通假字），“道”即 T 形线的横线（线外有道），“张”即四隅连线（象其四扬，出土六博局多以四个圆圈代之），“曲”、“拙”即外层四正的 L 形线（象其曲折，“究”读“纠”，与“曲”含义相近，“屈”同“拙”），“长”、“高”即外层四隅的 V 形线（象其高长，“玄”有远义，与“长”含义相近）。

(4)《刑德行时》（篇题存）。书于竹简。简文是按“端”、“令”、“罚”、“刑”、“德”占“请谒见人”、“行”、“殷（系）者”、“疾者”、“生子”五事，形式与银雀山汉简《五令》相近。

(5)《行道吉凶》（篇题存）。书于竹简。简文是按六十甲子占行道吉凶，每日皆注“得几阴几阳”（“三阳”、“三阴”、“二阳一阴”、“二阴一阳”）和“得某方之门”。前者可能是所当卦气，

^① 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1期，49-51页。

后者则是所出之门。

这五种古书，除（4）可归入“时令类古书”，其他都是“日禁类古书”。其占问形式（如神龟占、博局占）颇具特色，但所问事项不多，只是杂忌式的短篇。

1998年4月11日写于北京蓟门里